

《跨世纪》丛书

性与梦

——无意识精神分析原理

〔瑞士〕C·G·荣格 著
梁绿琪 译



出版社

· 《跨世纪》丛书 ·

性 与 梦

——无意识精神分析原理

(瑞士) C·G·荣 格 著

梁 绿 琪 译

海 佑 校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89年 北京

责任编辑：李佳鑫

封面设计：李士美

《跨世纪》丛书

性 与 梦

——无意识精神分析原理

(瑞士) C·G·荣格 著

梁 绿 琪 译

海 佑 校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兴门外广播电影电视部内)

河北三河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110千字 5.25印张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100册

ISBN 7-80035-346-X/B·13

定价：2.40元

《跨世纪》丛书编委会

主编 刘福堂

编委 (按姓氏笔划顺序)

刁 伟	王逸舟	刘福堂
刘桂芝	李丹慧	李金早
苏晓离	沈大德	张守映
郑凯堂	姚锦清	徐东彬
薛 冬		

出版前言

荣格（1875—1961），瑞士心理学家。分析心理学首创人。他是弗洛伊德的学生，因对里比多等观点有分歧，于1914年分开而创新说。他首先提出“情意综”概念，并把人的基本心理态度分内倾和外倾两种。主张把精神（即心）分为意识、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三层。无意识的力量，通过梦境，幻想和错觉的象征作用，显现于意识之中，从而可以解决心理冲突。著作有《无意识的心理学》、《分析心理学论文集》、《心理学的类型学说》等。

荣格在本书中虽然对一些事物的解释与弗洛伊德有所不同，对弗洛伊德的结论作了某些修正和发展，但他的理论体系和基本观点同弗洛伊德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有必要对精神分析学作简单的评价，以帮助读者阅读本书时有所鉴别。

精神分析学说是一个内容复杂、见解奇特、分支繁多的现代西方哲学流派。对弗洛伊德的学说，国内外褒贬不一。但就当前国内情况而言，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种是盲目崇拜，一种是全盘否定。我们认为这两种态度都有偏颇。我

们出版本书的目的之一，也是希望读者能坚持革命和批判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认真地加以分析研究，排除其错误观点和结论，而吸收它在某些问题上的合理因素，供我借鉴。

精神分析学的主要成就有三：第一，精神分析哲学扩大了心理学的研究领域，给传统的心理学以巨大冲击；第二，精神分析学作为一种治疗方法的价值应肯定。从哲学高度来说，是针对精神病的特殊矛盾，用“心药”治“心病”；第三，精神分析学在某些方面有助于剖析思想动机和行为效果的心理状态的复杂性，揭示人格内部的本能的作用。但精神分析学的基本理论体系永远是错误的和彻头彻尾唯心主义的。其重要错误在于：第一，他不是用社会历史的观点来分析认识精神问题，而是用精神分析来解释社会现象。这种生物决定论是完全错误的；第二，他把人的各种极为复杂的思想、感情，欲望和冲动，牵强附会地和性欲扯在一起，并把人的动物性本能（主要是性本能）看成人的一切行为的基本动机。这一来人的主要特征——社会性就成为非本质的，外在的东西，从而抹杀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弗洛伊德还把古希腊的神话故事、经验观察和主观猜想掺杂在一起，编造了一套所谓的性欲、恋母情绪等一类东西。这种任意夸大性欲在人的生活中的作用，是一种没有科学根据的荒唐说法，因此连荣格也不敢完全苟同。在本书中他对弗洛伊德的幼儿性学说持批判态度，说明弗氏这一理论的缺陷；第三，马克思主义坚信任何人的主观的东西，都不能超越或者脱离人赖以生存的社会实践，但弗洛伊德和荣格却运用主观臆测的方法对意识作了多种神秘性的解释。因此我们对他们的许多论述也

只能“姑妄听之”，千万不能盲从。

对西方现代的哲学思潮应当采取一种清醒的批判的态度。但这不等于都要视之为“洪水猛兽”。我们主张让人们在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的同时，也去见识一下形形色色的思潮和流派，然后通过实践和比较得出自己的结论来。

第一版序言

在这儿讲里，我试图把我在精神分析领域的实际经验与目前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与得出这些理论的方法相互印证。这确实是试图对我尊敬的老师弗洛伊德从几十年经验里得出的这些指导原则表明自己的态度。自从我的名字和精神分析学联系在一起之后，有时我也成了这种活动一切责难的对象。说不定被人问得目瞪口呆，——我现在首次作出解释的这些理论见解算怎么回事！差不多在十年以前，当我意识到弗洛伊德在精神病理现象的知识方面，特别是在复杂心理过程的心理学方面已超越了那个时代多么大的距离时，我就不感到自己是处于遭受任何真正批评的地位了。我没有这类权威们的勇气；他们由于无知和无能，而自认为是在理直气壮地进行“批判”。我认为一个人首先要在所涉及的领域里踏踏实实地下几年功夫，然后才能敢于去批判。这些不成熟的、肤浅的批评当然脱不开他的厄运。这些批评现在已经大量丢分，其丢分量并不亚于他们的无可奈何和专业上的无知。精神分析学并未受喋喋不休的闲言碎语所干扰，而

是生气勃勃地继续发展。正如人所共知的：这棵树已经成长茁壮，不只在这个半球上，在欧美也全一样。官方的批评家们也没有更走运。正如浮士德中的Proktophantasmist，他在瓦普儿司之夜中哀悼说：

荒唐，你仍想停留吗？

立刻消失吧！你的愚蠢已真相大白。

这些批评家们忘记了正视这一点：任何存在的事物对它自己的存在都有它分的权利，精神分析学也是如此。我们不会再犯我们对手们的错误：无论是无视其存在，还是否认其存在的权利。但这却使我们有责任根据对事实的专门知识进行公正的自我批判。对于我来讲，似乎精神分析学需要从内部进行这种考虑。

曾有人错误地认为，我的态度表明在精神分析活动中出现一个“分裂”。其实这种分裂只能在有关信仰的事物方面存在，而精神分析学却是与知识及对知识不断改变的表述相关的，我曾把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实用主义的规则作为我的指导原则：“你必须提出每句话的实际兑现价值，把它摆在你经验之河中的工作上，它就显得不像是工作的解释，却更像是许多工作的计划，特别像是对现存事实可能的变化途径所作的指示。就这样，理论变成了工具，而不是对谜语的解答，使我们可以卧在里面休息。我们不返回来躺在它上面，我们是向前运动，并且，有时在它的帮助下，使事情得到自然的印证。”^①

用同样方法，我的批评不是从理论上的争论开始，而

^①实用主义（1907）P.53

是从十年来我在这个领域的严肃工作中获得的经验着手。我知道，我个人的经验无法接近弗洛伊德的卓越的经验 和 见地，虽然如此，我仍觉得我的某些陈述对观察到的事物表示得比弗洛伊德的解释更为适合。无论如何，我曾发现，在我教学工作中，在这些讲演中，我所提出的这些观念特别有助于我努力使学生们了解精神分析学。我绝不把谦逊、适度的批评看作是一个衰落或分裂，相反，我希望由此而促使精神分析活动继续开花结果，并希望为那些缺乏实际经验或受某些理论上的成见所阻碍，至今尚不能掌握这个方法的人，开拓一条通向精神分析知识宝藏的道路。

为了使我能有机会发表这些讲演，我必须感谢我纽约的朋友Smich Ely Jelliffe医生，他约我参加纽约Fovdham大学补习班课程的讲授。有九篇讲演是在1912年9月发表的。我也必须对Bellevue医院Cregory大夫表示衷心的感谢，他在我临床教学时给予我大力协助。

只是我在1912年春准备了这些讲演之后，于当年夏天才得知Alfred Adler的著作*über den nervosen Charakter*（论神经构造），我承认，在许多观点上他和我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但在这里已不便对此作详细的讨论了，且留待将来在别处讨论吧。

C.G.J. 1912年秋，于Zurich（苏黎克）

目 录

出版前言

第一版序言

第二版序言

1. 对早期学说的回顾

精神创伤原理 (2)

压抑的概念 (5)

童年时期性创伤学说 (8)

精神创伤的素质 (10)

在精神创伤中性的因素 (12)

儿童性的幻想 (13)

2. 幼儿性论

性力的概念 (17)

滋养功能的重要性 (19)

幼儿时期多形态的、反常的性力 (22)

作为精力显示的性成份 (23)

3. 里比多的概念

里比多的能量理论	(27)
无意识的想象系统	(29)
里比多的贮存	(29)
生命的三个阶段	(32)
性的术语	(33)
早老性痴呆中里比多的问题	(35)
里比多发生论的概念	(38)
幼儿的反常	(43)

4. 儿童时期神经官能病和病源论的因素

受到批评的创伤理论	(47)
父母的情结	(49)
父母对儿童的影响	(51)
儿童的智力	(54)

5. 无意识的幻想

无意识的概念	(58)
梦	(61)
梦的分析方法	(62)
联想试验	(66)

6. 埃迪帕斯情结

乱伦的问题	(74)
-------	--------

7. 神经官能病病源论

无意识的决断	(77)
里比多的回归	(81)
性的潜伏期	(81)
现时病因的意义	(86)
适应的失败	(89)
返回到儿童水平	(91)

敏感与回归	(94)
敏感是主要的吗?	(96)
回归目的论的意义	(100)
8. 精神分析的治疗原则	
对神经官能病患者幻想的评价	(103)
积极参与幻想	(106)
适应的任务	(108)
感情转移	(112)
忏悔与精神分析	(114)
转移的分析	(116)
转移的解决	(120)
梦的预期功能	(123)
精神分析未来的运用	(125)
9. 一个儿童神经官能病的病例	(127)

1. 对早期学说的回顾

讲述现代精神分析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并不是就这事实——在整个这个研究领域里，面对现代科学提出了一些最难解决的问题（我完全信服）——考虑太多，即使我们把这主要的事实摆在一边，仍有其他严重的困难来干扰材料的提出。我不能提供给你们一个根据实际和理论详细阐明的完美无缺的学说。精神分析学至今还没有发展到这个地步，尽管已花费了这样多的劳动。我也不能对它的发展向你们作出更高明的叙述，因为你们在自己的国家已经有了许多优秀的、一直献身于进步目标的翻译和教师，他们已经在爱好科学的群众中传播了精神分析学方面的普通知识。此外，弗洛伊德，这位精神活动真正的发现者和奠基人，在你们国家已作过讲演并对他的观点做了权威性的阐述。我也曾有幸在美国讲述情结理论的经验基础及精神分析在教育中的应用^①。

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自然会理解我怕重复已经说过的话或

^①见克拉克 (Clark) 讲演集

已经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过的内容。考虑到的另一个困难是有关精神分析的性质在许多地区流行着十分错误的观念。有时几乎难以想象那些错误的观念到底是怎回事。有的时候他们荒谬得让你惊讶，任何受过科学熏陶的人竟会冒出这样和事实不着边的想法。显然，引用这些奇谈怪论的例子是不值得的。还是把时间和精力用于讨论那些其性质本身就会引起误解的问题为佳。

精神创伤原理

尽管在以前的若干场合已经指出，但许多人似乎仍然不知道在这几年的历程中精神分析理论已有相当大的变化。比如，只读过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的第一本书《歇斯底里的研究》的人，至今仍相信：根据精神分析学，歇斯底里和神经官能病一般是由幼儿时期的所谓精神创伤而得。他们愚盲地继续附会着这个学说，殊不知远在15年以前这个学说已被舍弃并被一个完全不同的学说所代替。这种变化对精神分析方法和理论的整个发展是如此重要，以致我们不得不对他做更详细的考查。为了不使你们因这些现在都熟知的病例而厌倦，我只谈在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书中已提到的病例，这些病例我想你们通过英译文已经知道了。你们将读到弗洛伊德在克拉克大学讲演中已提到的布洛伊尔的病例，那时就会发现，歇斯底里的症状不是像以往所猜想的那样，从一些不知道的组织结构原因而得，而是由某些属于高级情感性质的精神经验，即所谓精神创伤或精神伤害而得。现在，我敢肯定，每个对歇斯底里细心留意的观察者，根据自己的经验都

可以认定，巨大的痛苦和烦恼事件事实上往往形成病的根源。这个真理已是老医生们所熟知的了。

可是，到目前为止，就我所知，的确是查尔柯特（Charcot）可能是在派格（Pag）神经震扰理论的影响下，首次将这种观察在理论上应用的。查尔柯特知道，根据他新催眠技术的经验，歇斯底里的症状可以借联想而产生，也可以借联想而消除。他相信那些在日益增多的由意外事件引起的歇斯底里的一般病例中可以观察到的一些情况。创伤性的震扰，在某种意义上，可比作催眠的时刻，因为由此产生的情绪在短时间内造成意志的完全麻痹，在这种状态下，精神创伤就像是受到自我联想一样可以稳定下来。

这种观念奠定了精神发生和发展理论的基础。他留给后人作病因学的研究，以找出在不能称作创伤的歇斯底里病例中，是否也存在着同样的、或者是类似的机制。我们关于歇斯底里病因知识的这个空白已经被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的发现所填补了。他们表明，即使在那种不被认作是精神创伤状态的普通歇斯底里病例中也能发现同样的创伤因素，而且看来是个重要病因。所以自然而然地，弗洛伊德自认是查尔柯特的学生，把这种发现看作是对查尔柯特的观点的证实。随后，根据那个时期的经验被详细阐明的，主要是由弗洛伊德阐明的这种理论，就打上了创伤病因学的印迹，因而它就很恰当地被称为精神创伤原理。

这个理论的新颖之处，除弗洛伊德对歇斯底里症状实在令人赞叹的透彻分析之外，就在于对自我联想概念的舍弃，这个概念在最初的理论中曾是有活力的因素。它已被由于震扰而产生的心理学的及精神物理学的效应这个更复杂的概念

所代替。震扰或精神创伤造成一种激动，这种激动在正常情况下通过表现（精神宣泄）而解除。可是在歇斯底里的情况下，这精神创伤并不完全解除，这就造成了“激动的留滞”，或称为“效应障碍”。经常处于潜势的激动精力被转换机制转变为身体的症状。根据这个观点，治疗的任务就是把这蓄积的激动释放出来，借以从这些症状中将被压抑的和被转变的效应解除。因此，它被恰当地称为“清除法”或“宣泄法”。他的目的是发泄出这被阻塞的效应。所以与现今所采用的精神分析方法对比，那个阶段的分析是与症状紧紧关连的——有的分析症状，或是连同症状开始进行分析工作。如你们所知，这种宣泄方法以及它所根据的原理已被其他专职人员接受，正如他们对精神分析十分关心那样，这些，在本教科书中也都作了肯定的评述。

尽管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的发现事实上无疑是正确的，任何歇斯底里的病例都能很容易地予以证实，可是仍可以提出一些异议来反对精神创伤原理。布洛伊尔—弗洛伊德的方法非常清楚地表明，在现有的症状和创伤经验之间有回溯性的联系，正如心理学的后果明显地随最初创伤情况的需要而发生一样。虽然如此，关于精神创伤在病因学上的重要意义仍受到一些怀疑。举一件事来说，这种学说：即认为神经官能症及其一切新发症，都能与以往发生的事件相关连，这就是说，与病人素质中的一些因素有关——对此，似乎任何了解歇斯底里的人必然表示怀疑。现在流行的看法，是把一切非外来原因的精神缺陷都看作是遗传退化的结果，而不是看作主要受病人心理性质和他的环境所决定。但这是极端的观点，他不能正确地评断事实。在我们考察结核病的病因

时，我们都很清楚如何找出其中间过程。确有这样的结核病的病例，病菌是从幼儿时期在遗传的温床中繁殖起来的，所以尽管在十分好的护理条件下病人仍未能逃脱他的厄运。可是也有这样的病例，其中没有遗传的迹象，也没有病因素质，而仍出现了不幸的传染。神经官能症也同样是如此，它和在一般病理学中的情况并没有根本的差异。关于素质的极端学说和关于环境的极端学说是同样错误的。

压抑的概念

尽管精神创伤理论十分突出了素质，甚至坚持认为过去的精神创伤是神经官能病的必要条件，弗洛伊德以他卓越的经验医术已经发现，并在布洛伊尔—弗洛伊德论文集中阐述了，某些因素与环境学说比其与素质学说更为相像，尽管在当时这种理论的重要性还未被足够地重视。弗洛伊德将观察到的这些综合成一个概念，它远远超出了创伤学说的界限。他称这个概念为“压抑”。如你们所知，所谓“压抑”，我们是指这样的机制，在他的作用下意识的内容被转移到无意识的范围。我们称这个范围为无意识，并定义为我们谓之没有意识的精神因素。压抑的概念是根据这种反复观察到的现象建立的：神经病患者似乎有忘却重要经验和思想的能力，他们忘得如此彻底，以致使人们很容易相信他们从未有过这种经验和思想。这种观察结果十分普遍，任何深入地研究其病人心理的人都很了解。

作为布洛伊尔—弗洛伊德的研究成果，发现了有必要采取特殊的措施，将久已遗忘的创伤经验唤回到意识状态。

我要顺便提一下，由于我们不愿去设想这样重要的事竟会被忘记，所以这件事本身就很惊人的。正因如此，他经常被反对，说是被催眠术唤起的回忆纯粹是“暗示的”，与真实无关。即使这种怀疑是正确的，根据这个原则否认压抑也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大量的病例证明了被压抑的记忆确实客观存在。与这类的许多证明截然不同：通过联想试验，从实验中可能证明这样的现象。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就是与感觉——音调情绪相关的联想更不容易回忆起来而且屡屡被忘忆。由于我的经验从未被核对过，这个发现也和其余的一起遭到反对。只是在最近，Kzaepelin学派的Wilhelm Peters可以证实我早期的发现，证明“痛苦的经验极难准确地再现”。

那么，正如你们所知，压抑的概念建立于可靠的经验基础上。但也有另一方面的问题需要讨论。我们可以问，压抑是由于个人意识决定呢，还是相反，不是由个人意识决定，而是由于回忆中的经验被动地消失？在弗洛伊德的著述中你可以找到卓越的证明，证明有压抑任何痛苦事物的意识倾向的存在。任何精神分析学家都有许多病例清楚地表明，在过去某些特定的时候，患者确实一点都不愿意回想被压抑的内容。有个病人十分郑重地告诉我，他讨厌世俗的说长论短。另一方面，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还有一些病例，即使十分仔细地考察，也不可能表明有意识的压抑或“搁置”的丝毫痕迹。这里压抑的过程仿佛更像是属于被动消失的性质。或者恰像是这些印象被从下方来的某些作用力拉到表层以下。第一种类型的病人给我们的印象是精神上充分发展了的个人，他似乎仅患有自己感情上的特殊的怯懦。但是在第二种类型

中你可以发现一些病例，他表明病人精神发展的严重迟缓，在这种情况下，压抑过程比作自动的机制更为适当。这种区别可以联系到前面所讨论过的问题，涉及到素质和环境的相对重要性。在第一种类型的病例中许多因素受环境和教育的影响，而在后一种类型中素质的因素看来起主导作用。哪方面的治疗会更有效就显而易见了。

如我已经指出的，压抑的概念包含着一种与精神创伤理论内在矛盾的因素。例如，在弗洛伊德分析过的露茜小姐的病例中，病因的重要因素不是在创伤的景象中发现，而是在病人对接受强制的深入了解没有足够的准备中发现。在我们想到神经官能病论文集中最后的阐述时（在此弗洛伊德的经验使得他确认幼儿时期的某些创伤事件是造成神经官能病的根源），我们有了一个充分的印象，就是压抑的概念与精神创伤的概念间并不协调。压抑的概念包括了环境病因论的因素，而精神创伤的概念是属于素质病因论。

起初神经官能病的理论完全是沿着精神创伤概念的思路发展的。弗洛伊德在后期的研究中得出了这个结论：没有确实的效力是由晚年创伤经验所致，因为那些效果只可想象为是在特定素质的基础上产生的。显然，这个谜必须要解开了。在追究歇斯底里症状的根源中，弗洛伊德发现精神分析工作引回到幼年时期，这个链环从现在返回到遥远的过去。这个链子的末端有在童年的迷雾中丢失的恶兆。但是，恰好是在那点，回忆显示了某些性的情景——主动的或是被动的，²⁰它总是联系着某些永难遗忘的事件，导致以后神经官能病的发生。要了解这些情景的性质，你们必须查阅弗洛伊德的著作以及已经出版的许多精神分析论著。

童年时期性创伤学说

从出现童年时期性创伤学说，它就遭到激烈的反对，这并不是因为在理论上一般地反对创伤学说，而是特别地反对性的说法。第一，那种认为儿童可以有性观念，而且这种性的观念在他的生活中还起一些作用的意见，引起了极大的愤慨；第二，说歇斯底里症可能有一个性的基因更不受欢迎。因为这样的贫乏的见解——即认为歇斯底里或者是子宫反射性的神经官能病，或者是因缺少性的满足引起的——刚刚被抛弃。这样，很自然地对弗洛伊德观察是否能成立就有了争论。如果批评只限于这个问题，而没有把那些反对意见用道德上的愤慨装饰起来，就可能进行心平气和的讨论了。例如，在德国，这种攻击的方法完全不可能使得它借弗洛伊德的学说增加任何荣誉。每当接触到性的问题，就引起普遍的阻力和极傲慢的轻视。可是事实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一个，即：弗洛伊德的观察结果究竟是真是假？对于真正的科学精神来讲，只有这个才是重要的。我敢说，他的观察结果初看起来可能像是不可信的，但不可能指责他一开始就是虚假。无论何处进行了真正诚实的、彻底的检验，都绝对承认弗洛伊德建立起来的心理联系确实存在。不过不是那最初的假说，那种假说一直是真正创伤景象的一个问题。

弗洛伊德本人经过进一步实验的结果，也不得不抛弃他的神经官能病性理论的最初阐述。他不能再持最初那种认为性创伤绝对真实的看法。这类显然是性特征的情况，如儿童的手淫、儿童时期早熟的性行为等，以后发现在很大的程度

上是不真实的病因。你们或许赞同批评者所持的怀疑，认为弗洛伊德分析的成果是以暗示为基础而取得的。如果一些冒充内行的人或是其他庸才已宣扬了这种主张，这或许就是这样设想的一些理由。但是无论何人，只要他认真地读了弗洛伊德那个时期的著作，并且也像弗洛伊德那样洞察其病人的心理，就会明白，把初学者疏忽的误解归咎于像弗洛伊德这样人的理解能力是多么不公。这样的讽示只会对编造这种话的人增加不信任。自从对病人在采取一切可能办法防止暗示的条件下作检查以来，弗洛伊德所描述的心理上的联系在原则上仍证明是真实的。这样，我们不得不设想许多幼儿时期的精神创伤完全是怪诞的天性，事实上仅是幻想，而其它精神创伤则具有客观真实性。

对于这个发现，初看起来有点迷惑不解，儿童时期性创伤作为病因的重要意义已成泡影，正如它现在所显示的那样，无论精神创伤是否真的有过，也完全与之无关。经验告诉我们，幻想和真正的精神创伤一样，能造成恰如精神创伤的后果。与此相对照，每个治疗歇斯底里的大夫都能记起这样的病例，强烈的精神创伤印象事实上曾突然地造成了神经官能病。这个观察结果，正如已经讨论过的，只是在表面上与儿童的精神创伤相反。我们很清楚地知道，有更多的人在儿童时期或成年后经历了创伤而没有得神经官能病。所以当其它条件都相同时，精神创伤在病因上并没有绝对的重要意义，将不带任何遗留后果地经历过去。根据这个简单的意见，很清楚，个人的精神创伤必须在具有相当特定的内在素质的情况下才能造成真实的效应。这种内在的素质，由于我们对其隐蔽的、遗传的性质知道得如此微少，现在还没有被

人理解，但是作为心理状态的发展，这种创伤在发病的时刻达到了顶点，并变得明显。

精神创伤的素质

我现在要借助一个具体的实例，向你们表明精神创伤的性质和其心理上的准备。这是一个少妇在突然受惊之后歇斯底里大发作的病例。她曾参加了一个晚会，半夜时由几个相识的人陪同正走在返回家的路上。一辆马车从他们的后面急驶过来，其余的人都躲到路旁，而她却像是吓昏了头，仍留在马路当中在马的前面一直往前跑。赶车人一面甩着鞭子一面诟骂，但都没有用，她跑完了整个这条路。这条路通到一个小桥，在那里她力气完全耗尽，为了避免被马践踏，她当即决心拼命地跳入河中，当时没有过路人拦阻她。1905年1月22日，在这个流血的日子，正是这个妇女来到彼得斯堡大街，这条街正被士兵的子弹所血洗。她周围的人都倒在地上，非伤即亡，可是她，非常清醒而镇静，她看到一个通往庭院的大门，穿过大门她逃到另一条街上。但这可怕的时刻后来并没有惊扰她，她一直感觉良好，甚至比发生这件事之前都好。

这个对明显的震扰没有反应的情况经常被观察到。因此，必然地得出这个结论：精神创伤的程度，其本身对于病因极少有重要意义；每件事都决定于特定的相关情况。这里我们就有了一件解决“素质”问题的钥匙。因此我们曾自问：什么是这马车景象的特定相关情况？这个病人是从奔驰的马声引起恐怖的，刹那间，这对她就像是预示了恐怖的劫

运——死亡或一些可怕的事降临，过一会，她就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在做什么了。

这个真正的震扰显然是从马而来。这个病人容易对这未受注意的事件以如此不可解的方式反应的素质可能是由于马对于她具有特殊意义的事情所致。比如，我们可以推测，她曾因马发生过一次危险事件。后来果然找到了这个事例。当她大约7岁时，她和车夫驾车出去，当时马突然受惊，在陡直的岩岸狂奔，下面是深深的峡谷。车夫跳下了车并喊她也照样地跳下来，但她怕得要死，难以拿定主意。尽管如此，当连车带马坠落下去的那一瞬间，她终于及时地跳了下来。几乎用不着证明，这样的事件会留下极深的印象。可是这还不能解释，为什么在以后的时候，这样一个无感觉的反应会随着一个完全无伤害的刺激而发生。至今我们只知道这以后的症状在她儿童时期已有了前奏。至于在它的病理方面我们仍然处于懵懂之中。

这个病例（其继续的情况我们将在以后揭示）很清楚地表明了所谓精神创伤与幻想起的作用之间的不同。在这个病例中，要从这么一个不重要的刺激得出如此巨大的后果，幻想必须在非常大的程度上起主导作用。起初人们想举证用幼儿时期的精神创伤作解释——依我看来，由于我们对于为什么精神创伤的效应潜伏了这么久、为什么它恰好在这个场合而不是在其它场合显示出来尚不知晓，这个解释并不太成功。这个病人在她的生活过程中必定有过足够多的机会乘车离开车道急速行驶，更早的时候在彼得斯堡大街她经历的极危险的时刻并没有留下丝毫神经官能病的迹象，特别在幼年时期那次难忘的事件应更使得她容易罹病，但有关这个创伤

景象的每件事至今仍然在被解释，因为根据创伤理论的论点，我们还是完全不理解。

如果我返回来仍执意地谈关于精神创伤理论问题，这你们一定要原谅我。我不认为这样做是多余的，因为至今还有这样多的人，尽管他们和精神分析联系得很密切，但仍然坚持着老的观点，而且给予我们的对手们以精神分析学仍在围绕着精神创伤理论打圈子的印象，这些对手们几乎从未读过我们的著作，或是仅仅十分肤浅地浏览一下而已。

现在提出了这个问题：由于素质，一个本身并不重要的印象可以产生这样的致病后果，我们要通过素质了解到什么呢？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正如我们以后将看到的，它在整个神经官能病的理论中起一个重要的作用。我们必须弄明白，为什么这个以往的显然无关的事件仍然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以致在实际生活中他们能够以魔鬼般的、多变的方式干扰我们对事物的反应？

在精神创伤中性的因素

早期的精神分析学派及兹后的信徒们，竭尽全力在这最初精神创伤经历的特殊性质中寻找造成其以后效果的原因。弗洛伊德发掘得最深。他是第一个人而且是仅有的一个人看到某些性的因素与创伤事件的汇合，这种汇合（一般病人对它是无意识的）对精神创伤的后果起主要作用。儿童时期无意识的性特征似乎为这最初创伤经历所导致的持续很久的簇群问题投来一线重要的亮光。这个经历在情绪上的真正重要意义对病人一直是隐蔽的，所以，没有达到意识状态、而

这情绪又从未消磨，从未耗尽。我们或许可以将这经历的持久的簇群后来解释为一种事情必将发生的暗示，对此，仍然是无意识的，并且它的效果只是在特定的时间才发挥出来。

几乎没有必要来举详细的例子表明幼年时期真正性活动的性质是不被承认的。大夫们都很清楚，比如，刚成熟儿童的手淫别人是不能知道的，特别是女孩子。由此不难推论，儿童对某些活动的性质宁愿少意识到，因此，这些经历的真实意义即使到成年时期仍隐蔽在意识之外。在某些病例中，这些经历已完全被忘记，这或者是由于病人完全不知道性的重要意义，或者是由于这性的性质过于痛苦，没有被允许通过，换句话说，就是被压抑着。

正如已经谈到过的，弗洛伊德观察的结果是，性因素与精神创伤相混合是一种具有病理后果的特殊的伴随物，由它导出了儿童性创伤的理论。这个学说的意思是病因的经历是一种性的经历。

儿童性的幻想

这个学说首先遇到广泛的反对意见是，儿童在早期完全没有性感，这使得这种病源论不可想象了。也讨论过对精神创伤理论的修正，说精神创伤一般说来是完全不真实的，它实质上只是幻想。这种说法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相反，这迫使我们在病因的经验中去注意儿童幻想的真正的性的表示，它就不再是某些外来的粗暴的意外事件的印象了，而确实是儿童产生的清晰无误的一种性的表示。即使真正的具有明确性特征的创伤经验，对于儿童，在完全没有他配合的情

况下也不会发生。人们发现经常是儿童自己为这些创伤经验开路并促使其发生。阿伯尔海姆（Abraham）曾完成一些极有趣的有价值的证明来支持这个观点，他结合许多其它同类性质的经验，得出证明，即使成年期的真正的创伤也常常与儿童时期的心理状态有关联，看来也极有可能。完全独立于精神分析学之外的法医学可以提供明显相似的例证来支持这个精神分析学的论断。

这性幻想的早熟表现和它的创伤后果，现在看来似乎是神经官能病的病源。因此人们不得不认为儿童的性能比以往所承认的更为发展。性早熟的病例早就在文献中有记载，例如两岁的女孩定期地来月经，三至五岁的男孩能性勃起，因此能与女性同居。但这些病例都是古怪异常的。所以，当弗洛伊德开始相信儿童不只有原始的性感，甚至还有所谓“多形态的变态的”性能力，而且这是以广泛调查研究为基础的，人们就大为吃惊了。但他们又异想天开，以为这一切仅仅是提示给病人使其联想的，从而是很值得争议的人为产物。

在这种情况下，弗洛伊德的《性学三论》不只招致了反对，而且引起激烈的愤慨。我几乎不打算指出，科学的进步不是被愤慨所推动的，基于精神迫害意识的争论可能适合于道学家——因为这是他们的职务，但并不适合于科学家。科学家必须受真理的指引，而不是受道德观点的指导。如果事情真的像弗洛伊德所描述的那样，那么所有的愤慨就是荒谬可笑的；如果事情不是那样，愤慨就对什么都不会起作用。至于什么是真理，这唯有留给观察和研究去决定。由于把愤慨用错了地方，精神分析的反对者们（只有少数光荣的例

外)，展示出了一种可怜而落后的、有些滑稽可笑画面。精神分析学派尽管未能有幸从他的批评者那里学到任何东西，然而这些批评也没能干扰我们去考察我们的实际结论；尽管由于他们以往、一直到现在对精神分析的研究方法都是一无所知，不可能从他们那里获得任何有益的启示，然而它仍留给我们学派以这样的责任：十分彻底地讨论现有各种观点之间的矛盾。我们的企图不是提出一个相反的理论来反驳过去的一切学说，而是要在科学中引入某种新的观察种类。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做我们一切能做的事来促进意见的一致。的确，我们必须放弃与所有盲目反对我们的人达成理解的尝试，因为这将白浪费力气。但我们确实希望与科学工作者们通过讨论而达到认识的一致。这样，我现在要努力试图把精神分析学观念的进一步发展，以至如何形成“神经官能病性理论”的观点的过程作一概述。

2. 幼儿性论

正如你们在最近的一讲里所听到的，早熟的性幻想，看来是精神官能病的根源，对它的发现使得弗洛伊德设想充分发展的儿童性能力的存在。如你们所知，这个观察的确实性曾引到许多人愤愤不平的争论，在欧洲和在美洲一样，他们说是粗忽的错误和顽冥的幻想把弗洛伊德和他的学派引入歧途，把从来不存在的事看作事实。因此我们被当作是受理性传染病控制的人。对待这一类的“批评”，我必须承认，我没有办法保护自己。至于其它，我必须讲明，科学没有权利从这样的观念出发：认为确切存在的事实并不存在。很可能有人这样说：它看起来极不可能，需要有更充分的证明和更扎实的研究。因此，这也是我们对一种认为从精神分析方法不可能学到任何可靠的东西（因为这种方法本身就是荒谬的）反对意见的答复。根据一个虚伪的假说没有人会相信伽利略的望远镜和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这个方法就我所知可能充满了错误，但这并不妨碍它的应用。在过去曾以相当不完备的器具进行按年代和按地域的观察。除非我们的对手掌握

了科学的证据，否则对这种方法的反对应视为种种遁辞。正是在这一点上将决定讨论的问题——而不是由于论战。

即使我们的对手们称歇斯底里为一种精神性的病症，我们仍相信我们已经发现了其心理上的决定因素，并且对公众的批评无畏地提出了我们的研究结果。任何不同意我们所作的结论的人都有权发表自己对病例的分析。以至今如我所知，尚没有人这样做，至少在欧洲的文献中未见到。在这种情况下，批评者们无权否认我们从开始就已作出的发现。其实我们掌握的歇斯底里的病例，我们的对手也一样可以掌握，而且它们属于精神性这一点也不会因谁掌握而改变的，所以，没有任何事妨碍他们发现这心理的决定因素，这并不决定于方法。我们的对手们只满足于对我们研究的攻击和诋毁，但他们却不知道如何找到个更好的方法。

我们的批评者中有许多人更为审慎和公正，他们承认我们做了许多有价值的观察，并承认通过精神分析方法所显示出的精神联系很可能是有效的，但仍坚持认为我们关于它的概念完全是错误的，没有必要采纳我们使用的“儿童的性幻想”这一术语（此处仅涉及主要概念，其余分歧从略）；他们说，真正的性机能，在某些方面显然不同，因为性的特性只是在青春发动期开始时才获有。

反对意见的平和而貌似合理的语气造成一个值得信任的印象，更应受到我们郑重的对待。它对每个有思想的精神分析者提供了许多自省的理由。

性力的概念

关于这个题目谈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性力概念中存在的

主要困难。如果我们把性力理解为一种充分发展的机能，那么我们必须把这种现象限定在成熟期，并且儿童性能力的说法就是不正确的。但是我们如按照这种方法限定我们的概念，我们就面临着一个新的而且是更大的困难。那么对所有这些和性机能相关连的生物现象在严格的意义上应起个什么名字呢，即如怀孕、出生、自然选择，幼仔保护等等？依我来看所有这些都属于性力的概念，尽管一位著名的同事曾说儿童出生不是性行为。但如果这些事都属于性力的概念，那么无数的心理现象也必须归入此类，因为我知道有数量惊人的纯心理作用是关系到这个范围的。我想只谈一下幻想在性机能的准备和完善中所起的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样我们得到一个高级的性力的生物概念，其中既包括一系列的心理现象，也包括一系列的心理机能。我们可以利用一个老的但却实用的分类，把性力与种类保存的本能视同一体，这种本能在某种意义上可与自卫的本能相对比。

从这个观点来观察性力，我们发现这样的情况就不再惊奇了：种类保存（自然界对此如此重视！）的根源远深于性力，这样说应该是能成立的。只有长到一定程度的猫才捉老鼠，但即使最小的猫至少也玩捉鼠的游戏。小狗嬉戏地企图性交远在性成熟以前就开始。我们有理由来估计人也未脱出这个规律，尽管我们从表面上未发现我们受过良好教养的儿童有这种情况。对原始人儿童的考察证明他们没有脱离生物规范。为种类保存维持生命的本能从幼年就开始显示的可能比起它在性成熟期羽翼丰满地从天而降的可能的确要大得多。而且繁殖器官的发育不必待将来完全成熟时其功能方能被认出，远在此之前就会呈露轻微的迹象。

所以当精神分析学派谈到“性力”时，要把它同更宽广的种类保存的概念要联系在一起，并且不应认为我们的意思只是指这个字平常所包含的肉体感觉和功能的涵义。或许有人这样说：为了避免误解，不应该将幼儿这些最初现象称作“性力”。但这种要求确实是不正确的，因为解剖学上的专门术语是根据充分发展的系统取定的，一般不对虽尚处于发育阶段器官或功能赋予特殊名词。

滋养功能的重要性

对于弗洛伊德所定的这个专门术语，是他对性发展的全过程看而合理地赋予的一个总的名词“性力”，现在虽然还不能发现什么错误，可是由此得出的某些结论，依我看来，是难以获得支持的。因为如果我们自问，第一个性力的迹象可向儿童时期回溯多久，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虽然性力从开始处在含蓄状态，但它只是在脱离母体很长时期以后才显示出自己来。弗洛伊德相信即使幼儿吮吸母乳也是一种性活动，为此观点他受到狠狠地攻击，可是，我们必须承认，如果我们和弗洛伊德一起，设想种类保存的本能（并即性能），是脱离自保本能（亦即滋养功能）而单独存在，并从而得出一个从头开始的特殊发展过程的话，会是相当明智的。但这种思想方法，依我看来，在生物学上是不能采纳的。不可能把假说中生命本能的表现或作用的两种方式分开，并对其中的每种设定一个特殊的发展途径。如果按照我们看到的情况判定。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个事实：在整个有机界，在很长的时期里，生命过程只在于滋养和生长的作用。在许多生物中我

们对此都可以观察得很清楚，例如蝴蝶，它首先是作为幼虫经历了只滋养和生长的无性阶段。人类在脱离母体的幼儿时期正如在胎儿时期一样，都属于这个阶段的生命过程。

这个时期是以没有任何性功能为特征的，所以表明幼儿时期性力的说法在用语上有矛盾。尤其是我们可以问：在幼儿时期的生命功能中，是不是有一些不具有滋养和生长的性质，从而可以名之为性力的？弗洛伊德指出幼儿吸吮时的明显的兴奋和满足，并把这种激动的机制与性行为的机制相对比，导致他设想吸吮活动具有性的性质。这样的设想只有证明了肉体需求的激兴以及它被满足之后的消解是一种性的过程时才是合理的。但是吸吮，具有激动的机制这个事实正好证明了与此相反。因此我们只能说，激动的机制既建立在滋养的基础上，也建立在性力的基础上。如果弗洛伊德从对激动机制的分析得出吸吮具有性力性质的结论，生物学的经验也会证明把性活动描绘成滋养功能的术语也是正确的。这是从两个方向超越了界限，因而就十分明显，吸吮活动不能说成是性的。

可是，我们知道，儿童时期有属于显然与滋养功能无关的其它功能的活动，如吸吮手指和许多它的派生动作。就此看来可以问，是不是这类事属于性的范畴？这些事并不为滋养，但产生乐趣。这是无可怀疑的。可是，尽管如此，仍然还有问题，是不是从吸吮得到的乐趣根据类推法一定称为性的乐趣呢？它同样可以叫作滋养乐趣。这种乐趣获得的形式和取得的位置都完全属于滋养的范畴，因此，后一种说法更为适合。用来吸吮的手是在用这种方法为将来独立进食的动作作准备。既是这样，肯定没有人再强辩，断言人生的最初表示是性力的了。

可是，我们现在所遇到的这个用语，即从没有任何滋养目的的吸吮手指动作中寻找乐趣，是不是完全属于滋养的范畴，仍让我们感到怀疑。我们注意到，儿童成长时的所谓坏习惯与幼儿的吸吮动作，如将手指放入嘴内，咬手指甲，抠鼻子、耳朵等是密切相关的。我们也看到，这些习惯以后多么容易转变为手淫。所以，得出幼儿的这些习惯是手淫或类似动作的第一阶段，因而具有明显的性特征的结论，是无可否认的。

由此对幼儿吸吮作为性动作的描述只是一个简短的步骤。如你们所知，弗洛伊德采取了这个步骤，你们方才已经听到了，我不赞同它，因为在此我们遇到了一个极难解决的矛盾。如果我们设想两个独立的本能并列地存在它就相当容易解决了。那么，吸吮奶头的动作就将既是一个滋养动作，同时也是个性动作，是这两种本能的一种结合。看来这是弗洛伊德的观念。这两种本能明显的并存，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在饥饿和性冲动形式中的表现，在成年人的生活中会见到。但在幼儿阶段我们只能见到滋养的功能，它诱导为愉快和满足。它的性特征是可以争论的，因为它是根据错误的逻辑推断的，即将未经证实的前提设想为真实的，把需要证明的问题作为当然结论。事实表明，使得愉快的首先是吸吮动作，而不是性的机能。取得愉快和性力决不等同。如果我们想象在儿童中这两种本能并存的话，我们就欺骗了自己，因为这时我们是把从成年人心理状态观察到的结果加之于儿童心灵上。这两种本能并存或是单独地显示不是在儿童中发现，因为他们的本能系统中有一个系统还完全没有发育，或是发育十分不完全。如果我们持的观点是追求愉快就是有些

性的性质，那么，正好可以反论，说饥饿是一种性的追求了，因为它通过吃饱找到愉快。可是，如果我们这样地玩弄概念，我们就不得不允许我们的对手将饥饿这术语用于性力了。这一类的偏见在科学史上曾一次又一次地发生过。我说这些话并不是责备，相反，我们必须欢迎有这样的人，他们有足够的勇气持极端的和偏颇的见解，遗憾的是每个人维护自己的偏见都这样易动感情。科学理论仅仅是按事物可观察到的样子提出的意见。

两种本能系统并存是一种假说，它无疑会使问题简化，但不幸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与观察到的事实相矛盾，如果遵循这种说法，就会导致站不住脚的结论。

幼儿时期多形态的、反常的性力

在我试图解决这个矛盾之前，我必须对弗洛伊德的性理论和它的演变情况再多讲一些。正如我前面已解释过的，儿童时期性的幻想活动，明显地起到创伤的效果，这个发现导致了违背以往所有观点的一种假设，即认为儿童一定具有几乎完全发育的性力，甚至是一种多形态的、反常的性力。它的性力看来不是集中于生殖机能和异性上，但它在儿童自己的身体上起作用，因之称它是自体性欲的。如果其性的兴趣向外指向其他人，则那个人的性别如何对于儿童是无关重要的，因为儿童极易发生“同性恋”。代替了这不存在的、受局限的性功能的，是若干所谓坏习惯，根据这个观点，这习惯表现的是反常动作，因为它与随之而来的变态极为相似。

作为这样构想的结果，通常认作是一个整体的性力就被

分作了许多单独的冲动力，并且由于性力被默认为发自主生殖器，弗洛伊德得出了“性感区”的概念，他指的性感区是嘴、皮肤、肛门等。

作为精力显示的性成份

根据这个观点，通常这较后的“单形态的”性力是由若干成份组成。首先它属于同性和异性的成份，然后有了自体性欲的成份，再后是各种性感区。这个概念可以和罗伯特·麦尔（Robert Mayer）以前物理的状态相比拟。当物理现象的场只单独存在时，每人都相信单质的性质而不能正确地了解其相互关系。能量守恒定律为力相互之间的关系找到了规则，同时废弃了把这些力看作只有一种绝对的、单质特性的概念，而将它们用相同的能来显示。儿童的性力分裂为多形态的、反常的性力，其情况正类同于此。

经验使我们认定各单独的成分常常互换，例如，这样的情况已越来越被承认：变态发生在正常性力损失之时，而一种性力形式施用的增加就伴随着另一种形式施用的减少。为使情况更清楚我举一个例子：一个青年有好几年犯同性恋，当时他对女孩毫无兴趣。当他快到20岁时这种不正常的状态逐渐改变了，他性爱的趣味变得越来越正常。他开始对女孩有好感，而且不久他完全克服了同性恋的残迹。这样持续了若干年，并且有过几次成功的恋爱。然后他想结婚，但这时他遇到严重的挫折，因为他崇拜的女孩将他甩掉了。在这种状态下他完全放弃了结婚的想法，此后他就不喜欢所有的女人。有一天他泄露，他又开始同性恋。这个青年再一次

被一种特殊的烦恼所笼罩。

如果我们把性力看作是由固定的异性成份和固定的同性成分组成，我们就无法解释这个事例。因为固定成分的设想排除了任何种类的转移。为了正确地看待它，我们必须假定性成份有很大流动性，甚至达到这样的程度：当另一种成份占据了这前景时，此种成分就几乎完全消失。如果没有别的情况，只是发生了位置的改变，则同性的成份全力陷入无意识区，而将意识的领域留给异性成分。新科学知识引导我们推断出此后必将从无意识区产生同等效应。这些效应必须被看作是对异性成份活动的抗力，也就是作为对女人的抗力。但在我们这个事例中并没有这种证明，尽管存在着这种影响的模糊痕迹，可是它是如此清淡，以致不能和以前同性成份的强度相比拟。

按现有的理论，仍不可理解，这被看成是如此顽固的同性成分怎能不遗留任何活动的痕迹而消失呢？而且很难想象这种转移是如何发生的。必要时人们或可理解在青春发动期通过同性阶段的发展，以一种固定的、明确的形式为以后正常的异性爱奠定基础。但我们又怎样解释，这逐渐发展的结果（其一切表象都与器官成熟过程紧密相关）在某个印象的冲击下就突然消除，以便为一个先前的阶段腾出空位呢？或者，如果假设两种活动的成份同时并存，又为什么只是其中的一种活动而不是另一种也同样活动呢？有人可能反对说，男人的同性成分事实上表明它更容易表明它对别的男人的一种特殊敏感。根据我的经验，造成这特有行为（当前在社会上我们见到这样多的例子）的明显原因，是在作为依赖她们的一种特殊形式的、与妇女交往中的一种恒久的困扰，这会

构成“增加”，它被在同性关系中的“减少”所抵偿（当然这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原因是人性格的幼儿状态）。

所以，对这种情景的改变急需给予适当的解释。为此我们需要一个动力学的假说，因为这些性的变换只能设想为动力的或能的过程。除去动力关系中的一种交替，我无法想象一种功能作用的形态如何能这样消失。弗洛伊德的学说考虑到这个必要性。他的组成成分的概念、功能作用单独模式的概念，开始趋向衰弱，这情况在实践中比在理论上出现得更早，最终它被能的概念所代替。对此选用的名词就是“里比多”（libido）。

3. 里比多的概念

弗洛伊德在他《性学三论》中已经引入了里比多的概念。文中他说：

在生物学中用“性本能”的设想表明人类和动物有性需求存在的事实。相类似的滋养本能，就是属于饥饿。在日常的语言中没有和“饥饿”配对的词，但科学为此使用了“里比多”这个字眼。

里比多这个词按弗洛伊德的定义指的是一种独特的性需求，因而弗洛伊德用里比多表示的每件事都必须理解为性的需求或性的欲望。在医学上里比多这个词无疑是用在性的渴望、特别是性欲上。但这个字的古典用法，正如在西塞罗（Cicero）、塞勒斯持（Sallust）和其他人那里所见到的，并不是限制这么严，在那里是用于更一般意义的热烈欲望。现在我提及此事，是因为往下在我们的争论中它将起重要作用，并且知道里比多这个词确实有比医学上更宽广的意义也是重要的。

里比多的概念（我们试图将弗洛伊德理解的里比多的性

意义能保留多久就保留多久)代表的动力因素,正是我们为了解释心理情景的变换而要寻找的。这个概念使得对那些有疑问的现象更容易明确地表达。代替同性成分向异性成分的不可理解的交换,我们现在可说成是里比多逐渐从同性作用中移开,而以同样的量转到异性作用中。在这过程中,同性成分几乎全部消失,留下的只是一个空白的可能性,表明它自己什么都没有。它的真实存在被门外汉理直气壮地否认着,正如他会否认自己有可能是杀人犯。里比多的概念也帮助解释性功能各种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它脱离了多种性成份的原始观点,多性成分观点对精神能力带有过多的旧哲学观念的味道。它的位置被里比多所代替。里比多有极不同的施用能力。以前的“成份”只代表可能的活动模式,里比多的概念在被分成许多根的分裂的性力位置放上了一个动力单元,缺少了这个动力单元那些一度曾很重要的成分就只剩了潜在的活动力而再无其它了。这种概念的发展极为重要。它为心理学完成的进展正如能的概念引入物理中一样。正如能量守恒理论使各种力失去了其单质的特性,而将它们用单一的能来表示那样,里比多的理论使性成分失去了其作为精神能力的单质的重要性,而仅赋予它以现象上的价值。

里比多的能量理论

这个观点反映事实远比成分论要好。用里比多的理论我们能很容易地解释前面提到的青年的事例。当他要结婚时他所遇到的挫折驱使他的里比多离开异性模式,其结果是它又潜用同性形式,这样就又惹起了早期的同性恋。在这里我不

禁要说它与能量守恒定律是如此近似。对这两种能量，人们都不禁要问，当人们看到一种能量消失了的时候，此时该能量又出现在何处呢？如果我们把这个观点作为人的行为心理的解释原则，我们将得到一个惊人的发现，我们能看到，在个人心理发展类型极不同的阶段，互相由一个能量关系相联系。任何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个人特别死心眼、或是病态犯罪，或是态度偏激时，我们知道那里必有过多的里比多，并且知道这超量的里比多必然取自其它一些地方，因而在那里一定太少。根据这个观点，精神分析就是一种帮助我们去发现里比多太少的地方的方法或如何使功能恢复平衡的方法。这样，神经官能病的征兆必须看作是由别处取得功能而使某一处呈现里比多过多的功能过强症状，而精神分析学家的任务就是去发现那些里比多被取走或从未被用过的地方。

在这以缺少里比多为主要特征的综合病症（例如冷漠状态）中，还必须从反面提出问题。即当发生这情况时我们必须问，这里里比多到哪里去了？表面看来病人给我们的印象是没有里比多，而且有许多大夫就按表面现象论断。这种大夫有个简单的思维方法，正如同没开化的人看到日蚀就信以为太阳被吞了下去或是被杀死了那样。可是太阳只是隐没了，病人的情况也是如此，里比多还在，只是见不到，病人自己也达不到罢了；在表面上，这里是缺少里比多。精神分析学家的任务就是把里比多从它隐存的地点、从病人自己不能找到的地方寻找出来。这个隐存地点就是“非意识”区，我们也可称之为“无意识”区，但这并不意味赋予它任何神秘的意义。

无意识的想象系统

精神分析曾告诉我们，存在着无意识的心理系统，按有意识的想象来类推，它可以被描述为无意识想象系统。无意识想象系统，包括神经病的冷漠状态，是里比多的目标。我们充分意识到，当我们谈到无意识想象系统时，我们只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在此，我们的意思不外乎是：作为一种必要的假设，我们接受了意识之外的精神实体的概念。经验告诉我们，我们每天都可以说，有一些无意识精神过程明显地影响了对里比多的节省。每个精神病医生都知道无意识想象中其中一个复杂的妄想方式比较突然地爆发出来这样的病例，证明必然有无意识的精神发展准备了条件。因为我们很难想象这样事情会正像它进入意识那样地突然发生。我让自己离题去谈关于无意识的问题，意在指出，关于生命活力所投入的变化着的局部范围，我们不只要计算到意识，还要考虑其它因素，考虑到无意识，有时里比多就消失在无意识中。现在我们可以重新讨论由于采纳了里比多的理论所产生的进一步的后果了。

里比多的贮存

弗洛伊德曾告诉我们，在精神分析的日常实践中我们也见到，在幼儿时期就存在许多倾向的萌芽，代替着以后的正常性力，这些倾向在以后的生活中被称为“变态”。我们不得不承认弗洛伊德有权对这些倾向使用一个性的术语。通过

对里比多概念的介绍，我们可知道，在成年人中这些看来是正常性力的根始和来源的基本成份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并减弱得仅成为潜能。它的有效原则，它的活力，可以说是里比多。除去里比多这些成分就意味着实际上一无所有。如我们所知，弗洛伊德赋予里比多一个明确的性的涵意，正像“性需求”之类。这个意义的里比多通常都以为只是在青春期才出现。那么，我们又如何解释儿童具有多形态的反常的性力这个事实呢？而且里比多促使的不只是一种反常而是若干种。假如里比多，按弗洛伊德的意义，只是在青春期出现，它就不能解释幼儿的反常，除非我们按照组成成份的理论把它看作是“精神上的才能”。这就要远远背离我们的希望而导致理论上的混乱，我们将违背方法论的公理：“解释的准则不能多于必要的准则”。

没有别的可能，只能假定在青春期以前和以后都是同一的里比多。因此，幼儿的反常以真正同样的方式在成年人中发生。常识要反对这种观点，因为显然儿童的性需求不可能和性成熟的人相同。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观点求得妥协并同弗洛伊德讲：虽然在青春期以前和以后的里比多是相同的，但它的强度却不同。不是像青春期以后那样有强烈的性要求，在儿童时期只有轻微的性需要，在此愈前它的强度愈小，在大约一岁左右，就只有一点痕迹了。我们可以表明，从生物学的观点我们同意这种说法。但我们也必须假定，在以前的讲演里涉及到的广义性力概念范围内的每件事物，都是以已经缩小的形态出现的，其中包括所有心理和性力的激动表现，诸如对情爱的需要、妒忌以及其它许多激动现象，而决不包括儿童的神经官能病。无论如何，必须承

认，儿童的这种激动现象完全不给人以“缩小”的印象，相反，它在强度上堪与成年人匹比。我们也不能忘记，正如经验所表明的那样，儿童性力反常的表现往往比成年人更醒目，甚至看来比成年人更为发育。当成年人表现出其变态也发展到相似状态时，我们可以正确地料到，其正常的性力以及与生物相适应的许多其它重要形式会全部消减，这正像儿童病例的正常情况那样。一个成年人当他的里比多不是用于正常的功能时，它被正确地称为变态。同样，对于儿童也有理由说：他是多形态的反常，因为他尚且不懂正常的性功能。

这些考虑使人联想到，或许里比多的总量永远是相同的，在性成熟期并不出现巨大的增长。这有些大胆的假说很清楚，主要是依靠了能量守恒定律，根据能量守恒定律，能的总量保持恒定。可以想象，青春期的顶峰只有当里比多的初期辅助性的使用逐渐倾注到性力的一个固定渠道而且无效时才能达到。此刻我们必须满足于这些联想了，因为我们往下还必须把注意力放在有关儿童里比多性质的一个批评论点上。

我们的许多批评者不承认儿童的里比多只是在强度上比成年人的小，而在性质上基本和成年人相同。成年人求生本能的冲动是和生殖的功能相关的，而儿童的则不这样，或是在特殊的例子中这样。这就产生了区别，对这种区别的重要性不能低估。依我看来，这种异议是应该的。在未成熟和充分发育的功能之间当然有值得注意的区别，正如同玩耍和严肃的事有区别，放空枪和实弹射击有区别那样。这会让儿童的里比多带有无可否认的、无害的特性，而这正是常识所

需要的。但无人能否认空枪射击也是射击。我们必须使人习惯于这个观念，即性力的确存在，即使在青春期以前，确切地说，可回溯到幼儿时期。而且我们没有理由不把这不成熟的性力表现称为性的。

当然，对于那些承认儿童的性力是如我们所描述的形式存在，但不同意弗洛伊德将诸如吸吮等幼儿的现象指明为性的现象的反对者，这些话是没有反驳效力的。我们已经讨论过促使弗洛伊德将性的术语这样引伸的原因，我们也提到过，正是这个吸吮动作按照滋养功能的观点，怎样恰好也能予以表明，并且，根据生物学，这样的推导事实上比弗洛伊德的观点更为合理。但因这些活动以及类似的口部位的活动在以后的生活中以无疑是性的外貌再次出现因而可能被反对，殊不知这只是意味着这些活动在以后可被用于性的目的，但却不能证明其最初的性的特性。因此，我必须承认，我找不到理由从性力的观点看待儿童时期产生快感的活动，倒是比较有相反的理由。依我看来，就我对这些难题所能作的正确判断，根据性力的观点必须将人的生命分为三个阶段。

生命的三个阶段

这最初阶段包括生命的最初年代，我称这个时期为性前阶段。它相当于蝴蝶的幼虫阶段。它的特征是几乎只有滋养和生长的功能。

第二个阶段包括儿童第一阶段之后直到青春期的年代，可称之为青春前阶段。在这段时期有了性力的萌芽。

第三个阶段是从青春期往后的成年期，可称之为成熟时

期。

你们不会不注意到，最大的困难是划定性前阶段的界限。我准备承认关于这个问题我很拿不准。当我回顾我自己对儿童作精神分析的经验——可惜，到目前为止，它的数量还不是太多，同时，又记取了弗洛伊德所作的观察，依我看来，这个阶段的界限当在三至五岁之间。当然，每个人的情况各异。这个年龄在许多方面都是重要的。这样的儿童已经长得不再是必须依赖他人的娃娃，若干心理功能已被掌握。从这个时期开始，在幼儿遗忘和意识不连续的蒙昧昏暗的影象图版上开始闪现断续记忆的光芒。在这个阶段，看来是向新人格的解放和集中朝前迈了重要的一步。就我们所知，可被恰当地称之为性的兴趣和活动的迹象也是出现了这个时期，尽管这些征象仍带有害和无害和天真的儿童特点。

性的术语

我想我已充分阐明为何对性前阶段不能使用性的术语，所以我们现在可以从我们刚达成的观点考虑另一些问题。你们还记得，我们对儿童时期里比多减少的问题停止了讨论，因为用那种方法不可能得出明确的结论。现在我们再一次拾起这个问题，我是多么希望看到能的概念对目前我们的系统解释是否合乎时宜啊！

我们已知道，幼年和成年间性力的区别，按照弗洛伊德的学说，可以用儿童时期性力强度减小予以解释。可是我们刚提出了为什么认为这种见解——即认为儿童的生命过程，除性力之外，其热烈程度比成年人都小些——不可靠的理

山。我们可以这样说，除性力外，激动现象和神经过敏的征象如果儿童有一些的话，它的强度和成年人完全一样。而且，按能的观点，这全都是里比多的表现。因此，就很难相信里比多的强度造成成年和未成年间性力的区别。这个区别倒更像是由于里比多限定部位（如果允许这样说的话）的改变所致。与它在医学上的定义相对比，儿童的里比多被精神和肉体的辅助功能所占有的远远比局部性功能所占有的多。这样，有人总想把“性的”这个词从“里比多”这个词上撤回，并把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中给里比多作的性的定义勾掉。这样作的必要性，当我们自问在生命的初期，也就是在性前阶段，儿童强烈的快乐和忧愁是不是只被性的里比多所决定时，就真的紧迫起来了。

弗洛伊德自己就曾宣称支持这样的设想，我就没有必要再在这里重复使我假定有一个性前阶段的原因了。这“幼虫”阶段具有滋养的里比多但没有性的里比多，如果我们想保持里比多理论提供给我们的能量观点的话，我们就必须采取像这样的看法。我想这不会有什么问题，只是放弃里比多性的定义罢了；否则我们将失掉里比多理论中宝贵的东西，即能的观点。很长时间以来，精神分析学派就有强烈的要求给里比多的概念以喘息的空间，让它脱开性定义的狭隘限制。人们坚持不懈地主张对性力不取过分字面的意义而取广义的解释，强调它还确实是如何模糊不清以致不能使严厉的批评者满意。

如果我不是从性的定义上而是从能的观点看到里比多概念的真正价值，我想我没有误入歧途。由此我们才掌握了一个十分有价值的启发式的原则。我们也感激这能的观点所赋

予的有活力的形象和相互关系，在这精神世界的迷茫中它对我们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弗洛伊德学派的人不听一听那些谴责我们的里比多理论是神秘主义和不可理解的批评会犯错误。当我们相信，我们能使里比多将精神生活中能概念的传输工具加以性的特征时，我们是自己在欺骗自己。如果弗洛伊德学派中许多人还仍然相信他们掌握着定义明确的，可以说，具体的里比多概念，他们就是不明白已经使用着的这种概念已远远超出了任何性定义的界限。所以当批评者反对这里比多的理论，说它企图解释的事并不专属于它的范围时，这批评是正确的。这的确造成了我们是在运用神秘物的印象。

早老性痴呆中里比多的问题

在我的著作《里比多的变形和象征》中，我试图提供这种逾越范围的证明，同时表明需要一个新的、只考虑能观念的里比多概念。弗洛伊德当试图把能的观念适用到一个著名的早老性痴呆病例，即所谓Schreber病例中时，自己不得不承认里比多最初的概念可能太狭窄了。这个病例除其它事情外，还关系到心理学中著名的早老性痴呆问题——失掉对现实的适应性，一种奇异现象，主要是这些病人对创造一个自己内心的幻想世界的特别倾向，为此目的放弃对现实的适应。

作为这种现象的病症表现，即缺乏感情上的和谐，大家都会知道这是实际功能的严重失常。对这些病人经过大量的精神分析工作，我们确定，这对现实缺少适应性的情况是被

幻想的不断增加补偿了的。幻想达到的程度竟可使病人觉得梦中的世界变得比外界的现实更真切。Schreher在他关于世界末日的幻想中作了许多绝妙的比喻描述，他越是形象地描述他的幻想，越是真实地描写了自己现实感受力的丧失。因而导致了我们的动力学解释，这解释很简单：我们说，里比多越来越多地从外部世界撤入幻想的内心世界，并且在那里，作为失掉世界的代替物，必然创造一个所谓实体的相等物。这个代替物是一点一点地建立起来的，可以说，看用什么样的心理材料构筑了这个内心世界是十分有趣的。

这样看待里比多转移的方法是以这个词的日常使用为基础，其原始的、纯性的涵意已很少被人记起了。在实际活动中，我们只轻描淡写地说成里比多，免得在理解上给别人刺激。正如Claparede有一次对我提到的，人们可以像使用“兴趣”这个词那样使用它。也许这个词的习惯用法，已经很自然地而且自发地发展到，用它有可能把Schreher的世界末日的幻想简单地解释为里比多的撤离。在这种情况下，弗洛伊德记起了他给里比多最初下的性的定义，并试图同意这在当时已悄悄采用的改变了的意义。在他的关于Schreher那篇文章中，他自问，是不是精神分析学派称之为里比多、并将它设想为“从性的源泉取得的兴趣”的东西与兴趣一般都符合？你们看，这样提出了问题，弗洛伊德向自己提出了（Claparede）在实践中已经回答了的问题。

弗洛伊德首次提出在精神分裂症中丧失感知现实的能力（对此，在我写的《早老性痴呆的心理学》中已引起了注意）是否完全由于性爱兴趣撤离的问题，或者这与真实的兴趣一般是否符合的问题。我们很难设想这正常的对现实适

应的功能唯独被性爱的兴趣所把持。事实是，在很多病例中性的实际能力都完全消失，所以在这些病人中没有一点心理适应的痕迹能被发现（在这些情况性的实际能力被复杂的内容所代替）。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不只是性爱的兴趣，而是任何一切兴趣都已失掉，同时并失掉对现实的全部适应能力。

早些时候，在我的《早老性痴呆的心理学》中，我用“精神能量”来表示以试图摆脱这个困难，因为我不能把早老性痴呆的理论建基于性定义的里比多转移理论上。我的经验——在当时主要是精神病治疗——不允许我了解后一理论。只是在后来，由于增加了对歇斯底里和困扰型神经官能病方面的经验，才能证实它对于神经官能病的部分正确性。十分肯定是性的里比多的不正常转移，在这些病中起着重要作用。可是尽管在神经官能病中发生了典型的性的里比多压抑，却从未发生像在早老性痴呆中那样典型地丧失全部现实适应力的情况。在早老性痴呆中是这样彻底地丧失实际性能力，以致它必定包括了丧失其它本能力量，它的性特征必然被绝对否定，因为没有人有可能坚持认为现实适应力就是性功能全部。而且如果是那样，则在神经官能病中性爱兴趣的撤离就必然地要引起正如发生在早老性痴呆中那样的现实适应能力的全面丧失，可是，正如我前面所说，事实并非如此。

考虑到的另一件事——弗洛伊德在他关于 Schreber 病例的著作中也指了出来——是性里比多的内向导致自体包围，这就可以想象有可能产生丧失现实适应能力的效果。这当然是企图用这种方法解释丧失的心理。但是当我们更深入

地考察由于性的里比多撤离和内向所能发生的各种情况时，我们了解到由此产生禁欲和隐逸的心理是可能的，但不能产生痴呆。隐士的全部努力仅仅是消灭任何性兴趣的形迹，而早老性痴呆完全是另一回事。

这些事实使我不可能将弗洛伊德的里比多理论应用到早老性痴呆上。我的意见还是按弗洛伊德的里比多概念的观点，Abraham关于这个题目的短文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Abraham认为偏执狂系统，或者精神分裂症的症状是由于性的里比多从外部世界撤离所产生的见解，根据我们现在的知识不能证明是正确的。因为，正如弗洛伊德明确指明的，里比多单纯的内向或倒退永远是导致神经官能病，而不导致早老性痴呆。依我看不能简单地把里比多理论移用到早老性痴呆上，因为这种病表现为丧失现实适应性，而丧失现实适应性不能解释为唯独丧失性爱兴趣。

里比多发生论的概念

在我的《早老性痴呆的心理学》一书的前言中，不顾我对弗洛伊德指出的心理机制已承认这事实，而对性力普遍存在的看法采取了保留态度，这是被当时对里比多理论的看法所决定的。单根据性里比多的原理，其性的定义使我无法解释这种功能紊乱情况，这种紊乱对饥饿的驱策力和对性有同样多的影响。很久以来，我觉得弗洛伊德的里比多理论对早老性痴呆并不适用。在我分析的著作中我曾指出，随着我经验的增加，我对里比多的概念逐渐发生变化。代替了弗洛伊德在“三论”中提出的描述式的定义，逐渐形成了里比多发

生论的定义，它使我有可能将“精神能”这个表述用“里比多”一词代替。我必须告诉自己：如果适应现实的功能至今只在很小的程度上属性的里比多而在极大程度上属其它本能力，那么，从心理发生的角度讲，考虑现实适应的功能是否不属于，至少在极大的程度上不属于性的根源就十分重要了。对这个问题现在不可能直接回答，但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迂回的途径接近它。

浏览一下发展史，足以表明，没有任何性迹象的大量复杂的功能，在原始不是别的，只是繁殖本能的各分支。如我们所知，当回溯到动物王国时，繁殖的原则出现一个重要的变化：大量必须有受精机会的配偶子，为了可靠地受精，对幼小的有效保护就逐渐减少。卵子和精子生产的减少释放出大量的能量以转化为相互吸引和保护后代的机制。这样我们发现动物中最初的微妙的兴奋不安，是服从于繁殖的本能并只限于繁育的季节的。当它们的器官逐渐定形并达到功能独立时，这些生物现象的原始性特征就逐渐消失。尽管可能悦耳的声音原来无疑属于和繁殖有关的范围，但如把悦耳声音统列入性的一类就将是不合理的、荒诞的概括了。这样的术语就等于在矿物学的教科书中讲述科伦大教堂，只是因为它包含着大量的石头。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里比多是作为繁殖本能或作为种类保存本能谈论的，并且考察的界限未超出将里比多与饥饿对比，用的方法和将种类保存的本能与自我保存本能（自卫本能）对比的方法相同。当然，在自然界这人为的区别是不存在的。在那里我们只看到一种持续的生命的渴求，一种求生的愿望，它要通过个体的保存求得确保整个种类的延续。至

此我们的里比多概念与叔本华的“意志”相符合，既然一个运动自外界感受，则只能作为内部意志或愿望的显示而被了解。一旦我们大胆地设想，这最初用于生产卵子和精子的里比多，现在被牢固地组织到，比方说建巢穴的功能中，而不能再用于其它方面，我们就不得不在这个概念中，像包括饥饿一样，包括每种努力和每种愿望，就再没有理由在建巢穴的愿望和饮食的愿望之间作原则的区别了。

我想你们已经了解到我们的争论正把我们引向何处。我们正处在将能的观点始终不渝地贯彻于讨论的全过程，把能的活动模式放在纯粹正式的功能作用上。正如老的科学经常谈自然的相互作用，而这种老观点却被能量守恒定律所替代。现在也是如此，在心理学的范畴，我们正寻找一种设想为同质的能量以取代那种精神协调的相互作用。这样我们注意到那种认为精神分析学派在运用里比多的神秘概念的正确批评。

为了这个原因，我必须驱散以为整个精神分析学派对里比多已有明确的认识和具体概念的幻影。我主张我们所运用的里比多不只是不具体或未了解，而且是个十足的未知数X，是个纯粹的假说，是个模型或筹码，比起物理界所了解的能并不有更多可具体想象的余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严重逾越那个专门的界限——过去当我们试图减少互相协调作用时这种情况曾屡次发生。（我们永远不可能根据光的原理解释固体力学或电磁现象，因为力学和电磁学并不是光，而且，严格地说，那不是物质力相互变换，而是能在改变其外部形状。力是现象的显示，而作为这种相互关系基础的则是能的假想，当然，它完全是心理学的，与所谓客观真

实无关)。我们企图用这物理上已取得的同样的概念成就来完成里比多理论。我们想让里比多的概念处于真正属于它的位置(即纯粹属能的位置),这样我们可以根据能来想象生命的过程,并用绝对等效的关系来代替那相互作用的老观念,这样,如果我们遇到生机说的叫嚣就不会被困扰了。我们远远脱离任何对特殊生命力的痴信,正如远远脱离任何其它形而上学的主张。里比多是简单地意指能的名称,它在生命的过程中显示自己,且“主观上”觉得是一种意动和愿望。几乎没有必要为这个看法辩护。它把我们带入了寻求从能的角度理解外观世界的强烈意向。足可以这样说,我们对每件事的理解,只能理解为一种力的效果。

在这各式各样的自然现象中,我们看到愿望——里比多采取了极不同的形式。在幼儿时期,它首先完全表现为增强体质、滋养本能的形式,当身体发育了,新的活动范围为里比多成功地敞开,性力是一个明确而又十分重要的活动范围;它显得,第一,就是和滋养功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人们只想到低级动物和植物中滋养因素对繁殖的影响)。在性力的范围里比多获得一种形态,由于它十分重要,以致我们完全有理由采用“里比多”这个含糊的名称。这里它首先呈现为一种形态没有显著特点的初级的里比多,如导致细胞分裂、发芽等的个体的能的增长。

由于这初级的、性的里比多(它从一个小的有机体产生成百万的卵细胞和精子),在出生率的严格限制下发育了各分支。分支的功能被一种种差的里比多所保持。这种种差的里比多由于被剥夺了生产卵和精子的原始功能,现在是失去性特征的,也没有任何可能恢复它原始的功能。这样,这整个发

展过程就在于将初级里比多（它不生产别的东西，只生产配偶子）日益吸收到相互吸引和保护后代的第二功能中。这种发展必需先有一个与一般现实适应力很不同的、更为复杂的关系，真正的现实适应功能与繁殖的需求是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作为一种关联，它相应地提高了对现实的适应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现实性功能的存在唯独归因于繁殖中的差异。我完全明白滋养功能所起的无限巨大的作用。用这种方式，我们得以对初始制约现实性功能的因素有一些深入了解，如说其驱策力是性的就根本错了。初始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性的，但尽管如此，却并不只是性的。

这初级里比多吸收到第二功能中的过程或许总是以“里比多流注”的形式出现。这就是说，性力已从它初始的意图转化，它的一部分被用于相互吸引和保护幼小的机制——这些功能逐渐提高了你放入种类发展史中的等级。性里比多从性的范围向第二功能的这种转移仍在发生（例如马尔萨斯主义就是这种自然倾向的一种人为的继续）。任何地方这种动作发生而不损害个体对它的适用时，我们称之为“升华”，而当这种意图失败时称之为“抑制”。

描述论的精神分析观点把众多的本能（其中也有性本能）看作是一部分现象，另外，还承认某些里比多流注于无性本能中。

发生论的观点则不同，它把这众多的本能看作是来自一个相关的整体，即里比多；它查寻这里比多的各部分如何继续不断地从繁殖功能分裂出来，作为里比多流注加入到新形成的功能，最后合并其中。

根据这个观点，我们可以肯定地讲，精神分裂症患者是

将里比多从外部世界撤回，因而呈现丧失现实适应力而由增加幻想活动来补偿这一症状。

幼儿的反常

现在我们将把这新的里比多概念适用于幼儿性力的学说，它对神经官能病的理论是十分重要的。在幼儿身上，我们发现里比多像是能，像是一种有生机的活动，首先显示在滋养的范围，那里，在吸吮的动作中，食物随同有节奏的运动被吸入，带着各种满足的样子。随着个体的成长和其器官的发育里比多为自己开辟新的活动渠道。产生快乐和满足的节奏运动的初级模式现在转移至其它功能范围，而以性力为其最终目标。很大一部分“滋养里比多”转化为“性里比多”。这种转化在青春发动期并不是突然发生，而是在儿童时期的生长过程中逐渐实现的。里比多只能艰难地、十分缓慢地从滋养功能的形式中解脱出来以便过渡到性功能中去。

在这种转换阶段，就我所能判断，具有两个不同的时期：吸吮时期和替代为节奏运动的时期。吸吮按其本来性质原属于滋养功能的范畴，但随着生长发育停止滋养功能并脱离此范畴，逐渐成为节奏运动，其目的不是吸入滋养物而在于欢乐和满足。在这种情况下，手加进来作为辅助器官，替代为节奏运动的时期，手作为辅助器官更清楚地表明是为了快乐。以后它就离开口部范围而转向其它区域。里比多在移动过程中将滋养时期的痕迹带入新的动作领域，它很容易说明滋养功能与性功能间许多密切的关系。这种里比多移动发生在性前阶段，其特有的区别标志是里比多逐渐蜕去滋养本

能的特征，而显得是性本能的。所以，在这个滋养阶段，尚且谈不到真正的性里比多。

因此，不得不叙述所谓幼儿时期多形态、反常的性力。在这个时期里比多能势的多形态现象可解释为里比多的逐渐移动，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离开滋养功能的范畴而进入性功能的范畴中。这样，被我们的批评者强烈反对的“反常”这个词可以弃置不用，因为它造成错误的印象。

当一个化学物质破裂成各元素时，这些元素是在这种条件下分解的产物。但不允许将所有元素，无论是什么，都描述为分解的产物。反常是发展的性力被扰乱产物，它从来不是性力的最初阶段，尽管在最初阶段与分解产物之间有无可置疑的相似之处。当性力发展时，它的幼儿阶段就不复被视为“反常”，而认为是初期的和临时的；它自己就分解在正常性力中。里比多从临时状态撤离得越顺利，正常性力形成得越迅速、越完整。正常性力的本质就是这样：所有幼儿时期尚不是性力的倾向都要尽可能地排除。如果这种排除作得越少，性力就越显得反常。在这里“反常”的措词是全都适用的。所以，反常中的基本制约因素是幼儿的、未充分发育的性力状态。“多形态的反常”这个措辞是从神经官能病心理学借用来的，并反过去再用到儿童心理学中，当然这用的完全不是地方。

4. 儿童时期神经官能病和病源论 的因素

既然我们已弄清所谓儿童的性力如何理解，我们就可以继续讨论神经官能病的原理了，这在第一讲中就已开始而后随即停了下来。我们沿着神经官能病的理论研究，遇到了弗洛伊德阐述的观点，即：造成创伤经验的、在病源上有影响的素质是性的。经过我们的熟思，现在我们可以了解到那性的素质是被怎样设想的：它是里比多在脱离性前阶段活动的过程中的一种障碍、一种抑制。这种扰乱首先必须视为因临时性的病态固执，即里比多在从滋养功能向性功能的移动过程中，在某种状态逗留的时间过长所致。这就产生了一种不协调的状态，因为那临时的、过时的（正如它实际上所表现的）活动，当它已应该停止的时候却仍坚持继续一段时间。这个套式可以用于所有儿童的特征上，它在神经病患者中是如此普遍，只要是注意观察就不会看不到。在早老性痴呆中幼稚病是如此显著，以致对它的一种特有并发症甚至起了一

个显示性的名字——青春期痴呆。

可是，说里比多在这初级阶段逗留过久事情并未完结，因为当里比多逗留的时候时间并没有停顿，而个体的发育还在迅速进行。身体的成熟增加了保持幼儿活动和后期年龄需要间的矛盾（这后期年龄的需要是随着生命条件的改变而出现的），并因而有了冲突，这是神经官能病的真正根源。里比多越被阻碍，则冲突越强烈。最适于将这种冲突显示出来的特殊经验是某种创伤或病源。

正如弗洛伊德在其早期的著作中所表明，人们很容易想象神经官能病是这样产生的。这是与詹妮特（Janet）的观点十分适合的概念。詹妮特将神经官能病归咎于某种缺陷。根据这个立场，人们可以把神经官能病看作是情绪发展被阻碍的产物，而且我容易想象，这个概念对于那些觉得神经官能病或多或少地是直接从遗传迹象或先天退化而来的人们一定看来是不证自明的。不幸的是，事情的真实情况却复杂得多。为了使你们对这复杂性有一些概念，我将引用一个非常普通的歇斯底里的例子，我希望这能向你们表明它在理论上是多么有特征性和多么重要。

你们大概还记得我先前提过的一个青年歇斯底里患者的病例，足以令人惊奇的是：她对一个估计会给她强烈印象的事件没有反应，却对一个十分平常的事件表现出出乎意料的、强烈的病理反应。我们举这个特殊的事例，表明我们对创伤中病因学的重要性所持的怀疑，促使我们对对创伤有影响的所谓素质进行更周密的研究，研究的结果导致了方才提到的结论，这就是说，神经官能病起源于情绪发展的障碍决非不可能。

你现在会问，病人情绪发展是怎样发生障碍的？回答是：她生活在一个幻想的世界里，这个世界只能形容为儿童的样子。我没有必要对这种幻想为你们加以描述，因为，作为神经科专门医师或研究神经病的学者，你们无疑地每天都有机会听到神经病患者的那些幼稚的偏见、错觉和莫名其妙的要求的。厌恶面对严峻的现实是这种幻想的突出特征。其中缺乏审慎性、嬉乐性，有时轻浮地隐匿真正的困难，又有时夸大困难，总是想出一些怪诞的方法逃避现实生活的需要。在他们中我们立刻能觉察出儿童对待现实的那种狂妄精神状态，他的不可靠的判断力，他在环境中定位能力的缺乏，他对大人的责任感的憎恶。带着这样幼儿的心理状态，各式各样希望的幻想和错觉都能葳蕤滋长，这就是危险之所在。由于这些幻想，人们很容易滑到非真实的、对世界完全不适应的状态，它或迟或早地必导向灾祸。

受到批评的创伤理论

如果我们追踪那个女病人的幼稚幻想生活回溯到其早期儿童时代，的确，我们会发现许多明显突出的景象，正好为这个或那个幻想变化提供新鲜滋养。但若去寻索某些病理上的东西（例如她不正常的幻想活动）可能从中产生的所谓创伤因素，则将是徒劳的。那里有大量的创伤景象，但都不是处于幼儿时期的；而有些可记起的幼儿时期的景象却显得不是创伤的，倒更象是意外的经历，它对于她的幻想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影响。这最早的幻想包含着许多从她父母那里接受过来的各种模糊的、不太懂的印象。各种特殊的感觉都围

绕着父亲聚集，徘徊于畏惧、恐怖、嫌厌、憎恶、亲爱和狂喜之间。这情况与歇斯底里的许多其它情况相似，而在那些情况中并找不到创伤的病因，它却是植根于一种特殊的、早熟的幻想活动，持久地保留着幼儿的特性。

你们会反对说，正是那惊奔的马带来的景象唤醒了这创伤，由那天夜间的景象联想起18年前连车带马将掉下峡谷的情景，发生了那天夜间的一幕，当时病人不能逃出有惊马在身后奔驰的道路，而想投入河中。从这时起，她也陷入了歇斯底里的不清醒状态。可是，正如我在以前的讲演中试图向你们表明的那样，我没发现任何与其幻想系统发展有病源联系的迹象。那就像是第一次奔马带给她的生命危险已过去，没有造成值得注意的影响。在这个经历之后的所有年代都看不出那次惊吓的迹象，就像是从未发生那件事。而且我想再插一句，说不定车马堕谷的事全然没有发生过。因为谁也不能阻止一个病人进行纯粹的幻想，因为这里我只有病人的陈述可资依据。^①

18年后，突然间这个经历变得意义如此重大，在所有细节上又重显其作用。老的理论说：这以前被闭锁的感觉突然冲出了通向表面的道路。当我们考虑到这奔马的故事甚至可能不真实时，基于老观点的设想势必落空，而且也不可思议。即使果有其事，也几乎难以想像：一个影响会埋藏这么多年，然后在一个并不能说得通的场合突然爆发出来。

病人们经常有一种倾向，这并不新鲜，把他们的病归咎

^①指出这一点可能不是多余的，即现在仍有心理学家轻信病人的谎言。这是不可靠的，谎言是幻想，应按幻想处理。——作者

于很久以前的某些经历，是否属实就很可疑了。他们机敏地把分析医生的注意力从现在拉到一些过去虚妄的踪迹中。最初精神分析理论偏爱追踪的这类虚妄的主诉。但我们能有确定神经官能病症状的识别力应归功于这错误的假说，如果研究者没有走这条路，就不会达到这识别能力。的确，这条路是在病人倾向的错误引导下走入的。我想只有那种把世上发生的事看成是与错误和意外连结在一起、从而相信我们总需要有理性主义的教师的手来引导的人，才有可能想象这条路是反常的，而我们应该在一块路标的警告下离开它。由于这“错误”，我们获得了心理判断的更深的见解外，还由于这“错误”我们还得到了无比重要的调查方法。使我们欣慰而且感激的，是弗洛伊德有这种勇气让自己被引导到这条道路上。科学的进步不是被这样阻碍的，阻碍它的，勿宁说是：一旦有了看法，就盲目地坚持；权威典型的保守主义；著名学者幼稚的虚荣和对发生错误的惧怕心理。缺乏勇气对科学比对普通错误更为有害。“究竟谁正确”这无尽无休的争论将何时是了？人们只需要看一看科学的历史就知道：有多少曾是正确的？又有多少剩下的是依然正确的？

父母的情结

再回到我们的病例。现在提出的问题是：如果这旧的创伤不是病源的重要事件，那么，这明显的神经官能病的原因显然要从情绪发展障碍上寻找。从而我们必须将病人的陈述——她歇斯底里的神智不清状态是由于受到马的惊吓造成的——看作是无效的，尽管惊吓是她出现病状的起点。这个经验

只有当真实情况确非如病人所述，而且相信大多数病人的精神创伤并非真实这一公式时，才似乎重要。它之所以似乎重要，是因为它为很久以前就不正常的理论状态提供了显示的机会。这不正常的状态，正如我们已经解释过的，我是指心理学界还不相信错时代地保持着里比多发展的幼儿阶段这一理论。患者把早就应该抛弃的里比多活动形式继续抱住不放。自然控制不住自己的里比多活动形式的变换，而它的变换是如此不可捉摸，几乎无法给它归类。最常见的、几乎无一例外的是过多的幻想活动，其特点是不加考虑地过高估计主观愿望。过多的幻想活动永远是里比多在现实中错误应用的征象，它不是在实际环境中被用在最可能适用之处，而是迷陷在幻想中使用而不可自拔。当里比多用于维持幻想和错觉而不是用于生活的实际状况时，我们称这种状态为一种部分的内向性。

这种情绪发展障碍的通常伴随物是父母的情结。当里比多不是用于真正的适用性目的时，它常是或多或少地内向^①。

组成这一类精神世界的材料是记忆，它当然来自个体过去的经验，不包括现实的直感。如果里比多发生内向，不论是部分地还是全部地，它就会不同程度地包围住记忆的大部分领域，其结果是，不久就强迫病人的回想专置于它的控制之下。病人于是不同程度地甚至完全生活于过去的世界。尽管有些事情在他们的生活中曾一度起过作用，本该在很久以前

①：内向并不是里比多简单地积聚而不活动的意思，当内向导致里比多回归于儿童的适用模式时，它被用于创造幻想和错觉。内向也可以导致不出合理水准的行动。——作者

减弱了影响，但病人偏偏受其困扰，与之搏斗。他们仍然为早已不重要了的事烦恼，或者，更确切地说，不得不烦恼。他们用幻想的东西使自己欢笑或痛苦，这些幻想的事在事件的正常进程中曾一度是重要的，但对成年人已经再没有任何意义了。

在儿童时期极重要的事情中影响最大的是父母的个性。即使父母已经死了很久，已经不存什么影响、或者本应不再具有什么重要意义，而且，从那时以后病人的处境或许已经完全改变，可是，他们的父母仍然莫明其妙地“出现”，而且就像他们仍然活着那样重要。父母的喜爱、赞赏、反对、憎恶和倔强等习性仍然黏附在他们的肖像上，因情爱而变形或因羡慕而扭曲，并且往往与以前的实际情况很少相像。正是这种事实迫使我不再说成“父母”，而用“成像”这名称替代。因为这些幻想不再关系到真实的父母，而是关系到主观的、而且经常是被极度歪曲了的影像，在病人心中形成模糊的、但却有力的存在。

父母成像的情结，也就是，整套关于父母的念头，为内向的里比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活动领域。我要顺便提一下，这情结如果没有里比多投入的话，它本身只导致一个模糊的存在。根据我在《语言结合的研究》一书中提出的早期的用法，“情结”这个词表示一个已有里比多投入并被它激励起来的观念系统，但即使一时或长久地没有投入里比多，这个系统仍然潜在，准备着可能的动作。

父母对儿童的影响

当精神分析理论仍被创伤概念统治的时候，与这种观点

相适应，当时倾向于从过去寻找神经官能病的致病原因。依我们看来，父母的情结是神经官能病的“核心情结”（如弗洛伊德所称），父母的因素看来是这么具有决定性，以致病人一生中随便得了什么并发症，也轻易同父母的因素联系起来责备他们。几年以前，我在论文《父亲在个人命运中的重要意义》中就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们又一次使自己在病人倾向性的引导下，沿着其内向里比多的方向回溯到过去。这时，显然，它再也不是产生病原效果的可能的外在的经验或事件，倒象是显然由于个人难以适应家庭环境的条件而引起的心理效应。一方面是父母间的不协，另一方面是父母与儿童间的不协看来极容易在儿童的精神上造成与他个人的生活道路不相容的趋势。

在刚才提到的那篇论文中，我引用的许多例子，都取自关于这个题目的大量材料，它们都十分明显地表明了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引起患神经官能病的子女对他们父母无尽无休的反责——他们总是把自己的病归咎于他们的家庭环境和早期所受的恶劣教育，甚至还扩展到父母的某一实际行为，在子女身上留下的痕迹和造成的巨大影响完全超乎意料。我们在儿童那里正如在早期艺术品那里所发现的生动的模仿，特别是敏感的儿童的模仿，竟与其父母在内在的心理态度上如此相似，以致在实际生活中有时产生的效果，即便在细节上，都和他父母个人的经验相似。^①

关于这个题目的经验材料，我必须提到我的学生爱玛·佛

①：我不全相信遗传的器官相似，它自然对许多事应负责任，但决非所有的事都由遗传而来。——作者

尔斯特大夫 (Dr. Emma Fürst)，她对这个问题曾举出有价值的经验证明。我在克拉克大学的讲演中已经提到了她的研究。通过对全家庭作联想试验，佛尔斯特大夫证实了一个家庭的所有成员间反应类型极为相像，从而表明在父母与儿童之间往往存在着无意识的联想一致，这只能解释为彻底的模仿或同一。一种生物有一种生物的倾向的广泛一致，这正如解释了父母和儿童有时命运惊人的相似。我们的命运规律一般地是心理倾向的结果。

许多事实使我们获得了解的可能，为什么不只病人本人，而且连建立在这些研究基础上的理论都容易设想神经官能病是父母对儿童性格影响的结果。不仅如此，这种设想还被以教育行为全部基础的经验所支持。确实，儿童具有意志的可塑性——通常比作软蜡——能吸收并保持所有的印象。我们知道，儿童时期的第一个印象不可磨灭地伴随我们整个一生，即在某些教育的影响下，也能使人全部生活不超越这个界限。在这种情况下，在教育和幼年环境的其它影响下塑造出的个性与一个人自己的个人生活方式之间发生冲突就不足为奇了。这是所有要求过独立的、创造性的生活的人都必须面对的冲突。

由于儿童时期对以后性格发展的巨大影响，你们将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有人要把神经官能病的原因直接归咎于儿童时期环境的影响了。我必须承认，根据我知道的一些病例，对它作任何别种解释依我看来都不太合理。确实有的父母由于自己矛盾的性格使他们用十分不合理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孩子，致使孩子的病显得不可避免了。那么，将患神经官能病的儿童，如有可能时，从危险的家庭气氛中移开，放到健康

的环境中去——这几乎是神经专家必然采取的一招——在那里，即使没有任何医药治疗，他们也要比在家里更为健康地成长。有许多成人神经官能病患者，他们和儿童一样明显的神经质，说明他们从儿童时期起就一直没有脱离病症。根据这些病例，以上提出的观点看来一般都是正确的。

儿童的智力

我们认为暂时是确定了的知识，被弗洛伊德及精神分析学派的研究工作大大深化了。关于父母与儿童间的关系，由于它在病源上有重要意义，被研究得十分详细。不久人们就注意到，这些病人的确是部分地或整个地生活在其童年世界里，尽管这在他们本人完全是无意识的。而对我们心理学者说，彻底地研究适应现实的心理模式，以便使人们能准确地指出对成年人的幼儿情绪的误解却是精神分析的艰巨任务。如你们所知，有相当数量的神经官能病患者被姑息，就像许多儿童被姑息那样。其实这些病人所患的幼稚病为适应现实心理模式研究提供了最恰当最清楚的范例。他们企图在生活中能受到同样友好的接待、爱护，渴望更好地自理生活。这正是他们幼小时父母使他们习惯了的。即使最聪明的病人也不可能看到，他生活中的麻烦和神经官能病自始就是因为他一直未脱开幼儿的情绪状态。儿童的小世界、家庭的环境，都是大世界的模型。家庭给儿童的烙印越深，当他是成年人时，他越想在大世界中看到他昔日的小世界。当然，这决不是一个自觉的理智过程，哪怕病人已经感觉到或觉察到现实和当年的区别，并且试图尽可能地使自己适应，甚或他相信自己已经能

很好地适应，自信在理智上有能力把握这种状态，但是并不能阻止他的感情远远落后于理智的见解。

几乎没有必要向你们举关于这些现象的例子，因为我们的日常经验就是感情从没有达到过认识力的水平。神经官能病患者也是如此，只是更为强烈而已。他或许相信，除神经质外，他是一个正常的人，完全适应生活的条件。他从没有想起过他仍没有放弃某些儿童的需求，他仍然暗暗地怀有那使他从未清醒过的希望或错觉。他沉醉于各种得意的幻想，就算他意识到过自己有这毛病——不过这种情形是太少了，一般而言他们是不知道他自己有那些幻想。这些幻想经常是仅仅作为期待的情绪、希望、偏见等等存在，我们称这一类幻想为无意识的幻想。有些时候它像闪念一样出现在意识的边缘，经过一瞬间即消逝，所以病人不可能说出他是否有过这种幻想。只是在做精神分析治疗时大多数病人才学会保持和观察这逃逸的思想。虽然大多数幻想像闪念一样，曾一度片刻地被觉察到。但不应称它为意识的，因为大多数时间它实际上是无意识的。因此理应将它叫作无意识的幻想。当然，这并不排斥另一种儿童幻想完全是有意识的，并可在任何时候重新产生。

5. 无意识的幻想

无意识的儿童幻想王国逐渐成为精神分析研究的真正对象，因为看来它能提供解开神经官能病病源的钥匙。这里，与创伤理论的方法完全不同，根据我们提到过的各种理由，我们不得不设想这种心理表现的根源基于病人家庭的历史。

病人就所提问题描述的幻想系统大部分具有混合的性质，并且像小说或戏剧一样地被精心描述。可是，尽管如此，它对研究这种无意识状态的价值较小。问题就在：他的幻想是无意识的，而他的描述却是有意识的。它过分服从礼节和社会道德的需要，所有个人痛苦的细节以及一切丑恶的事情都被清除，借此让它成为可以在社会上公开的话，势必极少泄露真情。这样，最有价值而且显然有更大影响的幻想（指前面已作说明的无意识幻想）却极少涉及，所以必须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去发掘。

除非完全不介入精神分析问题，否则我定会遇到那经常听到的反对意见：所谓无意识的幻想仅仅是使病人产生的联想，它只存在于分析者的心中。这种反对意见和将初创者的

疏忽而归罪于我们的意见同样粗陋。只有那些没有心理学经验并且没有心理学历史知识的人才有可能作出这种指责。凡具有少许神话知识的人就不会看不到被精神分析学派阐明的无意识幻想与神话观念之间惊人的并存现象。说我们的神话知识被用来使病人产生联想的反对意见是没有根据的，因为精神分析学派发现幻想在前，至于拿它同神话特点相比是后来的事，据我们所知，神话是完全在医生眼界之外的东西。

由于这些幻想是无意识的，病人自然不了解它的存在，向病人直接提出这方面的问题将是毫无意义的。尽管如此，不只是病人，还有所谓正常的人都一遍又一遍地说：“如果我有过这些幻想，肯定我会知道它！”但正是因为它无意识所以才不知道。其实我们的对手们也并非不相信那些事并不存在的。这种先验的判断纯系烦琐哲学，没有支持它的理由。我们不可能停留在“精神只是意识”的教条上，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证实意识只是精神作用的一部分。常人的意识内容通常是处于高度复合的状态的；从我们记忆中的材料产生的思想簇群则主要是无意识过程。因此不管我们喜欢或不喜欢，我们不得不设想无意识精神领域的存在，即使它像康德的自在之物（Ding an sich）那样，只像是一个“否定界限的概念”也罢。由于我们感知的效果其起源不能在意识中找到，所以我们不得不让假说的内容达到无意识的领域。这就是说，推测这些效果的根源一定是在无意识中，因为它不是意识的。自然也不能因为它是无意识的就被指控为“神秘主义”。对那无意识中精神元素的状态我们不想佯装知晓或断言其如何如何，但我们用类比的方法把象征性的概念与我们的意识概念公式对比作出明确系统的说明。而意识概念术语的价值是在

实践中已经证实的。

无意识的概念

如果我们接受“依据的原则不能超出必要原则”的公理，这种思想方法就是唯一可能的方法。所以我们谈关于无意识的效果时也像是对待意识现象那样。弗洛伊德说的“无意识只能意会”受到猛烈的反对，人们看待它就像是一个前所未闻的形而上学的断语，有点像凡哈特曼 (Von Hartman) 的“无意识的哲学”里的信条那样。这种愤慨不过是因为这些批评家们在对它不了解的情况下，显然从无意识的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开始，像病本身那样，天真地反对在认识论上尚未阐明的观念，而这个观念是强加于我们的。对我们来讲，无意识并不是这个意义上的实体，而纯系一个术语，关于它形而上学的实质我们不允许自己形成任何观念。在这方面我们不同于那些坐在扶手椅子里的心理学家，他们不只可以完善地传达关于精神在脑子中的部位和各心理过程的生理关系等方面的知识，而且可以确切地断言除意识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只有“皮层的生理过程”。

这种天真行为不能归咎于我们。当弗洛伊德说无意识只能意会时，他是以象征性术语的旨意来描述，只是从意识的观点想，它只能被看作是想当然一类的东西。精神分析学派自然清楚，使用“意会”这个词任何时候都会重新引起争论。任何人都知道，如有更恰当的词必然受到欢迎。我们的对手不是这样，他们满足于否认这种现象或其它现象的存在——如果某种现象必须承认的话；他们拒绝一切理论公式。

后一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并不是任何人都有理论思考的职责。

一旦你成功地从精神与意识等同的教条中解脱出来，就承认意识之外的精神过程可能存在，重新说，人们既不可能断定也不可能否认关于无意识潜在性的任何事。依我们看来，文献中包含着丰富的、或许是过多的事例，提供了足够的而且是过多的理由，可是看来没有满足我们对手的要求。如果不是视若无睹，一定是对“足够”这个词的词义，各有不同的理解了。有一点，我们必须问：为什么精神分析学派不像他们的对手那样，非要要求对自己的公式给出那么多的证明呢？

理由很简单，一个已经建筑过桥梁并计算了它的荷载的工程师没有必要更进一步证明它的承受能力。但是一个持怀疑态度的门外汉，他没有怎样建桥的概念，或是对材料的强度怎样利用一无所知，对于桥梁的承受能力就需要有极不同的证明方法，因为他对此不能确信。我们的对手们主要是因对我们的工作极度无知，以致提出如此糟糕的要求。其次，这里有无数理论上的误解，我们不可能全了解他们并向他们一一阐明。正当我们在病人中发现精神分析的方法和目的中有新的和始终存在的令人吃惊的错误概念时，我们的批评家们也这样在错误理解上展示了无穷无尽的才华。你们从我们对无意识概念的讨论中可以看出，恰好是哪种错误的哲学假设足以败坏对我们术语的理解。很明显，一个人如果把无意识看作是一个绝对的实体，就必然像我们的对手实际作的那样，要求举出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完全超乎我们能力之外的证明来。假如我们必须提出不朽的证明，就必须具备

大量的极重要的证据，这与为医治疟疾要求展示疟原虫的存在迥然不同。形而上学的假想还严重地混淆了科学的思考，因为他们用自己的参考系看待精神分析问题。

可是，为了公平地对待我们的批评者，我必须承认，精神分析学派自己引起许多误解，尽管这完全无害。误解的主要根源之一就是在理论上严重的混乱。虽然如此，可是很遗憾，我们拿不出漂亮的理论。如果你们能看一下我们与重重困难搏斗的具体情况，你们就会理解这些。几乎与所有批评意见相反，弗洛伊德一点也不是空想主义者，他是经验主义者，任何人只要愿意深入到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并试着像弗洛伊德那样观察一下他的病例，就一定承认这些。不幸得很，我们的批评者不愿这样。正如我们反复听到他们讲的：像弗洛伊德那样去看这些是“令人厌恶、令人作呕的”。但任何人如果允许自己因厌恶而回避又如何能了解弗洛伊德的方法的性质呢？正因为人们不努力使自己适应弗洛伊德的观点，才得出了“他是空想主义者”的荒谬结论。他们轻易地设想《性学三论》仅仅是一种理论，是由脑子思索出来的，其中每件事都是通过暗示装入病人头脑中去的。但这是将事情整个颠倒了。这倒是方便了这些批评者，他们正想要如此。他们完全不注意这“病症与历史的配对”——这是精神分析者谨慎地为其理论叙述所作的引证——而只注意这理论和技术公式。其实精神分析的弱点并不在此，因为精神分析实质上是凭经验的，尽管在这里，无疑还有大量未充分耕耘的地域，批评者们可以大有用武之地，施展他们的智慧。在理论的领域还有很多未明确的东西和不少矛盾，远在我们博学的批评家们开始荣幸地予以注意之前我们早就意识到这些了。

梦

说了这些离题的话之后，我们再回到先前已谈过的无意识幻想问题。如我们所知，除非无意识源已被观察到并且可以用意识象征的方法表示出它的效果，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断言其存在或说明它的性质。仅有的问题是：是不是在事实上这效果能被发现从而允许这样期望。精神分析学派相信他们已经发现了这种效果，我将立即提到其主要现象：梦。

关于梦可以这样说，它是作为一个复杂结构进入意识层的，这个结构由许多元素混合成，而各元素间的连接是无意识的。仅仅在连接之后，通过对梦中个体的意象加入一系列的联想，我们才能指出这些意象在不久前的某些记忆中有其原源。我们自问：在何处我们曾看到或听到过这些？然后，通过普通的联想过程，记起梦中的某些部分曾在意识中经历过，有些在日前，有些在更早的时候。对此不难作出普遍一致的看法，因为这些事久已为人所知。梦作为或多或少不可了解的、混乱的元素呈现给我们，这个范围起初不是意识内的，只是在其后通过联想才被认识。应补充说明：并不是梦的所有部分都具有可认识的性质，都能从它推论出意识的特征。²它通常不可解释，当然也大部分不可解释，特别在刚做完梦时。只是以后被我们想起，我们曾在意识中经历过梦的这部分或那部分。也只是从这个观点上我们可以把梦看作无意识原源的产物。

这种探索无意识原源的方法是我方才提到的，远在弗洛伊德以前每个梦的研究者势必采用的一种。我们只简单地试

图追想梦的各部分从何而来。解释梦的精神分析方法就以这个极简单的原则为基础。事实是梦的某些部分是从我们醒时的生活中得来，从一些因为显然不重要将被遗忘并已明确地向无意识转变的事情而来。正是这些部分是“无意识意念”的效果。但这种说明也有例外。自然，我们不像我们的批评者那样，我们并不把事情看得几乎那样僵化，并不讲得令人厌烦。当然，这种说明完全没有超出意识的象征意义——这一点我们从没有任何疑问。但梦作为未知的心灵事实的表示，符号则无疑是完全适用的。如我前面所说，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借助与意识对比去想像无意识。我们并不装作我们理解一件事物只因我们为它创造了一个响亮、完美但不可理解的名字。

梦的分析方法

因此，精神分析的阐明原则是非常简单并且实际上久已为人所知的。其后继的程序理所当然地沿着同一路线进行。如果我们专心注意一下梦——它自然从未超出分析的范围——我们会成功地发现更多的记忆中的事物，它与个别梦中部分有关。（当我说“记忆中的事物”时，我不单指实际经验的记忆，我也指再生的富有意义的联想和联系）。这样搜集来的记忆中的事物，被称为“梦的材料”。我们依照一般采用的科学原则处理这些材料。如果你有一些经验材料积累起来，比较它的各个部分并把相似的归为一类予以分类，观察它的共同特征——无论是形式上的还是内容上的。

进行这项工作时须尽可能地不抱偏见。我看到初学者总

是寻找一些特征然后试图强使他的材料适合他的期望。我曾特别提醒我的同事们，他们由于众所周知的偏见和误解，曾一度是精神分析的热情反对者。如果命运注定要我分析他们，并且他们最后对这方法有了确实的见解，那么，他们在他们的分析工作中的第一个错误通常就是由自己先入的见解造成的对材料的曲解。这就是说，他们把以往对待精神分析的态度转移到现在的材料上，因而就不能作出客观的估计而只能凭主观的幻想。

一旦着手审查梦的材料，你决不可从任何比较那里退缩。这材料通常是由极不相同的意象组成，有时很难从中抽出中间物加以比较。我决不能给出详细的例子，因为完全不可能在一个讲演中讨论这样浩瀚的材料。可是我愿意提请你们注意兰克（Rank）的著作《一个自我解释的梦》。从那里你们可以看出为进行比较会有多么大数量的材料必须考虑在内。

所以，在探索无意识问题时，按通常的途径进行，用比较的方法得出结论，这是我们一般采用的步骤。但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反对：当真会有什么无意识的内容在一个梦中？这种反对依我看来是不科学到极点了。每项心理学的因素都有自己的特殊历史。我说出的每一句话，除去我有意识地想说的意思外，还有它历史上的意思，这个意思可能与原来意识中的含义完全不同。我这是用看来像是和目的有些矛盾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能解释每句话的各个历史上的意思，那是在更大的、结构更复杂的事例中才容易做到的。举例说，每个人都很清楚：一首诗，除去它所表示的内容外，在形式、内容、原始风格上诗本身有它自己

的特征。虽然诗人在他的诗中仅仅表示当时的心情，但是文学史研究者却从诗中和诗的背后看到诗人从没有猜想到的东西。文学史研究者对诗的材料分析正好可与精神分析的方法相比。当然，不能排除有错误可能进入其中。

精神分析的方法大体上可与历史的分析和综合方法相比。例如，设想我们不知道现在教堂里举行洗礼仪式的意义。牧师告诉我们：洗礼表示允许这个儿童进入基督的团体。但这种回答并不能使我们满足。为什么向这儿童洒水？为了解这个仪式，我们必须从形成宗教仪式的全部历史，也就是说，从人类关于这类传统的记忆中搜集不同来源的材料，摘要比较：

1. 洗礼明显地是一种入教仪式，一种奉献仪式，因此我们必须搜集存留的一切有关入教仪式的记忆。

2. 洗礼的活动是用水完成的，为了解这种特殊形式，其它各种关于用水仪式的记忆也必须搜集。

3. 受洗的人被洒水。这就必须搜集新信徒被洒水、浸水所有这类仪式。

4. 所有从神话、传说以及迷信行为等方面回忆的事，凡是以任何方法与洗礼的象征意义相似的，都必须予以回想。

这样，我们对洗礼活动建立起比较研究。我们发现由洗礼活动形成的因素，并进一步探知其原始的意义，同时就逐渐认识了这神话的丰富世界——它曾奠定了宗教的基础，并帮助我们了解洗礼多方面的、深邃的意义。分析家用同样的方法进行梦的分析。他搜集与梦的每一部分相似的历史事实，即使是最遥远的，并试图把梦的心理历史和它的模糊含义从新组织起来。通过精心的专门研究，我们正像对洗礼分

析一样，对这神异细致而又意义丰富的无意识决定的网络就得到一个深邃的见解，它是可以同对一项活动的历史的了解相匹比，而至今我们对它的了解却是十分肤浅和片面的。

这些离题的叙述依我看来是难以避免的。鉴于那些一直寻找对精神分析方法不信任依据的人们的诸多误解，我感到有必要就这种方法在科学的方法论中的地位向你们做一个极一般的说明。我并不怀疑这种方法有用得肤浅和不当的情况。但一个聪明的批评者决不允许贬低这种方法本身，否则他将比一个糟糕的外科医生经常对一般外科手术价值显示的不信任还要糟糕。我也不怀疑，并不是精神分析者对梦心理状态的一切解释都能完全避免误解和歪曲。但对医生来讲，其中大多数是出于所受的是自然科学的训练，因而对这极微妙的心理学方法，尽管操作时尽量做得正确，但很难达到在智力上掌握准确。

我刚描述的方法是我采用过的一种，在科学上，我对这种方法是负责的。我认为，对梦，提建议或作直接解释的尝试是绝对错误的，也是在科学上不允许的。这开不是一种合乎方法论的、而是一种十分随意性的处理。它会像一切错误方法一样，因结果无效而使自己失败。

如果我曾借助对梦的分析试图解释精神分析方法的原理，那是因为梦是精神内容最清楚的一个例子，它的组成排除了对它的直接了解。当某个人用锤子敲钉子以便挂什么东西的时候，别人一看立刻就明白。而对洗礼活动则是另一回事，在那里每一个阶段都存在着问题。我们称这些不能立刻明白其意义和目的的活动为象征的活动，或称之为象征。根据这个道理我们称梦为象征的，因为它是一种心理产物，

它的起源、意义和目的是模糊的，因而纯粹是一种无意识簇群的产物。弗洛伊德说得很恰当：梦是经过宫殿到达无意识层的。

联想试验

除梦之外，还有许多无意识簇群的产物。在这联想试验中我们有一种准确决定无意识影响的手段。请看在那我称之为“情结指示器”的震扰效果。联想试验给试验对象安排的这项任务是如此简单，即使是儿童也能毫无困难地完成。尽管如此，竟还有这样多有意活动的震扰应予记录实属令人吃惊。能够正规指出的作为这些震扰原因的唯一事物，就是由情结引起的部分有意识、部分无意识的簇群。大量事例表明，震扰与感觉音色情结间的联系可以毫无困难地表明。但为了解释这种联系，我们必须经常求助于精神分析的方法，这就是，我们必须询问病人他能给这震扰反应什么联想。

用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得到作为判断依据的历史材料。有人反对说，病人可能拣他喜欢的话说——换言之，就是说老一套废话。我相信，这种反对是出自一种无意识的设想，认为历史研究者搜集其专论的材料是愚笨无能的，不可能把明显的事实与真正的伴生事物相区分，不能将可确信的报告与拙劣的曲解相区分。专业人员避免把粗糙的错误与确切的事实相混淆，把极微妙的情况与像似可能的情况相混淆，是有办法的。任何对精神分析工作了解的人都知道，看出哪些有关联哪些没有并不太困难。何况，不诚实的叙述无非是首先暴露了说假话的人自己，这不是不能辨认出来的。

（不过，还要考虑另一种反对意见，这种意见倒值得一提。有人会问，是不是随后产生的记忆真的是梦的依据。如果在晚上我读了有关战争的叙述，夜里就梦到巴尔干战争，即使最尖刻的批评者也会公平地假定我回溯的联想是正确而又真实的。正如我以前所提到的，这是一种最牢固确立的有关梦起源的假说。我们所做的全部工作，就是贯彻始终地将这实用的假说用于有关梦其它各部分的所有遗留的联想。最终，我们讲的意思无过于此：梦的因素是连结着联想的，因此和它有些关系，在两者之间有一种联系。一位著名的批评家某次评论说，按照精神分析的解释，人们甚至可以把黄瓜和大象联系在一起。这位杰出的人物当评论时，正向我们表明，根据他把黄瓜和大象联在一起说这件事本身，这两个东西在他心意中不知怎样有了一种联想的联系。人们必须有大量的勇气和严肃的判断来宣布人的思想能产生完全无目的的联想。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少数影像需了解这联想的意义。）

在联想试验中我们可以探知通过情结的干扰从无意识层准确发出的非常强烈的效应。在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没有别的，只有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的错误原型，其中的绝大部分应看作是由于情结的干扰所致。弗洛伊德在他的著作《日常生活中的变态心理学》中曾将这方面的材料搜集在一起。其中包括所谓征兆活动——从另一个观点也同样可以叫作“象征活动”——和记错、失言之类的真正失误。所有这些现象都是无意识簇群的效应，因而也是这样多的通往无意识领域的门口。当它们聚集时，必定要患我们称之为神经官能病的了。从这个观点看，它像是官能紊乱，而且应该理解为它是无意识簇群的效应。

这样，联想试验就可成为打开直接通向无意识层经常可用的一种手段。尽管它主要地是广泛采集错误反应的简单技术（这些错误反应从精神分析角度看，即是无意识），但至少，这是当前最适于采用的形式。无论如何，它可能完成其它有特殊价值的事，将会使我们直接瞥见无意识层。但我不认为目前谈这个问题已经成熟。

6. 埃迪帕斯情结

当我向你们说明了我们的方法之后，你们可能对它的科学性有了更大的信任，甚至可能倾向于同意这种看法，即：通过精神分析的研究方法揭露的幻想并不是精神分析者随意的推测和解释。或许，你们甚至愿意耐心地听这些无意识幻想的产物能告诉我们什么。

成年人的幻想，在它是一种意识范围内变化无穷并且有极显著的个体形式，因此不可能对它作出总括的描述。可是当我们借助于分析进入无意识幻想的世界时，情况则极为不同。幻想材料的多样性当然还很大，但是我们几乎没有发现像在意识领域那样多的个体特点。在这里我们遇到更多的典型材料，它在不同个体上以相似的形式并不罕见地重复着。其经常重复出现的是这样的印象：以宗教和神话为基础的印象的变种。这个事实是如此明显，以致我们可以说，我们在这些幻想中已经发现了宗教和神话思想的先驱者。

关于这个问题我必须说得更详细些，以提供给你们一些合适的例子。向你们介绍一下我的著作《变形的象征》是必

在这里我只想提到基督的主要象征——献身——在无意识幻想中起重要作用。维也纳的学派在“阉割情结”这个含糊的名称下知道了这个现象。这个名称的像是矛盾的使用法是从维也纳学派对待性力问题的特殊态度而来的，对此我在前面已讨论过了。至于在上面提到的那本书里，对献身问题我特别给予了注意，这对目前讨论这个问题是有益处的。现在将开始谈关于无意识幻想起源的一些事。

在儿童的无意识层中，幻想是十分简单的，它不比自己环境中所见标记更复杂。由于精神分析学派的共同努力，我们发现儿童时期最常有的幻想是所谓埃迪帕斯（Oedipus Complex）情结。这个名词看来也可能是最不适合的。我们都知道，埃迪帕斯悲惨的命运在于他娶了自己的母亲和杀了他的父亲。这种成年人生活的悲惨冲突显得和儿童的心灵相距甚远。对于门外汉来讲，一个儿童受这种冲突的折磨似乎完全不可思议。不过，稍加考虑，就会清楚，这中间物的比较正好是埃迪帕斯的命运受到他父母的严格限制，而这种限制正是儿童的特征，因为成年人的命运是不受父母限制的。在这个范围内，埃迪帕斯是儿童冲突扩大到成年人范围的代表者。术语“埃迪帕斯情结”当然并不意味着设想这冲突是成年人形式的，而只是认为在成年人里它缩小的比例，相反在儿童则是司空惯见的。事实上，这全部意思是：儿童对爱的需求是指向母亲或父亲，并且这些要求已经达到了某种强烈程度，以致要妒嫉地保护所选择的对象，我们可称之为“埃迪帕斯情结”。

埃迪帕斯情结的减弱或比例减少不能理解为感情总量的减少，而是指性感情的分额减少（这是儿童的特征）。为对

此补偿，孩子气的感情特别强烈，这种强烈程度是成年人性感情的特点。小儿子总愿意他母亲全部属于自己而不受父亲的干扰。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幼小的儿童有时能以嫉妒的态度挤在父母中间。在无意识层这些愿望和意向带有更具体、更激烈的形式。儿童是幼小的原始动物，所以他很快地准备去厮杀——一种在无意识中最容易有的思想，因为无意识总要十分戏剧性地表现自己。但是，一般说来，儿童是无害的。这种仿佛危险的愿望通常也是无害的。我说它“通常”是因为我们知道，儿童有时可能屈从于杀害的冲动，不只是间接地，而且以很直接的形式。可是正因为儿童不可能做出系统的计划，所以谋杀的意图不总是危险的。他对母亲的埃迪帕斯意图同样如此。在儿童的无意识中这种幻想的模糊的暗示很容易被忽略。因此所有的父母都相信自己的孩子没有埃迪帕斯情结。父母和情人一样，大部分都是瞎子。如果我现在说埃迪帕斯情结首先只是儿童对待父母的一种幼稚的愿望和由这些愿望引起冲突的一种套式，看来就更可接受了。

埃迪帕斯幻想的历史特别值得关心是因为一般它能告诉我们许多关于无意识幻想的发展情况。人们很自然地认为埃迪帕斯问题是男孩的问题。可是，十分明显，这是一种错觉。在某种条件下，只是到了青春发动期的较后期，性里比多根据个体的性别才达到其最后的区分。在这时期以前它具有的是没有区分的性特征，也可称它为无性的。所以一个小女孩也具有埃迪帕斯情结就不足为奇了。就我们所知，儿童无论性别如何，其第一次的爱属于母亲。在这个阶段如果对母亲的爱很强烈，就会嫉妒地把父亲视同竞争对手而不让接近。当然，在儿童本身，处于童年初始阶段母亲对他没有值得提

及的性的意义，在这个范围内，这术语“埃迪帕斯情结”并不真正合适。因为在这个时期，母亲仍只是具有保护他、拥抱他、滋养他的人的意义，由于这个原因，母亲是愉快的根源。

（同样，这也是特点，在儿童语言中“妈妈”是对母亲乳房的名称。正如博崔斯·欣科夫（Dr. Beatrice Hinkle）告诉我，询问幼小儿童得出的回答是，他们给“母亲”的定义就是给他们食物、巧克力等的人。人们很难断言对这个年龄的儿童来讲，食物只是性的象征，尽管对成年人有时确是如此。从表面上看一眼文明的历史，正好表明愉快的滋养根源是多么巨大。罗马衰落时期的盛宴可以表示你喜欢的任何事，唯独不表示被压抑的性力，因为这是在那个年月最不适于谴责罗马人的事。毫无疑问，这种狂饕滥饮是代替了某种事物，但并不是代替性力，它所代替的比被忽视的道德职责要多得多，尽管我们过分倾向于把道德职责看作从外界强制人的法律。人们有这种自己给自己规定的法律。）

正如我前面已说明的，我并不否认愉快的感觉最初有性的原源。我们回溯到儿童时代，在快乐的感觉中性力占有很少但日益增长的份额。虽然如此，嫉妒可能起很大作用，因为它有些也不尽属于性的部分。由于对食物的盼望本身就会做出许多最嫉妒的事——人们会一下子想到野兽！当然这种嫉妒在较早的时候就被发育期的情欲所加强，随着年月的流逝而越来越增大，所以埃迪帕斯情结逐渐带有了标准形式。这种冲突在男孩身上采取了更男子气的、因而也是更典型的形式，而女儿则发展了对父亲的特殊喜爱，伴随着对母亲相应的嫉妒状态。我们可称此为恋父情结（Electra Comp-

lex)。众所周知，Electra由于母亲Clytemnestra谋害了亲夫Agamemnon夺走了自己所爱的父亲而向母亲报仇的。

随着日益成熟，这两种幻想情结就越来越明显，只是在青春发动期以后的时期，当与父母分开的问题发生时，才达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是以我们已经提到过的象征（献身的象征）为特点的。性力越发展，它越使个体脱离家庭并迫使其达到自立。但是儿童整个以前的历史使得他和家庭，特别是和父母紧密相连，所以经常是逐渐成长的个体只有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才能在内心使自己脱离幼儿的环境。如果不能成功地作到这点，这恋母（或恋父）情结会突然引起冲突，然后就可能发生神经官能病的障碍。这性力上已发展的里比多倾注到埃迪帕斯“模式”中，并引起可以无疑地证明情结效应的感觉和幻想，而在那时以前这些感觉和幻想还是无意识并且或多或少是不能作用的。

随之发生的情况，首先就是对于这由新活动情结而来的“不道德”的冲动形成了有力的阻力，对意识行为会以两种方式产生影响。或者是直接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儿子对父亲显示出强烈的对抗和对母亲显示出特别的亲爱和依赖；或是间接的影响，也就是说采取补偿的方式：对父亲不是对抗而是明显的服从，对母亲则粗暴和敌视。有时直接的影响和被补偿的影响交替发生。Electra情结情况与此相仿。如果性的里比多陷入这种形式，埃迪帕斯和艾丽克楚(Electra)冲突就会导致谋杀和乱伦。这种情况自然没有在正常人们间或所谓“非道德的”原始社会中发生，否则人类的种族早就要毁灭了。相反，事物的自然规则是熟习的对象失掉它引人注目的诱惑力，而迫使里比多去寻觅新的目标，并且这个活

动可作为一种重要的因素以防止杀亲和乱伦。里比多向家庭以外的目标继续发展就是完全正常和自然的了。如果里比多像以往那样，仍停留、粘滞于家庭中，就是不道德和病理现象了。虽然如此，它还是一种有时在正常的人们中能看到的一种现象。

乱伦的问题

（有时在青春发动期以后产生的无意识的献身的幻想是儿童情结的直接产物。对此，在我的著作《变形的象征》中举了详细的例子。献身的幻想意思是放弃了儿童时期的愿望。在我的书中我已对此作了说明，同时还指出了在宗教史上同样的情况。这个问题在宗教中起重要作用并不足为奇，因为宗教是心理适应过程的一个最大的助手。适应新心理模式的主要障碍是对以前状态保守的粘着。但人并不能使自己以前的个性和以前喜爱的对象简单地保持原样，否则其里比多就将停滞于过去，而对他成为贫乏的东西。在此，宗教是一个重要的助手，因为它借助于象征的桥梁，将里比多从儿童时的对象（父母）引向人类幼年期象征性的代表——神明，这样便于从儿童世界向成年人世界的转移。就这样，里比多为社会的目的而释放。）

弗洛伊德对乱伦情结有一个特殊的概念，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他从埃迪帕斯情结通常是无意识的这个事实出发，并且想象这是道德抑制的后果。如果我用这些话向你们介绍弗洛伊德的看法可能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得不十分准确。可是无论如何，按照他的看法，埃迪帕斯情结看来是被压抑

的，这就是说，是通过意识倾向的反动效果转移到无意识层的。看来差不多像是这么回事，如果这儿童的发展是无拘无束的，而且没有教育影响的效果，埃迪帕斯情结就会升入到意识层中。

弗洛伊德把那阻止埃迪帕斯情结作用出来的障碍物称为“乱伦障碍”。根据从他著作中所能搜集到的例子，他似乎相信乱伦障碍是由经验的反浪所形成，这是现实所作的一种矫正，因为无意识是致力于无限地、立即满足而不顾一切。在这方面他同意叔本华（Schopenhauer）。叔本华谈到瞎子沃尔德一韦尔（World-Will）的利己主义时说它已达到这样强烈的程度：一个人为了用他兄弟的脂肪涂皮靴可能把他兄弟杀死。弗洛伊德认为乱伦的心理障碍可与乱伦禁令相比拟，这种禁令甚至在原始人中也已发现。他进一步认为，这些禁令证明人们确实存在乱伦的愿望，因为这个原因才拟订了反对它的法律，即使订一条原始水平的法律也罢。因此他倾向于把乱伦作为神经官能病的一个绝对、具体的性欲望，因为他称这个情结为根本情结或核心；并且把它看作是最初的一种，而倾向于将所有神经官能病的心理状态以及其它心理性范围的现象实际上归结为这一种情结。

7. 神经官能病病源论

带着这弗洛伊德的新概念我们再返回到神经官能病病源论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精神分析理论是从童年时期的创伤经验开始的，以后发现了它部分或全部不真实。从而这理论改变了方向，并从不正常幻想的发展中寻找病源的重要因素。继续了十余年之久，在越来越多人的帮助下进行的无意识的研究，逐渐发现了大量经验材料，表明乱伦情结在病理的幻想中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从未失败的因素。继而又发现乱伦情结并不是患有神经官能病人人们的特殊情结，它被证明是儿童正常心灵的组成部分。我们不能仅从它的存在而说出这种情结会不会引起神经官能病。它要成为病因，就必须突然出现冲突，这本身不活动的情结就必须活动起来并加强到冲突爆发的程度才可。

于是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而且重要的问题。如果这儿童的“核心情结”只是个一般形式，它本身不是病因的，而需要有促使其活动的特殊刺激，则整个病源问题就改变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早期儿童记忆的事物中探寻就是无效

的了，因为它提供给我们的只是以后冲突的一般形式，而不是实际的冲突。（即使儿童时期已经有了冲突也是如此，因为儿童时的冲突与成年人的冲突不同，从儿童时期就患有慢性神经官能病的人，现在遭受的冲突并不就是他当时所遭受的。可能儿童时当他第一次必须上学时发生了神经官能病，那么这就是放任与责任、对父母的爱与必须上学间的冲突。可是现在的冲突，比方说，就是资产阶级舒适的享受与职业生活所需要的艰辛之间的冲突了。它只是像似相同的冲突。这正如拿破仑战争中的“Teutschen”将自己与反对罗马奴役的老日尔曼人对比。）

无意识的决断

如果我用前几讲里你们已经听到过的年青妇女的例子来叙述这理论以后的发展情况，我想，我是能够将自己的意思说清楚的。你们可能还记得，我们发现当她回想受马惊的时候，引起对儿童时相似情景的记忆。在这联系中我们讨论了创伤理论。我们发现，我们必须在她夸张的幻想中（这是由于她受阻碍的心理和性的发展所引起）寻找真正的病理因素。如果我们想知道这幼年的经验是如何恰好在那时有效地簇集起来，我们现在就必须把我们刚获得的理论见解用于这特殊病症的病源上。

为了对那夜发生的事件找到解释，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对当时的情况作确实的调查。所以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询问病人关于当时陪伴她的人。由此我得知，她知道有一个她想要订婚的年青人，她爱他并希望和他一起幸福地生活。这第

一次询问没有能发现更多的事。但永远不要因最初询问未取得肯定结果便妨碍调查。当直接的方法失败时还有间接的方法通向目标。因此我们又转向这妇人在马前拼命奔跑的非常时刻。询问关于她的同伴和她刚参加的庆祝的种类。这是为她的好友开的告别晚会，这位朋友由于神经不健康要到国外去休养。她告诉我们，这个朋友已经结婚，很愉快，也是一个孩子的母亲。我们可以允许怀疑关于她快乐 的说法，因为，如果真是如此，她就很可能没有理由“神经有病”而需要治疗。

改变我接近问题的角度，我了解到当她的朋友们赶上她以后，他们把病人带回到晚会主人的房子里，因为这是最近的庇护处所。在那里，她在疲惫不堪的状态中受到殷勤的接待。说到这里，病人突然停止了她的叙述，变得局促不安、烦躁，并企图改变话题。显然，有一些不愉快的记忆突然出现。在这最难控制的障碍被克服以后，出现了那夜发生的另一件十分值得注意的事件：这位和蔼可亲的主人向她热烈地表示了爱情。这样就突然出现了一种情况：在女主人不在的情况下，可能须认真考虑到这困难和危险的局面。表面上对她的这种爱情表示像是晴空的闪电。少数的批评教给我们，无论如何，这类事从不会平空而降，而总是有它的历史。那么，下几周的任务就是一点一点地发掘其漫长的恋爱史，直到最后一幅完整的图画出现。对此，我试作以下简单的描述：

当还是孩子的时候，这病人曾是个男孩气质的女孩，喜欢的只是野男孩子的游戏，轻视同性而且避开妇女的方式和活动。青春发动期以后，当时性爱的问题可能出现得过于隐

秘，她开始回避一切社会活动，厌恶并轻视人们提到一切关于女人的事，即使稍有一些关联也不行。她生活在一个幻想世界中，这个世界与本来的现实没有共同之点。这样，到了约24岁左右，她躲避一切象她这样年龄的少女通常能使之动心的机遇、希望和期待等。当时她得知有两个男子非要冲破围绕她的荆棘不可：A先生是她好友的丈夫，B先生是A的独身男友。她对这两个人都喜欢。可是不久她看来对B要喜欢得多。一种亲密的关系很快在他们之间发生，并且提出订婚这个问题也已经很久了。通过她和B的关系以及通过她的朋友她经常与A接触。A的出现有时莫名其妙地搅乱她的心并使得她神经质。

大概与这个时候这个病人参加一个大型晚会。她的朋友们也都在。她逐渐出神，并呆呆地玩弄着自己的戒指。当时戒指突然从手指上滑落并滚到桌子下面。两个男青年都帮她寻找，B找到了它。他将戒指戴到她手指上，并且顽皮地笑着说：“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她被一种奇怪的、不能抵抗的感觉所压倒，从手指上摘下戒指并将它从开着的窗子扔出去。正如可以想像到的，出现了片刻的痛苦，不久她就很沮丧地离开了晚会。

此后不久，所谓机会使得她在一个疗养地去避暑，A夫妇也呆在那里。A太太以后越来越明显的神经不好，因为她心情不舒畅所以常常呆在家里。这样，这位病人就有机会独自和A先生出去散步了。有一次他们去划船，她在嬉戏中因喧闹突然落入水中，她不会游泳，A十分困难地将她在半失掉知觉中拉上了船，然后他吻了她。通过这段浪漫的插曲他们很快结合得更紧。为了原谅自己，在她自己眼光中，她尽了

最大努力使自己属于 B。每天都在告诫自己，B 才是她真正爱的人。很自然，这小小的奇特游戏逃不出妻子敏锐的妒嫉目光。她的朋友 A 太太已猜到这个秘密，于是烦躁不安，以致神经毛病只能越来越坏。因此，A 太太才有必要到国外去治疗。

这告别晚会提供了一个危险的机会。这位病人知道她的朋友兼对手在当天晚上要走，而 A 先生将一个人住在这房内。当然，她并没有作什么推理，或清楚地想出这些，因为有些妇女有一种明显的能力，纯粹用自己的感觉而不是用她的智力去想，所以她们以为自己似乎根本没有想过某些事。无论如何，整个晚上她有一种十分奇异的感觉。她感到非常紧张。当 A 太太由人陪同去车站走了以后，在返回的路上她出现了歇斯底里的迷朦状态。我问她，当她听到后面马跑来的时候，那瞬间怎样想或有何感觉？她回答，当时她只感到恐慌，觉得有某些可怕的事来临，她已不能再逃避。结果是，正如你们所知，她被带回到晚会主人 A 先生家。

按简单的想法，这结果看来十分明显。每个外行人都会讲：“好了，这就十分清楚，她只是打算通过这种或那种方法返回 A 的房子。”但心理学家将责备这些外行人表达的意思是错误的，并且要告诉他们，病人行为的动机是无意识的，因此我们不能说她打算返回 A 的住房。当然，有一些博学的心理学家会发现各种理论原因来争论她行为是有目的的。——这些原因的根据在于意识和心灵同一的教条。但弗洛伊德创立的心理学早就确认了心理活动的目的意义不能由意识的动机来判定，而只能由其心理结果的客观准则来判定。今天对于无意识意向的存在（这无意识意向对于一个人的反

应以及他对别人的影响起重大作用)已经不能再有所争论了。

在A先生的住房中发生的事证实了这种观察结果。我们的病人显得多愁善感，A先生又觉得必须表明爱情来回报，根据这些决定性的事件来考虑，以前的全部历史似乎十分明显地准确地朝着这个结果发展，尽管病人时时都在有意识地努力抗拒。

从这个故事得到的理论收获是清楚地确认：是一种无意识的“意向”或倾向暗暗地控制着对马的恐惧心理，很可能关于童年时马不可阻止地奔向灾难的回忆也用于这个目的。从整个材料来看，这夜间关于马的景象——病的起点——看来只是所设计大厦的拱心石。这儿时经验中的恐惧和明显的创伤效果都纯粹是在暗中控制中表现出来的，但它是以具有歇斯底里特征的特殊方法表演出来，所以它的舞台景象几乎完全真实。我们从成百的经验实例中得知，歇斯底里的痛苦是为从周围的境况中获得某种利益而表演出来，尽管这种痛苦是完全真实的。这些病人们不只是认为他们有痛苦而已，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这些痛苦也正象由器官引起的痛苦一样真实，可是它却是被暗中控制的。

里比多的回归

为演出疾病或一种貌似病源而利用追忆的事物称为里比多的回归。当里比多返回到追忆的事物中去并被激活时，结果呈现一个明显病源的假象。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旧的理论，对马的恐惧可能被看作是由于老的创伤所致。这两种情

景相似之处是明显的，在这两种场合病人的恐惧都是十分真实的，我们都没有理由怀疑她在这方面的断言，因为它完全符合我们对其他病人的经验。如神经质的喘息、歇斯底里的焦虑、心理性的沮丧和狂喜、痛苦、痉挛等等，都十分真实，任何亲身遭受过这种心理性症状的医生都会知道这些感觉是多么绝对地真实。回归使追忆中的事物再度活跃，虽然它们可能是幻想的，但也像那些被收集起来真正发生过的事件一样真实。

正如这术语“里比多的回归”所指明的，根据倒退的应用模式我们可了解到早期阶段的返回。从我们所举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回归的过程如何发生。那个告别晚会为她与主人的单独相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这病人却从把它作为有利于自己的机会这个意念中退缩了，让自己被至今还未承认的渴望所压倒。里比多既没有被有意识地用于这个目的，这个目的也从没有被意识到。所以，当里比多面临压倒的危险时，不得不在恐惧的掩盖下借助于无意识实现出来。当马接近她时，她的感觉十分清楚地说明了我们的解释公式：她感到像是有某些不可避免的事将立即发生。

弗洛伊德用一种意象生动地说明了这回归过程。把里比多比作一个河流，当它遇到一个阻挡物时就形成堤堰而导致泛滥。假如这个河流在它的上游河段先前开有其它渠道，那么，由于下游形成堤堰，这些渠道将又注满水，就像是以前充满水的真正河道，但它此时只是暂时有水。这河流并不是永远流入旧渠道，而只是当主流道中继续阻挡着的时候才反流。这辅助的渠道有水并不因为它从开始就是一个独立的河流，而是因为它在主流道发展的过程中，曾一度是个区段式

场域，有暂时的可能性，它的旧迹依然存在，因而当泛滥的时候仍可利用。

这种意象对里比多起作用的进展过程能直接适用。最终的趋向，主河道在儿童的性力发展时期尚未被发现，里比多伸展到各种辅助渠流中，最后的形式只是逐渐地显示出来。但当主河床已经开凿，所有辅助渠道都已干涸并失掉其重要性，只留下其以往活动的旧迹，与此相似，儿童早期的性力活动，除少许痕迹以外，作为一个规律，几乎全部失掉其重要性。如果以后出现一种障碍，里比多被抑制就会促使旧的渠道回复活动。这种状态是专指一种新出现同时又是不正常的情况讲的。早期的、幼儿的性力活动代表里比多的正常运用，而里比多返回幼儿的途径就是一些不正常情况了。所以我的意见认为弗洛伊德将儿童的性力表现称为“变态”是不正确的，因为对一种正常的表现不能用一个病理学的术语来标明。这种不正确的用法产生了使科学界迷惑的有害后果。其错误就在于将从精神病心理学取得的见解移用到正常人身上，它设想在精神病患者身上里比多所采取的不正常的途径也仍然和在儿童身上的发生的一样。

我愿顺便提起，所谓“儿童时期的健忘症”也是病理学名称类似的一种不合理的“返回”应用。健忘症是一种病理状态，以某种意识内容的压抑为主要因素，这不可能等同于儿童的顺行性健忘。后者在于没有能力再产生记忆，如在原始人中也发现这种情况那样。没有能力再生产记忆这一现象是从出生时开始，根据明显的生物学理由可以理解。如果我们设想幼儿意识层的质量差异，根据神经官能病类推，全然可以简化为性的压抑，它将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假说。神经官

能病的健忘症像是从连续的记忆中被强力排斥出来的；可是幼儿的记忆却是由无记忆连续统中的单独岛屿组成。这种状态在任何意义上都与从神经官能病发现的情况相反，所以用“健忘症”这术语表示是绝对错误的。所以说，“儿童时期的健忘症”是从神经官能病心理学的一种推论，正如儿童的“多形态反常”性格一样。

性的潜伏期

所谓儿童时期“性的潜伏期”，作为特殊学说中理论公式，其错误已开始明朗化。弗洛伊德观察到，幼儿时期性的显示，即我称为性前阶段的现象，过一个时期消失，并且只是在更晚的时间后重现。弗洛伊德所称的“幼儿手淫”——就是我前面谈到的所有的准性活动——是说以后转变得像是真的手淫。这样一种发展过程在生物学上是独一无二的。为了适应这个理论，我们就必须假设，例如，当一个植物长成了一个花蕾，花朵由此准备开放，但这朵花在盛开以前又重新缩回，再次藏入花蕾中，以便往后再以相似的形式重新出现。这种不可能的假设，无异于断定性前阶段幼儿的活动是性的现象，从而断定这个时期的准手淫动作是真正手淫所造成的结果。在此这不正确的命名以及性力概念的无限延展受到了报复。这样，弗洛伊德不得不假定有一个性力的消失，换句话说，就是有一个性的潜伏期。他所说的消失与性力的真正开始没有什么不同，任何事物在它之前都只是一个初始阶段，没有真正性的特征能认为是属于它的。这样就极简要地阐明了性潜伏一说是不可可能的。

潜伏期的理论作为儿童性力概念是不正确的绝妙例子，但是这观察结果并没有错误，相反，潜伏期的假说证明弗洛伊德观察到的性力重新开始的现象是多么准确，它的错误在于这概念。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其主要错误在于没有超越守旧的多本能概念的界限。如果接受这种两个或更多的本能并存的概念时，我们就必须这样推断：一种本能尚未显示出来，根据旧的预成论^①，它仍然存在于胚心中。或者，在自然科学中，我们就不得不说，当一块铁所以能从热的条件达到发光的条件，就因为在热中本有光已存在于胚心中（潜伏）。这种设想是将人思想任意引向先验领域，违反了认识论的要求。所以我们无权说性本能存在于胚心中，正如我们无权对本可以用更合适的方式、用其它方法解释的现象却给予随心所欲的解释一样。我们只能说这是滋养功能的显示、性功能的显示等等，并且只是当这些功能已经明显无误地表现出来时才能这样讲。只是当看到这块铁已经发红时，而不是这铁仅仅发热时我们说它发光。

弗洛伊德作为一个观察者十分清楚地看到，神经病患者的性力不能真正地与儿童的性力相比，正如，两岁儿童的肮脏和40岁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肮脏有极大区别一样。一个是正常的，“另一个则已经受到作为病体的这样那样的影响。弗洛伊德在他的《三论》中插入了短的篇幅，说明神经病患者性力的儿童形式或是全部地，或是某种程度上部分地由于回归。这就是说，即使在这些可以说仍属于“儿童途径”的旧

^①一种旧的繁殖理论设想每个种的第一个动物产生时，出自它那里的同种的所有其它个体的种子都包含在它的卵细胞中。——译者

领域中，其功能也是被回归所加强的。这样，弗洛伊德承认精神病患者儿童形式的性力大部分是回归的现象。其必然如此，是近几年科学研究所证实的，它表明，对精神病患者儿童心理状态的观察结论对正常人也同样真实。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说，精神病患者儿童形式性力的发展历史与正常人只有极少的区别，其引人注目的区别更是罕有的，这可能是它完全为科学评价所忽略的原因。

现时病因的意义

我们透视儿童发展的心灵越深，我们越得出这样的印象：儿童创伤的病因意义和所能发现的病因本身同样少。即使锐敏地探查其各自的历史，我们也永不能发现为什么生在德国的土地上人民的命运恰恰如此，为什么高卢人另是一样。在分析研究中，距离神经官能病显示的时间越远，我们所能发现的真正有效病因越少，因为我们向过去返回得越远，这失调的动力也越来越趋向于消失。当创建一种从遥远的过去找出精神病成因的理论时，我们容易首先倾向于追随病人的过去，而忽略或偏离关键的现时。病因冲突的原因主要在于现时。这正好像一个国家总是将它悲惨的政治状态归咎于过去，如19世纪的德国将它的解体与无能归咎于罗马对它的压迫，而不从现在的现实中寻找困难的原因。殊不知更具关键性的现时的病因，唯有找出现时病因才可能真正除去病因。

精神分析学派仍有很大一部分人被儿童性力是神经官能病的主要条件的概念所拘束。不只是由于科学兴趣而追溯儿童时期的理论家，就连实验分析者也认为必须翻出儿童的历史。

史，以便发现形成神经官能病的幻想。这真是一种无用的计划！就在这同时，许多重要的因素从他那里漏掉，往往漏掉的恰好是所需要的现时的冲突的事例。在我们已经描述过的事例中，如果我们从幼儿时期去寻找，我们不可能了解任何产生歇斯底里刺激的情绪。这些回忆只是决定了其形式，而动力因素却从现时发出，只有洞察现时的意义才能真正地了解发病的原因。

可能在此这样说并无不当：永远不会发生由于许多误解而造成我会对弗洛伊德本人横加责备的情况。我十分了解弗洛伊德，他作为一个经验主义者，总是发表仅仅暂时性的公式，对此他肯定不认为是有任何永久的价值的。但同样确切的是：科学界群众总倾向于从中取得信条。一方面怎样无根据地、盲目地宣称一个系统，另一方面就怎样受到攻击。我只能说，某些从弗洛伊德全部著作中提出被具体化了的通常概念，过于被教条地对待了。这些观点已导致无疑是错误的技术公式，而在弗洛伊德本人的著作中不可能确切地认为这些公式的存在。我们知道，在新观念创造者的心中，事物比在其追随者心中更容易改变、容易适应。追随者不具备创造者生气勃勃的创造性，他们用一种教条式的忠诚来弥补这种不足。这恰恰是对手们所采用的方法。他们死死抓住那已成具文的片言只语，因为他们不可能领悟其有生命力的内容。我的话主要还不是对弗洛伊德讲的，我知道他在一定程度上是承认这神经官能病最后方位的确定的；我的话主要是对他的群众，他们仍在继续就其观点进行着喋喋不休的争论。

如上所述，我们对神经官能症历史的见解，只是当我们了解到每种单独的因素各自从事的目的时方可取得。现在我

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我们的病例中过去历史中的特定因素是病因的；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它被选定为一个象征。通过回归的概念，理论从儿童经验意义的狭隘公式中解放出来，而实际冲突获得了经验证明的重要意义。弗洛伊德本人提出了回归的概念，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在他的“三论”中，他正确地承认实际，经验不允许我们单独从过去中寻找神经官能病的原因。如果这是真实的，那么，回忆的事物则由于回归的激励又成为有效的了。我们不得不考虑，回忆中事物明显的决定性影响是不是可以仅仅追溯到里比多的回归为止。

正如你们已经听到的，弗洛伊德本人在他的三论中使我们了解到神经官能病患者性力的幼稚病大部分是由于回归。这番叙述比文中讲的应该更予强调。（弗洛伊德在他后期的著作中实际上已这样做了）。这个观点是，里比多的回归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几时经验的病源意义。令我们十分奇异的是，在神经官能病的形成中，埃迪帕斯或艾丽克楚情结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这些情结每人都存在，即使他是由养父母带大而从不知自己的亲生父母也是这样。我曾分析这类病例，发现乱伦情结在他们身上也和和其它病人身上同样地发展。这对我来说，看来是很好的证明了，乱伦情结比起一个纯粹的回归幻想结构更不是一个实在物，并且由它所产生的冲突，不合年龄地固着于儿童状态比真正的乱伦欲望（这仅仅是回归幻想的掩盖）程度要轻得多的。从这个观点来看，儿童时期的经验只有当它被里比多的回归提高了重要性时对神经官能病才有意义。它之所以必然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个事实已经表明，即：既不是儿童的性创伤，也不

是每人所显示的乱伦情结造成了歇斯底里症。只是当乱伦情结被回归所激励的时候才出现神经官能病。

适应的失败

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里比多回归？为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更密切地考察回归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发生的。在和我的病人们讨论这个问题时，我通常举这个例子：一个爬山者试图登上某高峰，不料遇到了不能越过的障碍，比方说，一个陡直的坡度，绝不可能攀登。找不到别的路之后，他将要返回并遗憾地放弃攀登高峰的打算。他会对自己说：“我没有能力克服这个困难，所以我应爬一座容易登上的山。”

在这里我们看到里比多的正常运用：这人当遇到不能克服的困难时返回，将他不能达到最初目标的里比多用于攀登另一座山。

现在让我们想像，就他的体力来说，那种陡峭的岩表并非真的不能攀登，但他由于极端怯懦在困难面前退缩了。在这种情况下便出现两种可能：

1. 这个人将为自己的胆怯而烦恼，并且要开始在别的场合中证明自己不太胆怯；或者，他承认由于自己胆怯，将永远不能再从事这样勇敢的攀登。无论如何，他会认识到自己的精神力量不足以克服这些困难。这样，他会把这没有达到最初目的的里比多用于自我批评的有用目的，用于发展一项根据他的精神力量已可以作到的计划，以实现他登山的愿望。

2.第二种可能是，这个人承认自己的胆怯，尽管他能清楚地看到，如有足够的勇气这个障碍是可以克服的，可是他断言这岩石不是他所能攀登的。他宁愿欺骗自己，产生了这种心理状态，但这种状态对我们的论题有重要意义。

归根结底，这个人清楚地知道体力上有可能克服这个困难，他只不过在精神上没有能力这样做。但他又由于这种想法有伤他的自尊而将它推到一边。他是如此自负，以致他不能承认自己胆怯。他吹嘘自己的勇气，宁可声称这事情不可能而不说自己的勇气不适应。在这种情况下，他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他对情况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隐藏了这个认识，将它藏在勇敢的幻觉后面。他抑制住自己的正确见解并试图将他主观的幻觉强作为真实。这种冲突的结果是他的里比多的分裂，两半部里比多相互搏斗。他使自己爬山的愿望与自己杜撰并用虚伪理由支持的这山不可能攀登的意见相斗争。他退后并不是由于真正不可能，而是由于他自己虚构的人为的障碍。他陷入与自身的分裂中。从这时起，他受内部冲突的折磨。时而他的胆怯占了上风，时而他又轻蔑、自负。无论哪种情况他的里比多都纠缠于无用的内战，于是这个人就变得不可能有任何新的进取精神。他将永远不会实现他的登山愿望，因为他对自己精神质量的估计已完全步入迷途。他的效能已经消减，他已不能完全适应，一句话，他已成为神经官能病患者。面临困难而后退的里比多既没有导致真诚的自我批评，也没有导致为克服困难而不惜一切的绝望挣扎。它只用于维持这廉价的口实：攀登上去是绝不可能，即使有英雄的勇气也无济于事。

返回到儿童水平

这类反应叫作幼儿反应。它一般具有儿童的特性和儿童的心境，不能发现自身的错误而只看到外部事物的错误，把自己主观的判断强加于事物。

所以，这样的人用儿童的方法解决问题。他用儿童心情特征的适应方式代替第一个爬山者的适应态度。这就是我们所指的回归。他的里比多在不能克服的障碍面前撤退，并用儿童的错觉代替真实的活动。

神经官能病这类病例常常是随时都能够发生的。我只想向你们提一提那些在决定是否订婚的时候突然得歇斯底里病的年青姑娘们，作为一个例子，我想说说那姊妹二人的病例。这两个姑娘年龄仅差一岁，才能和性格都十分相近。她们受到同样的教育，在同一父母的影响和同样的环境中长大。两个人表面上都健康，没有表现过任何值得注意的神经病的症状。有心的观察者可能发现，年长的女儿比年小的更受父母的宠爱。她父母所以更宠爱她是由于这个女儿显示出的特殊的敏感。她要求比妹妹更多的怜爱，她有点比妹妹更早熟和更柔弱。此外，她显得有些孩子气的愉快的特点。正是这些情况，由于她的矛盾和有点不平衡的特性，使得她特别动人。无疑父母对长女特别喜欢。

当两姊妹都到了结婚的年龄，她们二人结识了两个小伙子，不久接近了结婚的可能。按一般情况，这必会遇到某些困难。两个女孩都很年轻而且很少社会经验。男的也很年轻，所处位置可能好一些，刚开始事业，都很有能力。这两

个女孩生活的社会环境使她们有权产生某些期望，不免对自己的婚姻是否理想有些怀疑。两个女孩对自己未来的丈夫都没有充分的了解，甚至都不能十分肯定他们对自己的爱情，因而对婚事迟迟不决。人们注意到，姐姐对此尤其表现了更多的踌躇。这种犹豫弄得两个小伙子有时感到痛苦，自然敦促她们作出确切的回答。在这种时刻姐姐比妹妹表现得更为激动。多少次她对母亲哭泣，自叹没有把握。妹妹却很果断，接受了求婚者，结束了这未定的状态。这样她克服了困难，以后的事就都顺利进行了。

当姐姐的恋人听到她妹妹已经许下诺言时，他跑到情人面前热情地请求她最后答应。他这种急躁的性格激怒了、甚至吓着了她的恋人，尽管她本来想按妹妹的样子做。她用傲慢而且有点不客气的方式作了回答。他用尖锐的谴责回报，这使得她回答得更为尖刻。最后出现了可怕的景象，他怒气冲冲地走开。他在家里，把这事情经过告诉了母亲，她表示了意见，认为这个女孩显然对他不合适，他最好再另找一个。这次争吵使得她深深地怀疑自己是否真地爱他。她似乎突然感到不可能离开自己心爱的父母，随这样一个人去听任命运的摆布。最后事情发展到他们的关系完全破裂的程度。从此这女孩变得郁郁寡欢，她对妹妹显然表现得极为嫉妒，但她既从未觉到也从不承认有嫉妒心理。以往与父母欢快的关系也已破灭。代替她早期孩子般情爱的是闹气的样子，有时成为粗暴易怒，随着一连几个星期抑郁阴沉。当妹妹举行自己的婚礼时，她到遥远的疗养所医治神经性肠膜炎。我不再继续讲述她这病史，它已发展为一般的歇斯底里症。

当分析这个病例时发现她对性的问题有很大阻力。病人

由于有许多荒谬的幻想不会承认这种阻力的存在。年轻的姑娘自己都弄不清楚，这些荒诞的幻想，它可能从何而来呢？在提出这个问题后揭开了一个事实：有一次，当她还是8岁的儿童时，她在街上突然发现面前有一个花疯子（阴部裸露症患者），她吓得呆在原地。此后很久这个丑恶的影象老在梦中追逐着她。那时她妹妹曾和她在一起。病人告诉我这件事后的夜里，她梦见有个穿灰外套的人在她面前开始做花疯子干的那件事。她被吓醒并叫了起来。

她对这灰外套的第一个联想是她父亲的外套。当她大约6岁的时候，她和父亲在一次旅游中父亲曾穿过。毫无疑问，这个梦把她父亲和花疯子联系在一起。这必然会有一些原因。是不是她父亲发生了一些事使得有可能招致这样的联想？这个问题遭到了病人的强烈反对，但不能听任不问。在下一次的谈话中她重说出一些很早的记忆，其中有她曾看见过她父亲光着身子的情节。有一天她局促不安地来告诉我，说话时都恐惧得发抖了，她曾有过一次丑恶的窥视，十分清楚。晚上她在床上忽然感到她又返回到两三岁的年龄，并且看到他父亲淫秽地站在她的床旁。这个故事是她喘着气一点一点说出的，显然有强烈的内心斗争。以后带来广泛的哀伤，觉得一个父亲对自己的孩子做这样丑恶的事是多么可怕！

没有比父亲真的这样做更不可能的事了。这只是一个幻想，是在分析过程中根据因果关系的需要推测地构想出来的。同样因果关系曾一度将分析导入迷途，而认为这歇斯底里症只是由于上述的印象造成的。

这个病例对我来讲，似乎是为证明回归理论的重要性，

同时并为表明以往理论错误的根源而精心设计出来的。最初，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在两姊妹之间只有少许差异，但从她们订婚的时间起，她们的道路就完全分离了。她们现在看来像是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性格。一个精力充沛，热爱生活，是一个美丽勇敢的姑娘，愿意服从妇女自然的需要；另一个则是抑郁的，脾气不好的，充满痛苦和怨恨，不想做任何努力过合理的生活，她对周围所有的人都负、爱争吵，令人讨厌。这显著的区别只是当姐妹中有一人克服了订婚时期的困难而另一人没有时才发生的。事情会不会破裂，对她们俩当时都如同悬丝。妹妹只是更为平静，更为坚定，她能够在适当的时刻找出适当的话来。姐姐则更被宠坏，更为敏感，因而更受情绪的影响，所以她不能找到适当的词句，也没有勇气牺牲自己的自尊心而使事情在以后顺利地发展。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小小的原因产生了巨大的后果。是因姐姐更为敏感造成了所有这些区别。

敏感与回归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产生如此不幸后果的敏感从何而来？分析表明，她具有一种充分发育的非常的性力以及一种儿童的、幻想的特性，对于父亲有一种乱伦的幻想。设想在病人身上这些幻想早就存在并且活动着，关于敏感的问题我们就可以很快地、很简单地予以解决。我们可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这女孩如此敏感：她完全封闭在自己的幻想中，对她父亲暗暗地爱慕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她愿意爱别的男人并且与他结婚那将是一个奇迹！

我们越是随着因果关系的要求，进一步往回追索这些幻想发展的起源，分析就越发困难，就是说，成为更大的，如我们称之为的“阻力”，最后我们达到印象最深的那一景象，即父亲淫秽的动作（尽管已经证实它并未发生）。这种景象恰好是以后幻想构造的特征。所以我们必须设想这些困难、这些“阻力”不是，至少在这分析阶段不是抵御对这痛苦回忆的认知，而是抵制构造这种幻想的一种反抗。

你们将会惊奇地问：那么是什么东西迫使病人编织这些幻想呢？你们甚至要猜想是分析者强使病人杜撰了这些话，否则她不会产生这些荒诞的想法。我不冒然怀疑有的病例是分析者要发现原因，特别是在创伤理论的影响下而强使病人杜撰这类幻想的。但是不论轮到哪位分析者分析病因时，如果他不是跟着这病人的思想路线，参加到里比多的返回运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回归的话，他就永远达不到这个理论。他是简单地落实了这病人所不敢落实的逻辑结论，这就是回归，里比多的返回以及它所引起的全部后果。

所以，当追踪里比多的回归时，分析者并不总是跟随着历史发展所标志的实际路线，而往往是以后只是部分地以过去的实际为基础的幻想的路线。在我们的病例中也是这样，事件只有部分是真实的，并且它只是在以后，当里比多回归时才具有重要的意义。每当里比多抓住某个记忆的事件，我们都可料到这事件是经过精心加工和变了形的，因为里比多接触到的任何事情的再兴，都采取着戏剧性的形式而且变得系统化了。我们必须承认，绝大部分的材料，只是在以后当回归的里比多抓住在它回归途径中任何适当的事物并将其全都转化为幻想时，才变得有重要意义。到那时这幻想就随同里比

多的回归运动最终落到她父亲上并把儿童性的愿望加之于他，甚至产生这样的想法：天堂的黄金时代在于过去！

正如我们所知，经分析显示出的幻想材料只是以后才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并不是已处于可以用这材料阐明神经官能病的开始的地位，我们还要不断地作循环运动。患神经官能病的关键时刻只是当这一对青年男女都准备和解，而这病人或者还有她的男友由于不适宜的敏感使得机会溜掉的时候。

敏感是主要的吗？

可能这样说——精神分析学派倾向于这种观点——这关键性的敏感产生于一种特定的心理历史，它造成的结果是预知的必然结论。我们知道，精神性的神经官能病的敏感永远是自身分裂的症状，是两种分歧的倾向之间互相斗争的朕兆，其中的每种倾向都有其史前背景。在我们的病例中清楚地表明，关于病人敏感真正原因的特殊阻力事实上是与某种幼儿性的幻想活动，也与所谓创伤经验（这些事可能正好在性力上投下暗影）历史地联系在一起。如果不是这病人的妹妹和她经验了许多相同的事（包括遇到那花疯子）而没有遭受同样的结果、没有变成神经官能病的话，这种说法就像是十分合理的了。

所以我们必须设想病人以一种或许比她妹妹更为强烈和持久的特定的方式经历了这些事情，而且幼儿时期的事件最终对她更为重要。如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那么，在当时某些强烈的影响肯定会被注意到。但在她们青春后

期，这幼儿时期发生的事对病人和对她妹妹一样，有同样多的事都已过去并已完全结束，所以，关于这关键的敏感还有其它可以想像的推测，这就是，它并不是来自她特殊的史前背景，而是自始至终地存在。一个对小孩的细心观察者可以发现即使幼儿时期也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寻常的敏感性。我有一次对一个歇斯底里症患者进行精神分析，她向我出示了在她两岁时她母亲写的一封信。她母亲在信中谈到了她和她的妹妹：她——这个病人——是一个总是和善而且有进取心的孩子，而她的妹妹却很难与人相处。第一个以后得了歇斯底里症，而另一个则有情绪紧张的毛病。这极大的区别追溯到幼年时代不可能由意外事件所致，而必须把它看作是天生的。根据这个观点，我们不能断言，我们的病人在关键时刻的敏感要归咎于她特殊的史前背景，可以更正确地说，这种敏感性是天生的，而且，在任何非常场合会表现得更为强烈。这种过份的敏感常使得人的个性丰富，并使得她比一个个性消失的人更为动人。只是当困难和非常情况发生时，这种有利往往转变为极不利，因为平静的思考随即被不适时的影响所搅乱。可是没有比把这过份的敏感看作它本身就是病理特征的组成部分更为错误的了。如果真是如此，我们就要把人类的四分之一估计为有病的了。然而，如果这种敏感对某一个人有这样坏的后果，我们就必须承认，不能再将它视为很正常的了。

当我们对心理上史前背景重要性的两种观点进行对比时，就遇到了像我们所作分析的那种矛盾。事实上，无论对哪种观点这都不是问题。某种天生的敏感产生一种特殊的史前背景，而儿童时期经历的特殊事件不可能对儿童世界观的

发展没有影响，这些事件和强烈的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不可能对敏感的人不留下一些痕迹而消失无踪，其中会有一些一直影响整个一生，这类事件对一个人的整个心理发展能起决定性的影响。在性力范围的污秽，从迷梦中醒来的经历对敏感的人往往在以后的年月里都惶恐不安，所以仅仅是性的想法也会产生极大的阻力。

如创伤理论所表明，当我们知道这些事件时，就极容易把一个人情绪的发展全部地、至少是大部分归咎于意外事件。陈旧的创伤理论在这方面走得太远了。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世界首先是一个主观现象。我们从这些意外发生的事件接受来的印象也是我们自己的行为。认为这些印象是无条件地强加于我们是不真实的。我们自身的性向左右了这印象。一个里比多呈封闭型的人比起里比多十分活跃的人来，接受的印象总是十分不同而且更为明显。一个在某方面敏感的人从一个事件中会接受深刻的印象，而同样是这个事件不敏感的人会冷漠置之。

所以，除意外的印象外，我们必须认真地考虑主观的条件。我们以前的评论，特别是我们对一个实际病例的讨论，已经表明最重要的主观条件是回归。如实际经验所表明，回归的影响是如此巨大、如此动人，以致人们很容易把意外事件的影响单独归因于回归的机制。毫无疑问，有许多病例其中的每件事都是被戏剧化了的，甚至这创伤经验也纯粹是幻想虚构的，而其中少许的真实事情也完全被以后精心编织的幻想所歪曲。⁶我们可以准确无误地说，没有一个神经官能病的病例其先前经验对情绪的意义不是被里比多的回归所加强，甚至在幼儿发育的很长阶段它看来都有非常的重要性（如

与父母的关系），几乎总是回归使它具有了这种意义。

真理总是处于居中地位的。这以往的历史当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它又是被回归所加强。有时这以往历史的创伤意义占据更重要的地位，而有时只是它的回归意义占重要地位。这种考虑当然也同样适用于儿童的性经验。显然有些病历中的不合理的性经验为投于性力上的暗影找出理由并使以后产生的性阻力完全成为可以理解的（我要顺便提一下，那惊恐的印象与性的不同，它能永久留下一个不安的感觉而使个人对真实抱犹豫不定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无疑应属于创伤力量的真实事件并不出现——正如大部分神经官能病的病例所表明——而回归的机制却占统治地位。

可能有这样的反对意见：我们并没有一个标准来判断创伤的潜在影响，因为这完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种说法并不完全真实。在普通的正常人中我们有这样一个标准：有些事看来对正常人会产生强烈而持久的印象，就必须认为对神经官能病患者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我们即使对神经官能病也不能将决定性的作用归之于在正常情况下必被忘却或不留下印象。在大多数其中的一些事件具有意想不到的创伤结果的病例中，我们十之八九会找到一种回归，这就是说，一种从屈的幻想的戏剧化。说儿童时期一种印象产生得越早，这个事实就越不可靠。原始人和野兽不像在文明人所发现的那样，对独特的印象具有复活记忆的能力。极小的儿童绝不像大一点的儿童那样易受感动。心理能力的高度发展是易受感动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所以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设想，患者在儿童时期的一些印象经验为时愈早，它也就愈像是一个幻想和回归。更深的印象仅仅能从儿童后期经验中可望得

到。无论如何，我们一般必须把回归的意义只归因于早期幻想的事件，也就是说，在5岁以前。在以后的时期，回归有时也起一种决定性的作用，但即使如此，也决不可过小地估计偶然事件的重要性。在神经官能病后期的发展过程，偶然事件和回归共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退避生活导致回归，而回归又加强了对生活的阻力。

回归目的论的意义

在将我们的争论向前推进之前，我们必须回到回归幻想具有什么目的论意义这个老问题上来。我们也许满足于这种假说，即认为这些幻想只简单地是真实活动的代替物，因而没有更多的意义。但这很不可能。精神分析理论倾向于在幻想（错觉、偏见等）中看到神经官能病的原因，因为幻想的性质泄露出那种经常直接反对合理活动的倾向。当然，这看来往往像是病人真地利用其以往的历史，只是证明他不能合理地活动，于是分析者，也和其他人一样，很容易对病人产生同情（也就是说，不自觉地和他一致起来），得出这样的印象：认为病人的理由构成了真正的病因。在其它情况，幻想更带有奇异的理想特征，它在粗陋的现实中加上优美的幻象。这里总是或多或少地出现明显的妄想自大狂，以或多或少地补偿病人的懒惰和迟缓无能。可是这明确的性幻想往往十分明确地透露它的目的，使病人习惯于自己性的命运这种想法，而帮助他克服阻力。

如果我们同意弗洛伊德所说神经官能病是自我医治的一种不成功的尝试，那么，我们也必须承认幻想具有双重特

性：一方面，一种对阻力的病理倾向；另一方面，是一种有用的、准备性的倾向。一个正常的人当他的里比多被障碍所阻塞的时候，就迫使他进入内向的状态并使得他折回。对于一个处于同样条件下的神经官能病患者也是这样：始而产生内向，随之增加了幻想活动。但他固执不移，因为他宁采用幻想——对他来说作为一种更容易的适应方式。他并没有看到，他这是把暂时的利益换成永久的不利，而且这样使自己有了一个坏的转折。同样地，对于市政当局，忽略所有那些令人讨厌的卫生预防是更容易、更方便的方法，可是一旦时疫来临，这省略的罪过就会遭到痛苦的报复。所以，如果神经官能病患者要求各种幻想的缓和方式，他就必须接受其后果；如果他不愿意去接受后果，后果也将要追踪他而至。

一般说来，否认神经官能病明显的病理性的幻想有目的论上的价值将是巨大错误的。事实上它是精神化的最初起源，是为找到新的适应方式的最初探索尝试。向幻想的水平撤退不单单意味着回归和停滞，也是发现新生活计划的可能。这样，回归的的确是创造活动的基本条件。我必须再次指示你们参阅我的经常被我自己引用的著作《变形的象征》。

8. 精神分析的治疗原则

根据回归的概念，精神分析或许取得了本领域最为重要的发现。这不只是推翻了、或者至少是大大地修改了神经官能病起源的早期说明公式，而且首先对实际冲突作出了正确的评价。

在我们先前关于一个妇女和马的病例中，我们看到，那病症学上的戏剧化情节只是当它被看作实际冲突的一种表现时才能被理解。在这一点上精神分析理论与联想经验结果结成同伙，对此我在克拉克大学的讲演中已谈到。当联想经验传导到一个神经官能病患者时，它就给我们许多确定其实际生活冲突的标示，对此我们称之为情结。这些情结中正好包含着那些使得病人自身不调协的问题和困难。一般我们看到特征十分明显的爱的情结。根据联想经验的观点，神经官能病的形成与根据早期精神分析理论的观点所讲的大不相同。根据早期精神分析理论的观点，神经官能病的形成，似乎是根源于早期幻想而又超出了正常精神结构的发展。根据联想经验的观点考虑，神经官能病则像是对现实冲突的反应，这冲突当然和常在正常人中发现的一样，区别在正常人会不十分困难地将

它解决了，而患神经官能病的却总是抓住这个冲突。看来，神经官能病或多或少地就是他固着于此的后果。所以，我们可以说，联想经验的结果有力地支持了回归理论。

对神经官能病患者幻想的评价

借助于神经官能病较早的、历史的概念，我想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一个带有强烈父母情结的神经官能病患者对于适应生活有这样大的困难。可是现在我们知道了，正常人并非不具有同样的情结，并且在原则上和神经官能病患者经历同样的心理发展，我们不能再用某种幻想系统的发展来解释神经官能病了。我们不能再问病人是不是有父亲情结或母亲情结，或者有无和父母联系在一起的乱伦的无意识幻想。因为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每个人都有这些潜意识，认为只是神经官能病患者有这种事是一个错误。我们还不如问：病人不想履行的是什么事？病人试图避免的是什么困难？

如果一个人总是试图使自己完全适应生活的条件，他的里比多就总是被正确和适当地运用。如果情况相反，里比多就被阻塞並产生回归的象征。对适应的要求不能履行，或是神经官能病患者在困难面前畏缩，归根结底，是每个生物当面临新的适应的努力时表现的踌躇不定。动物训练在这方面提供了有益的例子。在许多病例中，上面的解释原则上是足够了。根据这个观点，早期的解释方法，即仍认为神经官能病患者的阻力是由于受幻想的牵制所致，看来是错误的。但只以一点原则为根据将是极片面的。幻想的束缚也是存在的，虽然幻想照例是次要的。神经官能病患者之受幻想（错

觉、偏见等)的束缚，惯例是从最早的儿童时代无数次遇到障碍因而产生的回归作用下逐渐发展成的。这一点现在连每个精神病学的专科学生都熟习了。这些病人将他们的神经官能病用作逃避困难和回避自己的责任的借口。习惯性的逃避造成了一种心理的惯态，而认为在幻想中生活下去以代替去履行不愉快的义务是应该的。这种幻想的束缚使得神经官能病患者觉得现实似乎不真实，对于他，比起对正常人来，这些都少有价值，少有兴趣。但也正如我以前所阐述的，这种幻想的偏见和阻力有些时候，根据经验完全不是有意的，换句话说，并不是有意寻找悲观失望。

神经官能病基本、深刻的根源看来是天生的敏感，它甚至使母亲怀抱中的婴儿产生麻烦，其表现形式就是不必要的激动和阻力。精神分析诱导出的神经官能病明显的病源论，在许多病例中，事实上只是带有一定目的并且是由病人创造出的幻想、记忆等等精心选用的记录，这些创造出自病人没有在生物上适应的里比多。这些像是病源的幻想因此看来不是别的，而是对现实不适应的编造的代替物、伪装和牵强的解释。前面所提到的背离现实和回归于幻想的恶性循环自然极容易造成似乎是决定性原因关系的错觉。对此分析者和病人都相信了。在这个机制中意外事件的介入只是作为“缓减的情况”。无论如何，对真实的、有效的存在必须加以认识。

我必须承认，那些阅读了精神分析病例的历史，从中得出印象，说这全是幻想的和人造的批评者们，是部分地正确的。只是他们错误地把这幻想制品和这可怖的、牵强的象征归之于分析者的暗示和丰富的想象，而不是归之于病人那无比丰富的幻想。精神分析病例历史的幻想材料中当然有许

多是人造的。但更引人注意的事是病人活跃的创造性。可是，当批评者说神经官能病人没有这样多的幻想时他们并不十分错。我不怀疑大多数的病人具有任何幻想都完全是无意识的。当它处于无意识层时，只是当幻想对意识层具有一些明显的效果时幻想才是“真实”的，例如以梦的形式出现时；否则我们可以明明白白地说它不真实。所以，任何人忽略了无意识幻想对意识层所加的几乎觉察不到的影响或是省却了对梦的彻底的无可指责的技术分析，就很容易完全忽视了病人的幻想。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些被人经常重复的反对意见时，我们就很容易一笑置之。

虽然如此，我们必须承认其中是有些道理的。病人的回归倾向，被精神分析者诊断其为无意识幻想活动时的关切所加强，即使在分析的时候幻想仍在进行发明和创造。人们甚至可以说，这处在被分析状态的幻想活动大大加强了，因为病人觉得他的回归倾向被分析者的兴趣所加强因而产生甚至比以前更多的幻想。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的批评者经常谈到，对神经官能病有意的治疗应该恰好与精神分析者所采取的方向相反，换句话说，首要的治疗任务就是将病人从他不健康的幻想中解脱出来，使他再重返回现实生活。

精神分析者对这些当然是很清楚的，但是他也知道人们能有多大作为将神经官能病患者从幻想中解脱出来。作为医生，³如果不是极充分的理由，自然不会梦想选取被所有专家反对的困难、复杂的方法，而舍弃简单、明确、易行的途径。我相当熟习催眠性暗示和Dubois氏法，但是我不用它，因为比较起来它的效果不好。由于同样的理由，我也不用使病人恢复能力力的再训练，因为既然精神分析法使我们得到更

好的结果，何必一定用它呢。

积极参与幻想

但是，如果我们采用精神分析法，我们就必须随着病人的回归幻想进行。精神分析学对症状的估计较通常的精神治疗方法有更广的看法。通常的治疗方法都是从神经官能病完全是一种病理学的构成这种设想出发的。至今整个神经学中，还没有人曾想过在神经官能病中看到治疗的企图，或者，因此而认为神经官能病的构成有相当特殊的目的性意义。但是，正如每种病一样，神经官能病仅仅是致病原因与正常功能间的一种妥协。现代医学不再认为发烧是疾病本身，而是认为它是机体有目的性的反应。同样，精神分析学并不想像神经官能病是违反自然的、本身就是病理的，而是认为它具有一定的意义和目的。

由此精神分析对神经官能病采取的是探询和期待的态度。在所有病例中都禁止判断症状的价值，而是试图去了解隐藏在症状后面的是何种倾向。如果我们能够用、比如像消灭毒瘤那样的方法来消灭神经官能病，那么我们同时就要消灭大量有用的能。我们节省这些能，也就是，通过追逐症状的含义并伴随着病人的回归运动，使这些能为促进恢复的目的服务。那些对精神分析的要素不熟习的人，要了解当精神分析者进入病人“有害”的幻想时能达到怎样的治疗效果肯定要有困难的。不只是精神分析的反对者，就连病人自己也怀疑这种方法的治疗效果。这种方法将注意力正好集中于病人认为没有价值、应受谴责而对之反对的事情上，即他

的幻想上。病人会经常告诉你，他先前的医生禁止他对自己的幻想有任何关心，并解释说，当他摆脱这些可怕的灾难时，即使只是暂时的，至少也可认为他是被治愈了一阵子了。当治疗把他引回到恰好是他一直要逃脱的地点时，他自然奇怪这有什么好处。

因此我们要告诉持反对意见的人：关心不关心病人的幻想完全决定于病人对其幻想的态度。迄今为止，病人的幻想都完全是消极的、不由己的活动。正如我们所说，他沉醉于自己的梦中。即使他的所谓“沉思”也不是别的，而是一种不由己的幻想。精神分析对病人的要求显然是相同的，但只有当一个人的精神分析知识十分肤浅时才有可能把消极的梦想与现在要求的态度相混淆。精神分析向病人要求的恰好与病人经常做的相反，他正像一个无意中落入水中沉没的人，而精神分析希望他像潜水员那样动作。领他去落到正好那个地点是没有任何可能的。那里有沉埋的珍宝，但只有潜水员能把它携出水面。

这就是说，当病人从合理的立场判断这些时，他把他的幻想看作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可是事实上，这些幻想实施了其巨大影响正是因为它具有这样巨大的重要性。它是被沉埋的珍宝，只有潜水员才可能发现。换句话说，病人现在必须与自己的愿望相反，慎重地将其注意力转向其精神生活。对他以往所梦想的，他现在必须有意识地、故意地去想。这种对自己思考的新方法，对于他以往的心灵状态，正像是一个潜水员对于一个溺水的人，他先前那种难抵抗的冲动现在有了一种意义和目的，它变成了需用的工具。病人在分析者的帮助下，将自己沉浸于自己的幻想中，不是为自己

沉醉于其中，而是为打捞它，一片又一片地，将它拿到阳光下。他这样就获得一个客观的有利地位，从这个地位来观察自己的内心生活，现在即可处理那正是他所惧怕和憎恨的事了。一切精神分析治疗的基本原理即在于此。

适应的任务

以前，由于他的疾病，病人部分地或全部地脱离了生活。因此他不顾自己的许多责任，或是关于社会成就，或是关于他单纯的做人的责任。如果他想再变得健康，他必须返回去履行这些责任。为提醒注意，我要讲明，这里所说的“责任”不能理解为一般的道德要求，而是对他自己的责任，同样地，我也不是指以自我为中心的兴趣——因为人也是社会存在，个人主义者是极容易忘掉这个事实的。一个正常的人分享共同的美德比保持个人的邪恶感觉舒服得多，不管这邪恶会怎样诱人。如果他让自己被这类的特殊兴趣所迷惑，他必然已经是一个神经官能病患者，或者是别种不正常的人了。

以前神经官能病患者在他的责任面前退缩，将里比多从现实要求于他的责任那里转移，至少部分地转移走，因而里比多才变成内向的，指向他的精神生活。因为没有企图控制任何实际困难，他的里比多沿着回归的途径行进，所以那幻想大量地代替了现实，使他们既是无意地也经常是有意识地喜欢生活在他的梦寐和幻想中。为了把他带回到现实中并去履行他的必要的任务，精神分析沿着病人的里比多所采取的，回归的“虚假”踪迹进行，所以在开始时精神分析看起来像

是支持他的病理的癖性。但精神分析者跟踪这虚假的幻想踪迹是为了恢复这里比多亦即这幻想的有用部分，有意识地将它应用于当前的责任上。但这只有把无意识的幻想连同和它相联系的里比多一起提出来才能办到。对于没有里比多相联系的部分，我们可以把无意识的幻想安全地留在它自己朦胧的存在处。病人仅根据这已经开始分析的事，不可避免地感到证实了他的回归倾向，就要在增加的阻力中把分析者的兴趣引到他无意识阴影世界的深处。

会很容易理解，每个分析者作为一个正常的人，自己将感觉到对病人回归倾向的巨大阻力，因为他完全相信这种倾向是病理性的。作为一个医生，他相信自己十分正确地活动而没有进入病人的幻想。他可以理智地被这种倾向所排斥，因为察觉某些人完全埋头于这样的幻想，注意他只觉得自己重要并且不停地赞赏自己，当然会引起讨厌的感情的。而且，对于正常人的美学感受，这神经官能病患者幻想的通常性质假如不是十分讨厌的话，也是完全不合人意的。当然，精神分析者，也正像真正愿意帮助其病人的其他医生一样，必须把这一切美学的价值判断放在一边，他必须做到听到不堪入耳的事也不发抖。当然，有许多身体有病的就诊者通过施用一般医学方法，营养的或暗示的，不经过周密的检查和根本的治疗而痊愈。但是严重的病情只能借助于以确切的调查和对疾病精湛的知识为基础的治疗。迄今为止，我们的心理治疗方法一般估价属于这类：在不严重的病情中它没有多大用处，在严重的病情中还真正有用。可是有许多病人证明是不容易接受这种方法的。这方面如果说有些事能起作用的话，那就是精神分析。当然，并不是说精神分析是一种万灵药：

——居心不良批评者才会这样讥笑。我们十分清楚，精神分析在某些病例中失败了，正如每个人都知道的，我们永远不可能治所有的病。

精神分析的“潜水”工作把肮脏的东西，一片一片地从黏泥中带出，必须首先将它洗净我们才能确认它的价值。这肮脏的幻想是没有价值的，要抛在一旁；可是与它相联系的里比多是有价值的，这些，经过清洗工作之后，将再变得有用。对于专业的精神分析者，正如对每个专家一样，有时像是幻想本身有价值，而不仅仅是这里比多。但它的价值不是关系到病人的。对于分析者来说，这些幻想只具有科学的价值，正如外科医生对于知道脓里是含有葡萄球菌还是链球菌可能有特殊兴趣，而这对病人来说则是无所谓的。分析者最好隐藏他的科学兴趣，免得病人企图从自己的幻想中找比所需要的更多的乐趣。归因于幻想的病因学意义（依我看并不正确）说明了在精神分析学的文献中为什么有这样多的位置让给了各种形式幻想的广泛讨论。一旦人们明白在这个范围绝对没有事是不可能的，这最初对幻想的估计，连同从中发现病源学意义的企图将逐渐消耗殆尽。将来对病例历史最广泛的讨论也决不会成功地将这个幻想的海洋汲干。在理论上每个病例中的幻想是不可枯竭的。

可是，在多数情况下，过一段时间幻想的产生会要停止。但你绝不能以此得出结论认为幻想的可能性已经耗尽，停止只意味着没有更多的里比多回归而已。当里比多把握了生活现实的支持力并被用来解决必要任务时回归运动才得以终止。有些病例，而且其中不是少数，病人继续产生无尽无休的幻想，或者是由于他个人的乐趣，或者是因为分析者的错

误期待。这样的错误初学者特别容易发生，因为他们被精神分析的病例历史所蒙蔽，以为存在幻想中病源意义因而把兴趣集中于此，并不断地努力从儿童时代的过去搜寻更多的幻想，徒劳地希望从中找到神经官能病难关的解决办法。他们没有看到解决的办法在于行为，在于履行某些必要的生活职责。可能要有反对意见说，神经官能病完全是由于病人没有能力完成这些任务，所以通过对无意识的分析，治疗者可以使他能够去做这些，或者至少教给他做这些的方法。

反对者提出这个方法是完全正确的，不过我们必须补充，只有当病人确实意识到他必须履行的任务——不只是学术上的、而是在一般理论要点上意识到它，而且意识到它的细节时这才是正确的。神经官能病患者的特征就是缺乏这种知识，虽然由于他的智力，他完全明白生活的一般责任，或许他们努力去履行这公认的道德箴言，只是过于困难而已。但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病人对自己无比重要的责任知道得很少，有时甚至完全不知道。所以，只在回归的途径上追随着盲目的病人，并且由于不合时宜的病因学的兴趣而把病人推回到童年的幻想中，这是不够的。我常从精神分析治疗的病人那里听到：“我的分析者认为我在某些地方一定有童年的创伤，或是我仍在被一种幻想压抑着。”除却这种猜测恰好属实的病例外，我是曾见过其它情况的。其中障碍的产生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里比多的活动被分析所停止，由于没有利用而从新沉回深底。这是由于分析者把注意力完全指向童年的幻想，未能考查病人必须履行的某种应适应现实的任务。其结果是，这里比多由于没有得到进一步活动的机会就永远再沉没回去。

有许多病人，完全为了自己的利益发现了其生活的任务，忽而宁愿生活在现实中而不愿生活在幻想里，因而相当早地停止产生回归幻想。很可惜，不是所有的病人都能如此。他们中有许多人把履行生活的任务无限期地延搁，甚至永久不履行，宁愿要他那无益的神经官能病的梦想。我必须再强调，所说的“梦想”我并非指有意识的现象。

根据这些事实和见解，精神分析的性质在这些年的过程中有了变化。如果说在第一阶段精神分析是一种“外科手术”，从精神中取出这异物——阻塞的感情，那么它后期的形式就是一种“历史方法”，试图研究神经官能病病源的一切细节并往回追踪到它最早的开始。

感情转移

没有疑问，这种方法的存在不只由于强烈的科学兴趣，也因为分析者个人的“动情”。在分析的病例材料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的痕迹。正由于分析者个人的感觉，弗洛伊德才可能发现其中有精神分析的治疗效果。虽然在以往只是从创伤影响的排除中去寻找，现在却发现精神分析提出的幻想全与分析者个人相联系。弗洛伊德称这个过程为“转移”，因为病人将以往与病人的记忆意象相联系的幻想转移到分析者身上。这转移不限于单纯的理智范围，更甚者，是投入幻想中的里比多突然连同幻想投落到分析者身上。所有这些群聚于病人成像周围的性的幻想，现在群聚于分析者周围，并且病人越不承认这些，他的无意识与分析者连结得愈加紧密。

这个发现在若干方面有根本的重要性，首先，转移对病人有重大的生物学价值。在现实上赋予的里比多越少，他的幻想越要夸大，他越要与世界隔绝。神经官能病患者的典型性在于和现实的紊乱关系，也就是说，在于他减少了适应性。由于向分析者的转移建起了一架桥梁，通过它病人可以离开他的家庭走入现实。他现在可以从他儿童的环境里走到成人的世界中来，因为分析者为他描绘了这家庭以外的部分世界。

另一方面，转移是治疗进程的一个巨大阻碍。由于病人觉得分析者（他应该代表一部分家庭以外的世界）与他的父母十分相像，这样，这个新增人物的一切便利都濒于险境：他越是能够客观地看分析者，把分析者作为任何其他个人那样对待，这转移的益处就会越大；他越是不能这样看分析者，他越是把分析者类同于他父母的成像，这转移的益处就越少而害处就会越大。因为病人只是通过增加了类似的父母而扩大了他家庭的范围，他自己仍和以前一样，停留在儿时的环境因而保留着他儿童的集体情感。在这种状态下一切转移的好处都可能失掉。

有些病人，他们以极大的兴趣遵循分析而没有一点改进，依然特别容易产生幻想，尽管他以往的全部历史，甚至最黑暗的角落看来已经都被人知道。分析者在历史观点的影响下可能很容易陷入迷圈，他不得不自问：在这个病例中有什么仍然需要分析？这正是以前我心里所想过的情況，当时我说，这不再是分析历史材料的事，而是行动，是克服儿童的状态。历史分析无非是一遍又一遍地表明病人在分析者面前保持一种儿童状态，不能告诉我们如何改变它。何况达到某

种程度，这种转移会发展到对任何病例来说都是严重不利的情况。已经逐渐证明，就连讨论过的这部分精神分析也特别有兴趣和有价值，虽然从科学的观点看，事实上它的重要性比起现在必须遵循的对转移本身的分析要小得多。

忏悔与精神分析

在详细讨论这精神分析特别重要部分之前，我愿意提请注意精神分析开始阶段与某种文化制度之间相同之处。这里的文化制度我是指忏悔的宗教制度。

没有事情比不安地隐藏和妒忌地保守个人秘密更使人孤独、更使人脱离与他人友谊的了。往往，一种“充满罪恶”的思想和犯过什么“罪恶”行为使得他们彼此分离和疏远。这时忏悔有时能起真正的赎救的效果。经常在忏悔后随着而来的解脱的非常感觉可认为是由于这迷途的人又被允许进入人类社会的缘故。他那如此难以忍受的精神隔离和隐遁终止了。忏悔的主要心理价值即在于此。

可是除此之外，还有其它后果：通过他的秘密和埋藏在它下面的一切无意识幻想的转移，一种道德的束缚便在病人和他的解罪神父之间形成。我们称此为“转移关系”。任何有精神分析经验的人都知道，当病人可以向他承认自己的秘密时，分析者个人的重要性无形中提高了许多。这样引起的病人品行的变化往往是令人吃惊的。这或许也是教堂预期的效果吧。人类的大多数明显地不只需要指导，而且愿意受到最好的指导和教育的事实，从某一方面来讲，证实了教堂给忏悔确定的道德价值。这装带着一切父亲权威标志的僧侣成

了其教徒可靠的领导和保护人。他是解罪神父而他教区的成员是他悔罪的孩子。

这样，僧侣和教堂代替了父母，并且在此范围将个人从家庭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就僧侣是道德高尚的、天生有高贵的灵魂和精神文明相匹配的人而言，忏悔制度可以被称赞为社会开导和教育的卓越方法，它事实上在一千五百多年中执行着巨力的教育任务。中世纪的教堂知道如何充当艺术和科学的保护人，它所以能成功地充当这个角色，部分原因是由于它对世俗的兴趣广泛的关怀，忏悔是一种令人惊奇的教育方法。但是当教堂证明自己在智力范围没有能力保持领导地位时，至少对于许多高度发展的人，它就失去了教育价值，这是精神僵化不可避免的后果。我们这个时代高度发展的人不愿遵循信条和教条，他们愿意去理解，所以如果他们把一切不了解的事抛到一边这是不足为奇的。作为最不容易理解的宗教象征，通常是最先做得过火的。¹坚定的信仰对知识所要求的牺牲是违反高度发展的个别叛逆者的意识的。

就分析而论，可能在大部分病历中，假如分析者是一个指挥人物，并且在各方面有能力负责引导他的病人和作一个“为人之父”的话，这向分析者的转移和对分析者的依赖可能被看作是有一定治疗效果的满意结果。但是，一个新式的、智力发展的人，有意识的或无意识地努力控制自己，并且在道德上愿用自己的双脚站立，他却宁愿把舵轮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会埋怨，这操舵的工作由别人做的时间太久了！他愿意去了解，换句话说，他愿意作一个成年人。由别人引导是太容易了，但这在今天不再适合于有知识的人，因为他们感到这时代的精神要求他们实行精神自立。精神分析考虑

到了这些要求，因而拒绝病人对不断予以指导和教诲的要求。分析者对自己的不足也是充分了解的，以致不相信自己能充当父亲和引导者的脚色。他最大的雄心一定只在于教育他的病人使之获得独立的人格，使他从幼儿限制的无意识囚禁中解脱出来。所以他必须分析这转移——这僧侣没有接触过的遗留任务。通过分析，这种与分析者无意识的（有时是有意识的）连结应被切断，而使病人站立在自己的脚上。这至少是治疗的目的。

转移的分析

转移在分析者和病人间的关系上引起了各种困难，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分析者总是或多或少地被病人认为是家庭之长。由于每个病人都喜欢对“父母”倾诉自己痛苦的秘密，在分析的第一阶段即发现情结是相当容易的。病人终于发现有人肯听他，对他讲的事有了一个理解的耳朵，而在以前是没有人愿意听他叨叨的，对此，他体验了一种特殊的满足。被人理解，竟有一个医生肯“以牺牲精神不顾一切地”决心去理解他，并且显然愿意“通过所有崎岖的途径”注意他——这些，对于病人来说，是一种奇异而令人愉快的感受。还有这样一些病人，他们看待分析者，心里也有一个标准，对分析者有特殊要求，对此，分析者必须考虑。如果分析者不能做这些，或者忽略了它，那么这分析者对病人而言就毫无用处。对于所有这种孤独的心灵被理解的感觉是特别甜蜜的，他们对“理解”的需要是无厌的。

以亲切的态度对待病人，初期的分析工作照例是很简单

的，也往往容易见到治疗效果，因而在初期阶段显得容易如愚以偿。由于这个缘故，它可能诱使初学者成为治疗的乐观主义者并导致分析的肤浅，形成这种肤浅不能以任务的严重及异常困难为借口。对治疗效果的吹嘘在任何处也没有比在精神分析上更可鄙的了，因为谁也赶不上精神分析者那样清楚地了解治疗的效果最终主要取决于^{分析者}人情和病人本人的配合。精神分析者就其对神经官能病本质和结构洞察能力的增长可以感到正当的自豪，因这见识已远远超过以往在这方面的建树。可是精神分析的出版物到目前为止不能推卸其有时用错误见解说明精神分析的责任。有些技术出版物对未入门的人造成这样的印象：精神分析或多或少地是巧妙的把戏，能产生惊人的效果。经我们了解，通过这种方法分析的第一阶段的确可见到病人情况的减轻，当然，病人的感觉对这些治疗的错觉也要负责。在分析开始时可能显现的改善情况当然不是真正的治疗效果，一般只是暂时的减轻，大大帮助了转移的过程而已。当对转移的最初阻力被克服以后，它就转^而成为神经官能病患者的空想状态。他不想自己作任何努力，即使有些人对他作较多的妥协，有些人怀着不寻常的、特殊的愿望去了解他，他仍不允许自己受到打搅，并且不受任何事情的妨碍，尽管这病人有时用他的任性和孩子气的挑战尽全力把自己搅浑。这种抑制力足以溶化最强的阻力，所以病人就不再愿意把分析者摆在他家庭崇拜者之中，这就是说，不再使他适应这儿童的环境。

与此同时，病人满足了另一种需求，即获得了家庭外的关系，并实现了生物上的要求。病人从转移中获得双重利益：一方面期待着一个人对自己从各方面给以父母般的亲爱

的关怀；另一方面，这个人又是家庭以外的，能履行极重要又困难的责任而对自己没有丝毫危险。当这种收获伴随着明显的治疗效果时（这是不少见的），病人会更加相信他新发现的状态是最好的。我们能很快地察知他一点也不想放弃所有这些好处。如果给他留下这些，他就宁愿一直保持和分析者的联合。于是他开始产生许多幻想，想象这个目标如何可以达到。情欲在这里起很大作用，它被利用和夸大，表明其与神经官能病的不可分隔。当分析者试图破坏这转移的关系时，病人设置最顽固的阻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无论如何，我们不要忘记，对于神经官能病患者来说，获得家庭以外的关系是一种生命的本分，这对任何人都是一样。而到现在为止，这本分他既没有全部完成也没有很有限地完成。根据这个观点，我必须积极地反对那种人们常听到的所谓家庭以外的关系总是意味着性的关系的说法。（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将会说：严格地说不是这样，神经官能病患者喜欢把对待世界的正确态度误解为性的放任。在这方面，精神分析的文献也没有摆脱错误的讲法。当然有些出版物不能从此得出其它结论，这种误解比起精神分析来要久远得多，所以无论如何不能把一切都归咎于它。有经验的医生知道这种意见很好，我有不只一个病人曾按照这种方子去作。但是当精神分析者介绍它时，他也和病人犯了同样的错误，病人相信他的性幻想是来自性力的压抑。如果是这样，这个秘方当然是有益的，可是那完全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回归的里比多夸大了这幻想，因为它逃避现实的任务并竭力返回到儿童的水平。）如果我们完全支持这种回归的倾向，无异适得其反地强化了神经官能病患者的儿童状态。然而他必须学会生活

要求于他的成熟、开化民族的那种更高的适应性。那些有坚定的意向要降低适应性的人，他们将继续照样做下去，那也就根本不需要作什么精神分析了。

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不要落入相反的极端想法，认为精神分析除产生极特殊的性格外产生不了任何东西。精神分析站在传统的道德之外，它不遵守一般道德标准。它是、并且应该是仅仅使独特的倾向有喘息的余地的一种手段，以便发展它并使它与其余的个性达到调协。这应该是一种生物的方法，它的目的在于把主观上最大的幸福与最有价值的生物行为结合起来。正如人不只是一个个体，而且也是社会的一个成员。这两种人性上的固有倾向永远不能分开，或者一种控制另一种而不使人受到严重的伤害。

对于接受分析的人来讲，最好的结果就是最终将变为他真正的状态，达到自身的调协，既不好也不坏，正如他天生的那样。不能把精神分析看作一种教育的方法，如果教育的含意是指将树修剪成美丽形状的剪修园艺艺术的话。但是对教育持更深刻观念的人，就要更为珍视那种使树在其自然生长条件完美成长的培育方法。我们对那荒唐的恐惧让步得太多了。这种恐惧显得好象我们每个人真地都是令人不能容忍的人，好像每个人都成了迟早要发生的可怕的社会灾难。现在有许多人将人的永不知足、无政府主义、贪婪不满的因素专门看作是人的“本性”，以为人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完全忘记了这同样的人也建立了牢固的、稳定的文化形式，它比所有无政府主义的潜流都要强固和稳定得多。（人生存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他的社会性强固，如果不是如此，人性就要终止。我们在神经官能病的心理学中所遇到的自私和叛逆

性并不是本来面目的人，而是一种儿童性的反常。实际上正常人是具有公德心和道德的。他创造了他们的法律并遵守它，并不是因为这些是从外部强加于他的——除非是儿童才这样幻想——而是因为他爱法律和秩序胜于爱无秩序和无法律）。

转移的解决

为了解决转移，我们必须不只是抵抗神经官能病患者的力量，而且要抵抗对正常人有普遍意义的力量。为了试图使病人破除这转移的关系，我们正向他要求做向普通人很少要求甚或永不要求做的事，这就是，他应该完全克服自己。只有某些宗教才向个人作这种要求。正是这一点使得第二阶段的分析困难这样大。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儿童的习惯偏见是认为爱给了他提出要求的权利，儿童对爱的概念就是从别人那里得到礼物。病人按照这个定义提出要求，这倒与大多数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正常人只是由于他履行生活的责任、由于里比多足以得到满足，同时也由于缺少某种气质，从开始没有使自己倾向于热情，以致儿童式的贪婪受到阻止而没有达到太甚的程度。神经官能病患者的主要麻烦却是：他不能使自己用一种对正常人来说是普通的而对他来说是特殊的方法去适应生活（这要求有高度的自制），而是提出儿童式的要求然后开始与人交往。这样，分析者将难以顺从病人加给他的要求，于是可能发生一种寻求妥协办法换取自由的情况，例如，表露出道德自由的暗示，实际上是听之任之，最终则导致文化水平的普遍降低。但是不要顾忌用这样的方法对待病

人，这至多只是使病人降低水准而成为修养较低的人。归根到底，它完全不是一个文化问题，而分析者借助于提供其它所谓好处，换得病人从压紧的转移情况脱出的途径，这倒是简单化了。这违反病人的真正利益而诱使病人去得到补偿利益；如果那样的话，病人将永远不能摆脱儿童式的贪婪和怠惰。只有克服自己才能从这些情况解脱出来。

神经官能病患者必须表明自己和正常人一样能合理地生活，当然，他必须克服比一个正常人要多得多的困难，他必须停止大量的幼稚病，而这对正常人来说是没有困难的。

病人常试图使自己相信，通过寻找特殊的机遇，继续生活在儿童的方式中是可能的。如果分析者试图阻止他，这将是极大的错误。有这样的经验，病人必定按自己的方式做到底而且别无选择。这样的经验对于病人往往是无价之宝。

没有比这更清楚的了：在这个分析阶段，每件事都要视分析者自己分析到什么程度而定。如果分析者自己处在无意识中，持有儿童型的愿望，他将永远不可能打开病人的眼睛使之看到这类危险。其实这已不是个公开的秘密：所有通过分析而有才智的病人都在越过分析察看分析者的灵魂，以便从那里发现证据，证明它是或不是有治愈作用的处方。即使用最微妙的分析，也极不可能阻止病人本能地接收他的分析者处理生活问题的方法。没办法阻止这样做，因为人物的现身说法的教授要比厚本书更富于智慧。任何将自己包裹起来以便隐匿自己人格的伪装都无济于事，或早或迟他必会遇到一个病人揭穿他的伪装。分析者从第一次严肃地选定这个职业起，就面对着分析原则在自己身上的无情考验。他会惊奇地看到，许多明显的技术困难在这种作法中消失。注意，我这并

不是说分析的开始阶段（它可称之为情结发掘阶段），而是指最后的、非常需要技巧的阶段，这个阶段涉及转移的解决。

我经常看到初学者把转移看作是一种完全反常的现象，以致必须对它“斗争”。没有能比这更为错误的了。首先，我们必须把转移仅仅看作是一个伪造，一个具有性特征的讽刺漫画，具有社会结合的性质，它把人类社会结合在一起，并且在有类似意愿的人们间产生紧密的连结。这种结合是人们可以想象到的最有价值的社会因素之一，如果绝对地反对这些关于病人部分的社会序曲将是极大的错误。需要的仅是洗涤他们，使之除去其回归成份，除去其儿童式的性欲。如果这样做了，这回归会成为适应的最便当的工具。

唯一的危险，也是一个最大的危险，是这未被承认的对分析者的要求可能会被误认为这与分析者对病人的要求是一致的。分析者能避免这个的唯一方法就是甘受别人对自己严格的分析。这样他就懂得了分析的真正意义，并且在自己的精神上体会一下它的感觉。每个有才智的分析者将会立即看出这对于他的病人会有多么大的好处。有些分析者相信他们能独自作自我分析。这是孟乔生（Munchausen）心理，他们肯定依然迷惑着。他们忘记了一个最重要的有效治疗因素是使自己听从别人的客观诊断。分析者，无论是谁，如果他帮助他的病人使之成为社会上成熟的、独立的人物，他就必须停止孤立主义战术和自体性欲的困惑。

我知道，当我把它作为不证自明的道理提出，即提出一个精神分析者必须通过专门途径履行自己对生活的责任时，我是和弗洛伊德一致的。如果他不是这样，那么，就会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他那未被利用的里比多不自动地袭击他的病

人而最终证明全部分析都是曲解。本身就是神经官能病患者而且只有一只脚站在现实上的未成熟、无能力的人，一般他们分析不出任何东西，作出来的“分析”也只能是无意义的话。

药品在一个愚人手中从来是毒药和死亡！正如我们要求一个外科医生除他的技术知识外，还有灵巧的手、勇气、镇定的情绪和决断的能力，同样我们必须要求一个分析者对自己的品格有一个十分严格和彻底的精神分析训练，然后我们才愿意把一个病人信托给他。我甚至可以讲到这种程度：精神分析技术的收获和实用预计不只是专门的心理才能，而突出的是对塑造一个人自己品质的严肃关注。

解放转移的技术和我们已经描述的情况相同。病人如何对待他从分析人员那里撤回的里比多的问题自然占重大位置。这里同样，当初学者有意建议或给予忠告时对他有很大危险。分析者在这方面为病人作出努力是极便当的，然而因此也是致命的。在这重要的时刻，在任何地方作精神分析，我们必须让病人和他的冲动领先，即令这条路像是错误的，——错误和真理一样是生命进程的一个重要条件。

梦的预期功能

在分析的第二阶段，我们需要对梦、连同隐蔽的暗礁和浅滩做大量的工作。在分析开始时，梦主要是帮助我们揭开幻想的奥秘；但在此它却经常极有价值地引导里比多的利用，弗洛伊德的著作在根据历史的材料和意愿的倾向以判定梦的明显内容方面奠定了广泛增长我们知识的基础。他指明了梦如何为大量的潜意识材料和大部分已沉埋于阈以下的记

忆打开通路。弗洛伊德的步骤主要是分析的，还保持着他用纯历史方法的天才。尽管这种方法无可置疑地具有巨大价值，但我们仍然应该不单一地采用这种立场，因为片面的历史观点没有充分考虑到梦的目的论意义。如果我们仅从历史决定因素的立场考虑，无意识思想就会被极不适当地描述。为了全面地评价，无疑地我们也必须考虑它目的论的或预期的意义。如果我们追踪英国议会的历史直到它最早的开始，无疑对它的发展和现在形式的决定会有极清楚的了解，但这对于它预期的作用，也就是说，对它现在已经完成和将来准备完成的任务都不会告诉我们任何事。

梦同样如此。在所有时代和所有种族，梦的预期功能只是在迷信中评价。在这些看法中可能有不少真理。除去推测地说梦有预示性的先见外，还有这样的可能，即可能在这些潜意识材料中发现未来事件的组合物，它是潜意识的，仅是因为现在还没有达到对于他们变为意识状态所需要的明晰程度。就在我在此作演讲的时刻，我犹然想到这些属于将来的尚属模糊的概念，我以为它不是别的，只是一些事件淡淡的、潜意识的结合物，它的客观价值我们尚未能悟觉。

病人将来的倾向在这些梦的目的论成分的帮助下被精心加工。如果这件工作成功，病人就会脱离治疗并脱离半儿童的转移关系而进入他自己所选择的、他内心已小心翼翼地准备好了的生活。那时，经过病人考虑认可后，他可以宣布将自己付托给分析者。

精神分析未来的运用

很容易理解，精神分析永远不能作为综合医院的工作。它必须总是保持在少数人手中，他们由于其本来的教育和心理学的能力，对于这个职业具有特殊的才能和特别的爱好。正如不是每个大夫都能作很好的外科医生一样，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作精神分析者。这个工作的主要心理学性质将使得医生职业难以垄断它。或早或迟其它分支科学必将精通这种方法，不论是由于实践的原因还是出于理论的兴趣。如果一旦传统的科学终因讨论不出结果和认为无意义而将精神分析排除在外，而其它门学科比医学更早地学会掌握，我们就不必大惊小怪了。既然精神分析是心理学研究的一种普通的方法，它将为人文科学的其他学科采用也是不足为奇的。

我主要想指出苏黎士学校的工作表明了精神分析作为一种精神病的研究方法的适用性。例如，早老性痴呆的精神分析研究对这明显疾病的心理结构给予我们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对这些研究成果深入讨论不免会使我离题太远。这种疾病的心理学决定因素的理论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广阔的领域。如果我讨论早老性痴呆象征主义的问题我就必须给你们摆出大量的材料，这些，在这几次讲演的框架中不可能展开，因为这些讲演的目的是仅为提供一般的概貌。

早老性痴呆的问题变得这样特别复杂，是因为最近精神分析侵入神话学和比较宗教学的领地，这向我们提供了对人种学象征主义的深刻见解。那些对梦的象征意义和早老性痴呆都熟习的人，因从现代的个人那里发现的象征并在人种历

史上发现的象征之间的连带关系感到震惊。最令人吃惊的是种族的象征与患神经分裂症的象征间的对应。心理学与神话学间的关系是这样复杂，使我不可能对早老性痴呆的看法详细讨论。基于同样的理由，我必须克制自己，不讨论神话学和比较宗教的精神分析研究的结果。当前这些研究的主要成果是发现了种族的和个人的象征意义间广泛的相似。我们尚且不能看到种族心理学将有何种远大的前景可以展开。但是，根据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通过对神话的研究，我们可以指望，精神分析在潜意识过程性质的探索上将会大大地充实和深化。

9. 一个儿童神经官能病的病例

在这几次讲演里，我只限于向你们介绍精神分析性质的一般情况。对精神分析的方法和理论作详细的讨论就需要大量的病例材料，解释这些材料就要对整个广博的见解有所褒贬。可是，为了提供给你们一些精神分析治疗实际过程的意见，我决定举一个对一个11岁女孩作精神分析的简单例子。这个病例是由我的助手Mary Maltzer小姐分析的。我必须首先说明，这个病例也和任何一个人不能作为其他所有人的代表一样，其分析的过程和时间并不都是典型的。没有比精神分析更难抽象出一般的有效规则了，因此最好不要做过多的公式化的说明。我们决不能忘记，纵然冲突和情结有很大的相同性，但每个病例是独特的，因为每个个人是独特的。每个病例要求分析者的单独关注，而每个病例的分析过程是各异的。

所以，在介绍这个病例的时候，我提供了无限变化的精神世界的一个小的片断，它显示了这些以所谓机遇的怪念头进入到人们生活中而呈现古怪无常的特性。我并不想保留任

何更有趣的精神分析细节，也不愿造成精神分析是严格的形式主义方法的印象。科学要求研究者总是努力寻求能把握住活生生事物的规则和分类。另一方面，分析者和观察者必须避开固定程式，让生动的现实以其丰富的无控制状态作用于他。这样，我将试图在完全自然的背景下提供给你们这个病例，并且希望能够成功地向你们表明，这个分析的开展与纯粹理论上所期待的情况是多么不同！

这个病例讨论的是一个11岁女孩的问题，她出身于很好的家庭。

病历

临床历史：有几次由于恶心和头痛不得不离开学校，被迫卧床。有几次早晨不肯起床上学。常被恶梦干扰，忧郁，而且不可信赖。我告诉了她的母亲，她向我求教，这可能不可能是神经官能病的象征？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事隐藏在背后需要向儿童询问？这种推测并不是凭空想的，因为每个细心的观察者都知道，如果儿童这样不安而且脾气不好，必是有什么事烦扰他们。

孩子向她母亲承认了以下的事。她有一个喜爱的教师，她曾迷恋他。上学期她的功课落后了，她想她使得她的老师失望了。以后在她上课时感到恶心。她不只觉得和她的老师疏远了，而且对他甚至有些敌意。她把她的全部友情都引向了一个穷男孩，她经常将带到学校去的面包和这个男孩分食。她现在还给他钱，使他能给自己买面包吃。有一次，在她和这个男孩谈话时，她开玩笑地称她的老师为山羊。这个男孩越来越爱慕她，并且认为自己有权从她那里要一些钱作为偶尔的贡礼。这样她开始害怕这个男孩会将她称教师为山羊的

事告诉老师。她答应，如果他向她正式保证决不对老师讲任何事的话，她给他两个法郎。从那时起这个男孩就开始勒索她：他威胁地朝她要钱，他在上学的路上提出要求打扰她。于是她陷于绝望中。她发病与这件事有紧密的联系。可是，在这件事已经承认而得到妥善解决之后，她的心仍没有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恢复平静。

正如我以前各讲所提到的，往往只是一个痛苦插曲的叙述就有了良好的治疗效果。一般它持续得不太久，虽然也有时保持很长时间。这样的自白从开始分析时起自然经过了很长的一段路，尽管现在有许多神经专家认为分析仅仅是某种广泛的回想或自白。

过了没有多久，这个女孩咳嗽得很厉害，有一天没去上学。此后她到学校去了一天而且感觉很好。第三天又重新咳嗽起来，同时左边胸疼痛，还发烧、呕吐，体温达到 103°F 。大夫担心是肺炎。可是次日一切症状又都消失了，她感觉很好，没有发烧和恶心的迹象。

可是我们的小病人仍总是哭泣而且不想起床。从这些事情的奇怪过程我怀疑她患的是严重的神经官能病，因而建议进行分析治疗。

第一次接谈

小女孩看来神经质而且不自然。有时不满意地勉强笑一笑。她第一次有机会谈一谈卧床后的感受。我们了解到那时她心情特别好，因为一直有人陪伴她。每个人都来看她，特别高兴的是妈妈能读书给她听。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王子患病，只有他的愿望得到满足时他的病才能好。他的愿望是他的小朋友、一个穷困的男孩可以留在他身旁。

由于这个故事和她自己小小的恋爱故事，以及与她的疾病有一定的联系，显然对她有所触动，她开始哭泣，她说她愿意陪别的儿童一起玩，她说她最怕会离开伙伴。她又说她想去找伙伴，这要求立刻就被允许了。我们让她去了，但她立刻又回来，有些沮丧。我们安慰了她一阵。对她说待着等伙伴们来看她也很好，不去就不去吧。刚才想去也是对的。

第二次接谈

第二次接谈时她显得不那么焦虑了，也能抑制自己的感情。谈话被引导围绕着教师进行，她谈到教师时十分困窘。最后她羞怯地承认她极喜欢这个教师。我们向她作了解释：她不必为这件事羞愧，爱老师为了是想学好功课么，没有什么不对。“那么我可以喜欢他？”小病人高兴地问。

这个解释证明这孩子选择她爱的对象是正确的。看来，她曾经害怕承认她对教师的感情。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不容易解释的。以往设想里比多很难用在家庭以外的人上，因为它仍受着乱伦桎梏的羁绊——当然，这像是十分合理的看法，很难从这个看法撤退。另一方面，必须强调指出，她的里比多已经强烈地占有过一个穷孩子，而这个孩子照样是家庭以外的人。所以这个困难不在于里比多向家庭以外的对象转移，而是因另外的一些情况。对她来说，爱这个教师是更为困难的事。这比爱那男孩对她的约束更多。爱那男孩从她这方面并不需要任何道德上的努力。这给分析带来这样的暗示：这孩子要尽最大努力，突破种种阻力才能面对自己的这件事情上，适应她和教师的关系。

如果里比多从必要的任务撤回，完全由于人的惰性，这不单单是儿童的特点，也是原始人和野兽的特点。原始人的迟

钝和怠惰是不去努力适应的主要原因。没有利用的里比多停滞不动,然后不可避免地回归到以往的目标或适应模式,其结果是乱伦情结显著地活跃。这里比多从如此难以获得并且如此难以达到的目标撤回,转而用一个容易的目标代替,最后代之以最容易的——儿童的幻想,继而精心编造成纯粹的乱伦幻想。无论何时遇到心理适应的障碍,我们总是发现这些幻想的过分发展,这个事实,正如我以前所指出的,必须同样地设想为是一种回归现象。这就是说,这乱伦的幻想是第二位的,没有病因论的意义。而最主要的原因是人性对任何一种努力的阻力。因而从某种任务撤退不能解释为这个人喜欢对这种乱伦的关系想入非非,而应该说他撤回这种关系是由于他避开努力。否则我们就必须说对有意识努力的阻力与对乱伦关系的喜爱是一回事。这显然是无意义的。因为不只原始人,就连野兽也强烈地讨厌一切故意的努力,在情况驱策他行动之前,他们沉溺于绝对的懒惰状态。无论是原始人还是野兽,都不能断言其对乱伦关系的喜爱是厌恶适应努力的原因,特别是野兽,根本就无所谓乱伦问题。

从特征上看,后来这小病人表现得高兴了并不是教师尽了最大努力,而是她被允许去爱这教师。因为这最适合于她的要求,而这是她第一次听说的。她病情的减轻是由于证实了她爱这教师是正当的——尽管她并没有首先做任何努力。

谈话然后进行到男孩对她勒索的事。对此她又说得很详细。我们进一步得知,她曾试图强打开钱匣取钱,当她打不开时又想从母亲那里偷来钥匙。她并且吐露了其它事情的详情:她曾嘲弄过这教师,因为他对别的女孩比对她更好。但

对这教师的课程她的确没有学好，特别是算术。有一次她根本没有懂，但怕失掉这老师对她的尊重而没有敢去问，结果做错了，成绩落后，真的失掉了教师对她的看重。这更使她心里存下对教师十分不满。

大约在这个时候她们班上的一个女孩因病送回家了。不久后，她也发生了同样的事，试图用这种方法离开这她不再喜欢的学校。失掉教师的尊重，一方面使得她侮慢这个教师，另一方面，导致与小男孩的恋爱，显然这是作为失掉与教师关系的一种补偿。现在给予她的解释是一个简单的暗示：如果她能及时地提出问题，下功夫学好这教师的功课，她会使这教师对她的看法变好。我可以补充一句，这种暗示起了很好的效果。从那时起，这个小女孩没耽误更多的算术课，变成了很好的学生。

在勒索的故事里有一点值得强调，就是有强迫的特点并且对这女孩欠缺自由。这是一个很通常的现象。任何人当允许他的里比多从必要的任务撤回时，这里比多就变为自发的，不顾主体的反对，选择自己的目标，并执着地追逐它。所以，对于一个人很普通的现象是：将懒惰的、不活泼的生活导向特别容易强制里比多，也就是，导向各种恐惧和受不由己的限制。原始人的恐惧和迷信对此提供了最好的证明；我们自己文明的历史，特别是古代文明，也同样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没有利用的里比多是难以控制的。我们决不能相信通过勉强的努力控制里比多，我们便可以永远偷闲。我们只是在极有限的范围内有意识地给里比多安排任务；其它自然的任务都是由里比多自己选择，这是注定给它的。如果这些任务被免除，即使最勤奋的生活也没有用，因为我们必须

考虑人性的全部条件。无数由于工作过于劳累而得的神经衰弱可以追踪到这个原因，因为工作耗费于内部冲突中造成神经疲惫。

第三次接谈

小病人叙述了当她5岁时作过的一个梦，给她造成了永远不能忘记的印象。“我一生也不会忘记这个梦，”她说。

（我愿在此插一句，这样的梦是具有极特殊的重要性的。梦自然地留在记忆中的时间越长，它的重要性就越大。）这个梦是：“我和我的弟弟正在树林中寻找草莓，一只狼走来并朝我跳来。我逃上一个楼梯，狼在我身后追，我掉落下来，狼咬我的腿。我在极度恐惧中醒来。”

在我接纳这小女孩给予我们的联想以前，我试图就这个梦可能有的内容形成一个随意的见解，然后再看如何将我们的结果与孩子给予的联想对比。这个梦的开头使我们想起那大家都熟悉的神仙故事“小瑞德·来丁贺”，当然，这个故事每个小孩都知道。狼先吃了祖母，然后变成她的样子，以后又吃了小瑞德·来丁贺。可是猎人杀死了狼，剥开它的肚子，小瑞德·来丁贺安全健康地跳了出来。

这个主题在全世界无数的神话中都能找到，而且是约拿书中圣经故事的主题。隐藏在它后面的直接意义是占星和神话：太阳被海怪物吞掉，在早晨又生出来。当然，整个占星神话实际不是别的，只是心理学（无意识的心理学）向天空的伸展。因为神话从不是有意识制造的，它是由人的无意识产生。这就是何以有时自始就相互隔离的种族其神话形式竟神奇地相似或一致的原因。这说明了，比如，相当独立的基督教其十字架却不寻常地分布，在这方面美洲有十分值得注意

的例子。不可能想象神话只是为了解释气象的或天文的过程而创造的。它首先是无意识冲动的显示，正可与梦相比拟。这些冲动是被无意识层的回归的里比多所推动的。这些被人知道了的材料就是儿童天生的材料——与乱伦情结相联系的幻想。这样，在所有的这些所谓太阳神话中，我们都能很容易地认出儿童关于生育、出生和乱伦关系的看法。在小瑞德·来了贺的神仙故事中，就是这样的幻想：母亲必须要吃一些小孩之类的东西，这样小孩就通过切开母亲的身体而诞生。这是最普遍的幻想之一，在世界各地都能找到。

根据普通心理学考虑到的，可以得出结论：小女孩在她的梦里详细描述了生育和出生的问题。如关于狼，我们必须大体上把它摆在父亲的位置，因为儿童无意识地将任何对母亲粗暴的行为归咎于父亲。这个主题也是以无数涉及侵犯母亲的神话为基础的。至于关于神话的相似之处，我愿意提请你们注意Boas的著作，其中包括大量美国印第安人的冒险故事。其次是Frohenius的书，最后是亚伯拉罕(Abraham)、兰克(Rank)、黎克林(Rik Lin)、琼斯(Jones)、弗洛伊德(Freud)、麦阿德(Maeder)、西尔帕尔(Silberer)和斯比尔林(Spielrein)的著作以及我本人在《变形的象征》中的研究成果。

在这里，为了理论上的原因（我们还没有进入具体的治疗）我作了这些一般评论之后，我们再继续看这儿童关于她的梦向我们说了些什么。无需乎说，她关于自己的梦是可以随心所欲地讲述的，没有受任何方式的影响。她首先讲咬她腿的事，并且解释说，有一次一个妇女告诉她自己有个孩子曾被鹤啄，她甚至还能指出啄人的地方。这种表示在瑞士是

很普及的性交和出生的不同的象征形式。在此，我们的解释和这儿童的联想过程之间十分相似。因为她最初在完全没有影响的情况下产生的联想回到了上面我们根据理论推测出的问题。我知道在精神分析的文献中有无数病例（它明确地未受影响）没有能消除我们的批评者们说我们向病人暗示了我们的解释的争论。这个病例也同样说服不了那决心把初学者疏忽的错误强加于我们头上；甚至更坏，说我们是伪造事实的人。

针对女孩的联想，我们向小病人问，这狼使她想到什么。她回答：“我想到发怒时的父亲。”这也完全符合我们在理论上考虑到的事。也可能有人反对，认为这些考虑是为了某种目的作图解的，因而没有普遍的效力。我想当这些人一旦具备了必要的精神分析学的和神话学的知识，这些反对意见就会自行消失。假说的效力只是在正确知识的基础上才能看到，否则就不可能。

小女孩的联想先是把鹤置于狼的地位。这对狼的联想又把我们引向她父亲。在流行的神话中鹤代表父亲，因为他带来孩子。在神话故事中狼是母亲，在梦中狼是父亲。神话故事和梦之间的明显的矛盾无论对梦还是对做梦的人都无关重要。所以我们可以省却详细的解释。在我的著作中我曾讨论两性象征的问题。如你们所知，在劳缪勒斯（Romulus）和雷摩斯（Remus）的传说中，两个野兽、鸟庇克斯（Picus）和狼都上升到父母的行列。

所以女孩在梦中对狼的恐惧即是她对父亲的恐惧。做梦人解释她怕她的父亲是因为父亲对她十分严格。他父亲曾对她讲，我们做了错事才做梦的。她就问她的父亲：“可是：

妈妈做了什么错事？她也老做恶梦。”

有一次她吮手指被父亲掴了一掌，她不顾父亲的禁止继续这样做。或许这就是她做的错事？不可能，因为吮手指不过是和她这样的年龄已不太适应，她已经上学了，在她这年龄的孩子差不多不吮手指了，这就激怒父亲，以致用打来罚她！我们还知道按她自己的道德观念还有一种更为严重的“罪恶”没有承认，她曾引诱若干同样年龄的女孩互相手淫。

原来是由于这种性的兴趣她怕她的父亲。但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在她5岁的时候作过狼的恶梦。而在那时手淫的情况尚未发生。因此我们必须把她与其他女孩间的事情至多看作是她现在怕父亲的一个原因，但这不能解释她早年的恐惧。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预期曾有过一些类似的、带有方才提到的禁戒行为心理状态的一些无意识的性愿望。这些行为的特性和道德评价对于儿童比对于成人自然是更无意识的。为了了解是什么能这样早给女孩造成一个性的印象，我们不得不问在她5岁时发生了什么事。在这一年里她的小弟弟出生了。所以甚至那时她也怕她的父亲。已经讨论的联想向我们表明了在她的性兴趣和她的恐惧间明显的联系。

性的问题，它的性质联系到愉快的实在感觉，在狼的恶梦中却以恐惧的形式出现，显然是由于她的父亲对她不好，他是道德教育的代表。所以这梦是最初给她印象深的性问题的表现，显然它是受最近弟弟的出生所激励。可是由于性的问题完全与肉体某种愉快感觉的历史相联系，而对此教育又贬之为“坏习惯”，它就只能以道德犯罪和恐惧的乔装形式表现了。

这种解释，虽然像似合理的，依我看来却肤浅并且不适用。我们不应把全部困难归咎于道德教育，根据这未经证明的设想认为教育可导致神经官能病。再者，道德法规本身不应看作正是必需抵制的罪恶，从人们内心愿望来看，它还是十分必要的。道德法规实际是人天生的统治和管理自己的强烈愿望的外部表现。这种对教养和文化的冲动消失于人类进化历史那朦胧的、不可测的深处，这些都永远不能被认为是外界所加的法律的结果。人遵从自己的本能，创造了他们的法律。如果我们只考虑教育的道德影响，我们就永远不能理解儿童对性问题恐惧和吃惊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更深处，在人性的自身，或许在于天性和文化间、或是个人意识与集体感觉间的悲剧性冲突。

当然，就这个问题给儿童一种更高的哲学方面的观念将是毫无意义的，它肯定不会有丝毫效果，只须改变她那认为对生命的生育感兴趣就是做了什么错事的观念，使她明白对生育问题感兴趣和好奇没有什么不好，她的没有根据的恐惧只是把本该愉快的心情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就够了。手淫的事应予以宽容的理解，讨论应只限于儿童性兴趣的无意识上。同时，应对她做解释，她的性活动主要是好奇心的一种发泄方法，对此她本可用别的更好的方法得到满足的。她对她父亲的巨大恐惧表现了同样的巨大期望，因为她弟弟的出生是与生育问题密切相连的。这些解释证明这儿童的好奇心是正当的，用这种方法，大部分道德冲突都被消除了。

第四次接谈

小女孩现在对我们更亲切、更信任我们了。以往那种局促和不自然的状态完全消除了。她提起在上次接谈后作的一

个梦：“我像教堂的尖顶一样高，能看到每一栋房子，在我脚下有一个很小的孩子，小得像是花朵一般。来了一个警察。我对他讲：‘如果你敢说我一言，我就拿你的剑割下你的头！’”

在分析这个梦时，她还发表了自己的感想：“我想我既然比我父亲长得还高，那警察就必须服从我嘛。”她立刻就把警察和父亲联想到一起。她父亲曾是个军人，当然，曾有过剑。这梦清楚地满足了她的愿望。她像教堂尖顶，远远高过她的父亲，而且如果那警察敢说她要被砍头。这梦也满足了儿童希望长大爬高处玩耍这自然的愿望。在这个梦里她克服了对父亲的恐惧，从此我们可以期待她在个人自由和安全感方面会有重大的改进。

在理论方面，我们可以把这个梦看作是一个能清楚说明梦的补偿意义和目的论功能的范例。这样的梦必须让做梦的人对自己的人格价值有提高了的感觉，这对于她个人的幸福是十分重要的。至于梦的象征意义对儿童的意识不清楚并没有关系，因为象征的情感效果不决定于有意识的了解，它更多地是直接知识的问题。来源于知识的所有宗教象征都获得它的效力。这里不需要意识的理解，它直接地影响信徒的心灵。

第五次和第六次接谈

小孩叙述了她作的另外一个梦：“我和我的全家站在屋顶上，在山谷另一边房子的窗子照耀得像火，升起的太阳反射在它上面。突然我看到我们街上房角真的起火。火焰越来越近，而且吞没了我们的房子。我跑到街里，母亲在我后面扔下家里所有的东西。我张开我的围裙。她还扔给我一个洋

娃娃。我看到我家房子的石头在燃烧，但木头仍保持原样未动。”

分析这个梦出现了特殊的困难，必须延长超过两次座谈的时间。描述这个梦提出的全部材料会把我们引得太远，我必须把自己限制在最重要的内容上。显著的联想是从房子的石头着火而不是木头这特殊的意象开始的。有的时候，特别是分析长梦的时候，选择最显著的意象并从它开始分析是值得的。这不是说有固定的规定，但为了叙述缩减，根据实际需要这样做是可以的。

“这是古怪的，像是在神话故事中，”小病人这样说。我们举了几个例子，向她表明神话故事总是有一种意义。“并不是所有的神话故事，”她反对说，“比如睡美人的故事，能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又向她作了解释，睡美人必须在魔法催眠下等待上百年才能被释放。只有英雄的爱情，当他克服一切困难并且勇敢地突破荆棘围障才能解救她。这样，一个人往往必须等待很长时间才能达到其内心的愿望。

这种解释符合了这孩子的理解，另一方面也与这神仙故事的主题完全一致。睡美人的故事明显地与古代春天和富饶的神话相联系，含有一个明显地与11岁比较早熟的小姑娘心理状态密切相连的问题。它属于传奇的一个套式，其中有一个未婚女子，由龙来守护，被英雄解救。除想着手解释这个神话之外，我愿强调一下古冰岛诗集中显示的天文学和气象学成份。以少女形式出现的大地成了冬天的囚犯，被冰雪覆盖，年轻的春太阳，这热情的英雄，将她从寒冷的监牢中融化出来。她在寒冷的监牢中等待她的拯救人，已经等待了很久。

小女孩说睡美人的故事没有意义，那是因为她不懂这个神话故事的意义，不能因此也说房子燃烧的梦中意象也无意义。因此，她只是谈到，“这是古怪的，像是在神仙故事中。”在她看来，石头燃烧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是无意义的，所以才像是一个神仙故事。我们向她作了解释，给她指明，“不可能”和“像一个神仙故事”在概念上只是部分相同，神仙故事另有大量的意义。尽管这特定的神仙故事，根据这随便提到的情况，似乎与梦没有什么关系，但它是在分析梦时出现，虽像是偶然的，也引起了特殊的注意。尽管例子是无意识提供的，但它不可能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在那个时刻具有当时状态的某些特征的。在分析梦时我们必须寻找出这些像似意外的事件，因为在心理学上没有盲目的事件，虽然我们总倾向于把这些事情设想成纯系偶然的。从我们的批评者那里，你想听多少这样的反对意见都能听到，但是对于真正科学的思想，只能是有因果关系的而没有意外事件。从小女孩选择睡美人作例子这件事情上，我们必须得出结论，这样做在这儿童心理上有其主要原因。原因就是她自己与这睡美人相似或者部分相同。换句话说，就是在这小孩精神上有一个情结，它可以在睡美人的神话中得到表现。我们在给小孩解释时已考虑到这个推论。

虽然如此，她还是不太满意，仍然怀疑神话故事具有意义。作为不可理解的神话故事的另一个例子，她提到白雪公主。她躺在封闭的玻璃棺中长眠着。这不难看出，白雪公主和睡美人一样，属于同样一套神话。它包含着甚至更清楚的季节神话的象征。这孩子选择的神话材料表明它直觉地与大地相比。这大地被冬日的严寒紧紧锁住，等待着前来解救的

春太阳。

第二个例子证实了第一个例子和我们作的解释。认为强阔了第一例的意义，作了提示，因而才引出第二例，这种看法是很难坚持的。小女孩把白雪公主作为另一个没有意义的神话故事的例子提出来，证明她不认为白雪公主和睡美人是相同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测这白雪公主和睡美人一样，在女孩身上起源于相同的无意识来源，就是说，起源于一个情结，这个情结与对未来事件的期待有关，正好可以和大地从冬天的囚禁中释放和春太阳的光线使它滋育相比。如你们所知，自古丰富世界万物的春太阳总被联想为公牛（具体体现强大生育力的野兽）的象征。虽然我们尚且不能看到这些见解和梦之间的联系，但我们应该把握住我们已经得到的知识并继续进行我们的分析。

小女孩在自己的裙子中接到洋娃娃，她的第一个联想告诉我们，在梦中她的姿态和整个情况提醒她想起一幅她知道画。画中有—一只在山谷上飞着的鹤和在街上站着的女孩，小女孩张着裙子向鹤呼喊，请它带来一个娃娃。她补充说，她早就希望有个小弟弟或小妹妹。这些自发提供的材料，明显地与已经讨论的神话主题有关。很清楚，这个梦事实上关系到同样的被唤醒了了的生殖本能的问题。当然，关于这些联想我们一点也没有向小孩提起过。

接着，她停顿一下之后，突然又说了下一个联想。

“有一次，当我5岁的时候，我躺在街上，一辆自行车在我肚子上压了过去。”这是极不可信的事，可以判断，这是女孩的幻想，反映女孩患有记忆错乱症。因为据知这类事从没有发生过。不过，在另一方面，我们在学校听说这个小女

孩常和同学相互横躺在身上，并用她们的腿相践踏。

读过弗洛伊德和我出版的儿童分析著作的人，都会承认在儿童游戏中有相同的蹂躏的基本主题，对此我们认为一定有一种性的潜在情绪。在我早期著作中表明的那种观点，被我们小病人的下一个联想所证实：“比起洋娃娃来，我更想要一个真娃娃。”

由关于鸛的幻想显示出来的所有这些十分值得注意的材料，都使人联想到儿童性学说典型的起源，向我们表明，小女孩的幻想就是围绕着这个主旨转动的。

可能你们有兴趣知道这践踏或蹂躏的主题在神话中可以找到。在我的著作论里比多中曾对此作了引证。这些儿童幻想在梦中的运用、关于骑自行车人的记忆错乱、以及在睡美人的主题中所表现的急切的期待，都表明儿童内心的兴趣集中于某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也许她的里比多被生育问题所吸引这个事实是她在学校兴趣减退的原因，所以她的功课落后。这个问题往往令十二三岁的女孩迷醉，我可以在一个专门的病例（《向传说心理学的一篇投稿》）中向你们表明，儿童中的猥亵谈话以及互相启蒙的尝试，其结果自然是极淫褻的，往往成为毁掉儿童对美好的想象的原因。即使十分注意地防范，也阻止不了他们有一天会搞些什么秘密？可能是极肮脏的情况。对儿童最好在适当的时候让他们清楚地了解生活的事实，这样他们就不需要由他们的学友以丑恶的方式来开导了。

这些和其它一些征示都表明某些性的启蒙时刻已经来到。小女孩聚精会神地听了我们随后的谈话，然后极认真地问：“那么我真地不能有个小孩？”这个问题引出了关于性

成熟的解释。

第七次接谈

小女孩开始谈到她完全了解，为什么她现在还不可能有一个小孩，因此她放弃所有这些想法。但效果并不好，她竟对教师撒起谎来。上学也迟到了，她对教师讲因和父亲到某地去所以才来晚。实际上，她太懒不愿按时起床。她撒谎是因为她怕因承认实情而失掉教师对她的喜爱。所以发生这种治疗过程中的突然失败需要一种解释。根据精神分析的原则，突然的、明显的削弱只能发生在接受分析人没有从分析中得到当时所必需的结论时，但仍在为其它可能性敞开大门。这就意味着在我们这个病例中，通过分析，明显地已使里比多表露出来，所以能出现一种个性的改进，但由于某些原因并没有达到适应，这里比多还在沿着老的回归途径往回滑动。

第八次接谈

第八次谈话证明：我们的病人没有拿出关于她的性观念或与分析者性成熟的解释相抵触的证据。她没有提到在学校里流传的谣言，即一个11岁的女孩和一个同年龄的男孩有了一个孩子。这个传言证明是没有根据的，它是为满足这个年龄的女孩秘密希望的一个幻想。正如我在关于谣传心理学的文章中试图表明的那样，谣传往往是这样开始的。它是无意识的幻想，在这个作用上它相当于梦和神话。这种荒诞的说法只是使心理的障碍通过幻想而打通：她不需要等待，在她11岁的时候她已经就能有一个孩子。谣传和分析者的解释的矛盾造成了解释的阻力，其结果是解释立刻被贬低。同时，其它一切知识和教导都归于无用，暂时的怀疑和不信任由之

产生。里比多随即选取它以往的途径并进行回归。这时就是复发的时刻。

第九次接谈

这次谈话对有关性问题的往事又提供一些重要的细节。首先谈到梦的一个重要片断：“我和别的小孩在林中的一块开垦地上，周围都是美丽的枞树，开始下雨，雷电交作，天渐渐暗起来。这时我突然看到一只鹤在天空飞翔。”

在我开始分析这个梦之前，我必须提到它与某些神话观念的相似。任何熟悉Adalbert Kuhn和Steinthal著作的人（Abraham最近提醒大家对那些著作的注意）完全不会对雷雨和鹤的奇怪结合感到惊奇。因为自古雷雨就有大地受孕的意思，这是天空父亲和大地母亲的同居。在那里闪电接替了长翅膀的生殖器的统治。飞翔的鹤是同样的东西——一个长翅膀的生殖器。它的心理与性的意义是每个孩子都知道的。但是雷雨的心理与性的意义就不是人人知道的了，我们的小病人肯定不知道。从以前所描述过的全部心理簇群来看，对鹤在人的意会中的心理和性的解释，以及雷雨与鹤的联系具有的心理和性的意义，看来一开始就叫人难以接受。但是当我们记起精神分析研究已经在无意识精神产物中发现了大量的纯神话的联想时，我们可能得出结论：在这个病例中两种意象间的精神和性的联系也存在着。我们从其它经验中得知，这些曾导致过神话形成的无意识层在现代的个人身上仍然活跃并且还能不停地产生。只是只限于在梦中或神经官能病及精神病的症状中产生，因为在现代人心中现实的校正是这样有力，以致阻止了它投到真实世界。

再回到对梦的分析：引导到意象中心内容的联想是从雷

雨时雨的意念开始的。她实际的话是这样：“我想到水——我叔叔就是被水溺死的——像那样淹在水里 必定是极可怕的，可是在这黑天——会不会娃娃也溺在水里？不是在肚子里喝了水吗？奇怪，当我病的时候妈妈把我的水送给大夫，我想他是往里掺合什么糖浆之类的东西，它使娃娃成长，妈妈必须喝它。”

从这个联想的线索我们可以清楚无疑地看到，女孩将心理和性的观念，特别是有关生育的观念和雷雨中的雨联系到了一起。

从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神话与现代个人幻想间明显的相似。在象征的联系中这一系列的联想是如此丰富，甚至足够以它写一大篇论文。溺水的象征被小孩天才地解释为怀孕的幻想，与精神分析文献中早已作过的解释不谋而合。

第十次接谈

第十次谈话继续谈到女孩自发描述的有怀孕和出生的幼稚的理论，对此可以作为已经解决的问题放在一边。这儿童老是认为是男人的尿进入女人的身体，才在里面发育成胚胎的。所以小孩从开始就在水中，也就是在尿中。另一种说法是尿随着大夫给的糖浆喝下去，于是小孩在母亲的脑袋里长大，小孩越长越大，母亲的脑袋不够大了，于是就裂开，母亲就戴一顶帽子将头裹起来。她用一张小画说明这些，画上画着一个小孩从脑袋出生。这个观念是原始的而且是非常神话式的。我只需要提醒你们智慧女神Pallas Athene的出生，就是从她父亲的脑袋里生出的。尿的孕育意义也是神话的。这在吠陀经典Rig-Veda赞美诗集Rudra歌中可找到恰当的证明。我也要提到已被她母亲证实的一些事情，就是远、

在分析以前，这个小女孩有一次宣布，她曾看到过一个玩具小人在她的小弟弟的脑袋里跳舞，这是一个可能成为出生理论起源的幻想。

这张画与在苏门答腊的巴塔克古迹中发现的某些人工制品有明显的密切关系。它们被称为魔杖或始祖柱，其中有很多一个站在另一个头顶上的形体。巴塔克古迹自身为柱作了解释，而通常把它看作是没有意义、无非是儿童无谓的心理状态而已，但这样说仍没有解脱小病人的桎梏。他们断言这些重叠的身体象是一个家庭的成员，由于乱伦被一条蛇缠起来而被另一条蛇咬死。这种解释与我们的小病人的设想相似，因为她的性的幻想，正如我们从第一个梦中所看到的，也是围绕着她的父亲而发的。这里说的关于巴塔克古迹，主要也是暗示乱伦关系。

还有一种小孩肠道内生长的说法，以自己的征兆现象学的解释达到与弗洛伊德的学说完全一致。女孩按照她所幻想的孩子是“呕吐出来的”去做，不断地试着使自己恶心和呕吐。她在厕所中还作正规的推压练习，以便把小孩推出。这样终于弄清楚，为什么这个孩子在其神经官能病的表现中，首先而且最重要的症状是呕吐，这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现在把分析扯得这样远是为了我们能返回来看一眼整个这病例。在这神经官能病的征状背后，无疑有着与这些征状相联系的复杂的情绪过程。如果从这些有限的材料敢于作出普遍的结论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神经官能病病例的过程大体归纳为下面这样的情形。

当逐渐接近青春发动期时，这儿童的里比多使她对现实产生了感情的而不是客观的态度。她对教师增长了迷恋之

情。在不切实际的幻想中感情的纵恣胜过自我克制，而后者又正是这种恋爱所不能做到的。结果，她的注意力减退，功课受到损失，破坏了她以前与教师的良好关系。教师逐渐不耐烦。小女孩本来为取得父母的喜欢对自己要求是很高的，但此时不是设法改进她的功课，而是滋长愤恨情绪。结果，她的里比多由教师及她的功课转移开，陷入到对一个穷男孩特有的、强迫性的依靠。这个男孩尽可能地利用了这种状况。因为当个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他的里比多从必要的任务撤回时，没有利用的（所谓被压抑的）里比多能激起各种意外事件，不论是在内心还是在外部。前面描述过的每种征兆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些都是以讨厌的方式强加于他的。在这些条件下，这小女孩上学的阻力抓住了第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不久后见到另一个女孩由于得病被送回家，我们的病人就巧妙地照样仿效了。

一旦离开学校，对她的幻想就敞开了道路。由于里比多的回归，各种征兆和幻想果然被强烈地唤醒，并且获得它从没有有过的影响，因为以往它从没有起过这样重要的作用。现在它变得有极重要的内容，是里比多回归到它这里的真正原因。可以这样说，这小孩以她编织幻想的天性，过多地从教师身上看到他的父亲，因而发展了反对父亲的乱伦的阻力。如我早些时候所解释的，我想如果这样设想会更简单而且更为可能：她把教师如同父亲那样看对她更方便。由于她更愿随从着青春期暗中给予的刺激而不愿顺从她对学校和教师的义务，她允许她的里比多选择那小男孩。正如我们在分析中所看到的，从他那里她决定要得到某些秘密的好处。即使分析已经证明，由于父亲成像的转移，乱伦的阻力便使她

反对她的教师。主要地不是遇到阻力而迫使幻想产生，而是在任何病例中主要导致幻想的是懒惰和便利。或者，用更科学的话讲，是阻力最小的原则。

（我顺便提一下，我想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设想，并不总是在性过程中和尚未弄清楚的人的本性中有完全正当的理由引起向儿童幻想的回归。因为即使在对于性的问题久已全部了解的成年人中，我们也发现了同样的回归幻想，那里并没有正当的原因。我也有这样的印象：接受分析的年轻人常不顾启发，试图保持着他们作为辩解理由的无知，以便把注意力引开，避免去适应任务。尽管在我思想上没有疑问，儿童是会利用他们真正的或佯装的无知的，可是另一方面，必须强调青年人有权利受到性的启发。如我以前所说，如果在家庭适当地做了这些，对许多儿童都会有明显的好处。）

通过分析清楚地看到，无论这女孩生命的进展如何，一种回归运动曾置入其中，它导致与自己失调的神经官能病。通过对回归倾向的追踪，分析发现了围绕着某个特定问题的性的强烈好奇心。当这女孩通过启发而从错误幼稚的幻想中解脱出来的时候，一度被牵入幻想迷宫的里比多又被变成有用的了。分析使她注意到自己对现实的态度并使她看到自己真正的潜力。结果是 she 可以用客观的、批判的态度看待她不成熟的、青春的幻想，停止这些和其它不可能的愿望，将她的里比多转用于积极的目的，用于她的功课和获得教师的赞许上。这种分析使她的心极为安宁，回到学校后智力上有了明显的进步，她的教师也承认这个孩子很快成了班上最好的学生。

（在原则上，这个分析与对成年人的分析没有区别。只

是对成年人要停止性的启发，而用一些极相似的事代替，这就是，启发的内容关系到它以往对现实态度的幻想以及如何获得更合理的态度。分析是苏格拉底助产术精炼过的技艺，不怕踏入神经病幻想的黑暗路径。）

我希望在这简化了的例子的帮助下，我可以成功地，不只是在实际治疗过程和克服技术困难方面，而且在人的精神的美和其他种种问题的洞察能力方面，给予你们一些有用的见解。我曾有意地强调过无意识与神话的某些相似之处，目的是指出精神分析的见解有些可以对它适用。同时，我愿指出这个发现的含意。儿童心灵中神话因素的明显支配作用给了我们一个清楚的暗示：即一当个人意志逐渐从幼儿的集体意志发展出来，个人的独立完备的知识状态才能形成——而这也不是新鲜的理论了。

我们在儿童中发现的这些神话参考材料在老年性痴呆和梦中也遇到了。他们为比较心理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片广阔而富饶的土地。这些研究工作引向的遥远目标是意志的种系发生史，它也和躯体一样，通过无数的变形而达到其现在的形式。基本器官（事实上它是意志所依附的）在心理其他形式的充分活动中以及在某些病理条件中可以发现。

用这些暗示，我们现在达到了目前的研究地位，并且至少勾画出了这些见解和阐明我们现在及将来工作性质的假说。我曾竭力提出某些观点，这些观点逸出弗洛伊德的假说，不是作为相反的主张，而是作为弗洛伊德引入科学的本身发展的例证。借尽可能采用极相反的观点和使用完全不同的术语（这是极少数人的特权，但即使他们，过一段时间后也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从他那孤独的高位降下来而再度加入到

这普通经验的缓慢进程，正是根据这普通经验对思想作出评价）搅乱科学的进步，这样做，我自知是不适宜的。我也希望我的批评者们不要再责备我是无中生有地提出我的假说。没有成百次的经验证明我的看法完全经得住事实的考验，我决不冒险地跨越现有的学说。对于任何科学著作的成果我不抱太大的希望，只是如果发现有一群读者的话，我希望它能清除各种误解，搬开阻塞对精神分析正确理解路途上的若干障碍。当然，由于缺少精神分析的经验我的著作不能用其它代替。任何人要想在这些事上有发言权，任何时候都必须像精神分析学派那样彻底地研究他的病例。

